

第九章 新形勢下的思想鬥爭

(1979-1980)

隨着中共的路線轉換，中國從一九七九年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時代那種連綿不斷的大規模思想鬥爭運動，已經遭到普遍唾棄。然而它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是改取新的形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代替大規模運動的是曲折複雜的幕後鬥爭。其激烈程度並不亞於社會上的鬥爭，只不過局外人不大知道罷了。

一 分道揚鑣

理論界的分裂

理論工作務虛會剛剛開過，就傳出一種“權威”的指責：“他們和黨分道揚鑣了。”

“他們”是指胡耀邦所表揚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勇于打破禁區那些理論家。這些人全是共產黨員。對於黨員來說，“和黨分道揚鑣”是很嚴重的指責。不過，如果不去深究誰代表“黨”，那麼“分道揚鑣”是符合實際的。

當初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除了華國鋒的親兵之外，理論界是一致的。三中全會開過之後，華國鋒已經承認錯誤，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人。這時，統一的理論隊伍就分化了。這種分化，當然可以從理論界本身一些人的品格和作風上得到說明，比如權慾薰心或見風轉舵之類，但更深刻的原因卻在共產黨本身。即使這支理論隊伍一直保持一致，也會另外冒出一支“理論隊伍”和他們對立的，因為客觀上存在着這種需要。

先從中共三中全會說起。全會決定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

路。但是現代化意味着甚麼，這條路怎樣走法，中共黨內從來就不會一致過。

三中全會公報是這樣寫的：“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①

這就是說，不光是發展生產力，而是要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改革。鄧小平曾經清醒地看到，改革是一場革命，必然有阻力。不過他沒有說出這阻力來自何處，其實恰恰來自共產黨內。

一黨專政造就特權階層

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名叫“人民民主專政”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由共產黨一個黨獨自掌握。雖然政權機構中也有少量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但是這些黨派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因為它們並不是具有自己的政綱的獨立政黨，而只是在中共領導下團結某一方面人士的“統戰機構”或“聯系紐帶”。而且，由中共獨自掌握的這個政權，也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權。因為實際權力都掌握在黨的手中，而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不過是執行黨的指示的辦事機關而已。

由中國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這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格局。在戰爭年代，黨領導一切是取得革命勝利的必要條件。到了取得全國政權之後，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種戰爭體制本應轉變為和平時期的民主體制。然而中共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戰爭體制定型化了，這就造成一黨專政的固定格局。

幾十年的一黨專政，造就了一大批壟斷一切權力的當權派。毛澤東所說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說錯了。共產

黨內掌權的官員是忠心耿耿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不光保證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而且壟斷經濟權力，並且控制着文化生活，能使社會上“輿論一律”，不會有異議出現，當然更不可能有輿論監督。很明顯，在這種社會條件下，當一名執政黨的當權派，是很愜意的。他為甚麼要去“走資本主義道路”呢？恰恰相反，如果真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意味着共產黨將失去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壟斷。因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普選制，是三權分立，是思想多元，是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真走這條道路將使中共和其他政黨一樣，不但要受輿論監督，而且能否執政要由選民的選票來決定。而且資本主義經濟既不受政府官員支配，當然更不會接受哪個黨的領導。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道路”如果真的成為現實，也就意味着掌權的共產黨員的特權將要喪失。因此，共產黨內的當權派絕對是熱心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不單單出于意識形態上的考慮，更重要的是現實的物質利益所決定。

改革和反改革的鬥爭格局

然而中共三中全會所開始的改革，恰恰觸犯了黨內當權派的既得利益：

政治民主化將使他們不能再獨斷專行。經濟體制改革將使他們失去對“公有制”經濟的控制權。當然，思想解放對於他們習慣的“輿論一律”來說，更是不能容忍的異端。

在三中全會之前，中共黨內大多數舊有當權派，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而處于“在野派”的位置。“兩個凡是”壓得他們抬不起頭來，所以他們擁護思想解放。但是“兩個凡是”失敗之後，情況就變化了。當他們重新當權之後，鞏固手中的權力，維持傳統體制，便成為他們利益攸關的頭等大事了。這也就是為甚麼鄧小平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之後，立即受到他們的擁護，並且理解為“糾正三中全會的右傾”的深刻背景。

和這種背景相適應，理論工作務虛會之後，原來聚集在“思想解放”旗幟下的理論隊伍發生分化，也就不奇怪了。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就不是一支獨立的力量。“士”的傳統出路是做官，也就是“仕”，要做官就必須服服貼貼給當權者効力。而當權者也確實需要這種人才。這也是一種利益上的結合，不足為怪的。

事實上被指責為“和黨分道揚鑣”的，正是堅持三中全會方針沿着改革的路線繼續往前走的一批人。而以“黨”自居的，恰恰是害怕改革危及自己既得利益的當權派的代言人。

不幸的是，以“黨”自居的這些人，確實被當權者看成自己人。三中全會以後，他們逐漸控制了實權，並且一步步地排斥和打擊思想解放運動中走在前列、三中全會之後也不想停息的那些人，直到最後把他們全部淘汰出局。

這是觀察新時期思想鬥爭運動的一條基本綫索。

新時期思想鬥爭的特點

和這條綫索相適應，新時期的思想鬥爭常常是關起門來在黨內進行。這種鬥爭不但相當激烈，而且十分曲折複雜。那種縱橫捭闔，明爭暗鬥，局外人是難以體會的。雖然這種鬥爭有時在社會上也有表現，但是除了幾次“反自由化”高潮之外，一般都震動較小。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每次思想鬥爭的發動者都是他自己。新時期則不同了。最高領導人也親自發動過鬥爭，但為數不多。比較多的鬥爭，都是以“黨”自居的二三流“權威”人物發動的。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發動思想鬥爭的人物未嘗不想把運動搞得驚天動地，使全中國都跟着他的指揮棒團團轉，對“異端”思想群起而攻之。但是有三個條件限制了他們的意願：

一、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已經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能夠任意折騰中國的權威人物了。

二、中國人民已經不再是可以任意愚弄的老百姓。至少他們都已經厭倦于永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了。

三、“經濟建設為中心”還不單單是執政黨的一句口號。它已經成為整個中國民族在今天的世界上能否站得住腳的頭等大事。各界人等差不多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上面。在這種情況下，誰要是不這樣做，便無法過日子。熱心于折騰的人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便會沒有飯吃，如果是當政者，就會垮臺。因此，只要頭腦沒有發昏，任何當政者也不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這個風險的。

上面三條，就是新時期思想領域雖然有時好像“黑雲壓城”，但是終究沒有在社會上掀起太大的風雨的真正原因。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意識形態方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從此冰消瓦解。不是的。只要政治制度不改革，新時期的思想鬥爭仍將繼續。而且，正因為難以用政治運動的方式去對付思想異己，於是採用組織手段直到司法手段來懲治對手，倒是逐漸多起來，甚至在某個時候成為主要手段。

二 堅持甚麼樣的“四項原則”

“四項原則”成爲反改革的法寶

按照權威人物之一鄧力群的說法，“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分道揚鑣之後，曾經鬥爭了幾個“回合”。其中一個回合是“堅持和反對四項原則的鬥爭”。當然，以他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堅持四項原則”的。

如果不論是非曲直，這種“回合說”是合乎實際的。自從中共制定三中全會路綫以後，特別是鄧小平宣布“四項原則”之後，鬥爭就沒有停過。雙方對三中全會路綫和“四項基本原則”各有不同的態度和解釋。理論上的鬥爭和現實的鬥爭完全是分不開的。胡喬

木和鄧力群所理解的“四項原則”，確實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也就是毛澤東那條“革命路線”。雖然在毛澤東的“創造性地發展”下，這些原則多少有點走樣，但他只是沿着傳統模式往左邊走得更遠而已。在毛澤東路线下薰陶了幾十年的各級中共領導骨幹的心目中，“四項原則”當然就是他們多年來走慣了的那條老路。按照這條老路，“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堅持“一大二公”的傳統模式，就是堅持老一套的計劃經濟。甚麼“包產到戶”，那是“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嚴加取締。所以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剛剛講完，一些省的掌權者立刻在農村“堅持”起他們那種“社會主義”來了。他們不但嚴厲制止包產到戶，甚至連農民的自留地都砍掉了。

這些當權者心目中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更沒有二話可說。對於“西單牆”，以及民間組織和刊物，他們早就恨之入骨。現在既然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放手取締和鎮壓好了。果然，許多大城市和省會的所謂“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都被取締，許多青年被捕入獄。北京的魏京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而已。粉碎四人幫以後，各地涌現了一大批思想活躍追求民主的優秀青年。在這個“第一回合”中，基本上都被打下去了。

至于“堅持黨的領導”，那更是當權者愛不釋手的法寶，因為他心目中的“黨的領導”就是“我說了算”。有了這一條，一切就都好辦了。

按照這種理解，三中全會剛剛決定要實行的改革，還沒有開始就要被斬送，一切都回到毛澤東時代，那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了。事實上這股風已經刮起來，農村尤其首當其衝。

用三中全會精神去解釋“四項原則”

顯然，必須對“四項原則”作出新的解釋，使它不致被保守勢力用來作為反對三中全會的工具，不致變成他們打人的四根棍子。

基于這種考慮，《人民日報》在請示胡耀邦之後，從一九七九年五月起，連續發表了李洪林三篇系列文章^②：

《我們堅持甚麼樣的社會主義》（五月九日）

《我們堅持甚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六月二十二日）

《我們堅持甚麼樣的黨的領導》（十月五日）

這些文章用三中全會精神去解釋四項原則，受到擁護三中全會的人們熱烈歡迎。由於《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發表這些文章就等於給群眾吃了一顆定心丸，使大家知道三中全會精神沒有變，中國不會走回頭路了。

隨著這些文章的發表，報社收到大量讀者來信。他們紛紛反映當地的當權派怎樣利用“四項原則”去壓制擁護三中全會的人，特別是在農村禁止包產到戶。有的來信還反映，在真理標準討論中贊成實踐標準的人們，不久前被壓得抬不起頭來。如今《人民日報》發了系列文章，使受壓的人又抬起頭來，敢于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觀點了。

但是這幾篇文章卻引起“權威”們的不快，甚至文章的標題就使他們無名火起。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會議上說：“社會上現在有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你一說‘黨的領導’，他就說‘甚麼樣的黨的領導？’”他不指名地批評李洪林說：“一個黨員，一個有很長黨齡的幹部，對於要堅持黨的領導發生懷疑，這就成為嚴重的問題了。”

李洪林這三篇系列文章，從一九七九年發表之後，一直成為胡喬木和鄧力群等“馬克思主義者”反對“自由化”的靶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都沒有停止。“六·四”後在《宣傳手冊》（一九八九年十五期）上有一篇署名華夏的文章《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四次泛濫及其教訓》，就把李洪林的系列文章作為“自由化”思潮第一次泛濫的代表。華夏說，李洪林的系列文章是“針對”鄧小平的講話，“與社會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思潮相呼應，與四項基本

原則唱對臺戲，蓄意制造思想混亂。”

從批判者斷章取義摘引最多的言論看來，這幾篇文章中最為權威們惱火的是下列幾個觀點：

“不要一聽說有人懷疑社會主義，趕緊就去批判。因為單是懷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壞事。要看懷疑甚麼東西。對科學表示懷疑，當然不對。對迷信表示懷疑，卻是一種進步。”^④

“必須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民主從來不是誰恩賜的。”^⑤

“所謂堅持黨的領導，是不是說，共產黨具有‘絕對權威’，不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條件，都是‘當然領導’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歷史運動中能站在前面，並能帶領群眾前進的政黨，就能擔當領導；否則，就不能擔當領導。誰能領導，誰不能領導，最後的選擇者是人民。”^⑥

其實這三篇文章連同它遭到指責的上述觀點，都是地道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絲毫沒有“離經叛道”之處。所以“權威”們雖然不滿，也無法公開批判。他們只好在“內部”做手腳，一是在各種會議上“缺席裁判”，一是在背地裏斷章取義加以歪曲印成“機密”簡報，既向中共中央告黑狀，又向全國散布誹謗。只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李洪林已經被逮捕起來，再無還手之力的時候，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才來到前臺。反正這時也用不着講甚麼道理，隨便怎麼信口開河都可以理直氣壯。比如《宣傳手冊》上那篇批判李洪林的文章，竟把一九七八年出現的“西單牆”，一九七九年三月的魏京生的大字報，都算在李洪林的帳上，說是受了李的系列文章的影響。其實這三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五月才開始發表的。

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探討

除了圍繞《人民日報》系列文章的鬥爭之外，這個“第一回合”還包括中國處於甚麼樣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

三中全會既然要使中國現代化，便要弄清中國目前究竟處于甚麼發展階段，這是最基本的國情，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過去毛澤東已經把這個問題弄得一塌糊塗；原來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得政權後卻不去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要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匆匆忙忙消滅了私有制之後，又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碰了個大釘子之後，又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當他撒手人寰的時候，中國已經被折騰得頻臨絕境了。現在既然要進行現代化建設，總得研究一下中國處在甚麼樣的歷史階段。

一九七九年，理論界就有人陸續提出，中國還沒有進入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最早的是蘇紹智和馮蘭瑞，他們提出，中國並未進入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只是“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哲學研究所一個青年陶德榮在內部刊物《國內哲學動態》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發表一篇《關於社會主義的一點淺見》，也抱有同樣觀點。

但是胡喬木卻下令禁止這種討論，因為按照他的觀點，對社會主義進行討論，就要動搖社會主義。于是他命人寫文章進行批評，並且規定，只准發表批評文章，不准發表反批評的文章。

其實這些探討社會主義的文章，並非懷疑“四項原則”，更沒有“動搖社會主義”之意。他們只是希望不要重犯毛澤東時代脫離中國社會實際，超越歷史階段的錯誤，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時候，充分認識中國國情而已。實事上幾年之後，中共中央已經正式確定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當時沒有這種禁令，而是展開切實的自由討論，中共中央完全能夠早幾年作出這個結論。

胡耀邦對改革派的支持

在這個“回合”的鬥爭中，胡耀邦是堅定地站在遭到胡喬木攻擊的一方的。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李洪林系列文章第二

篇的當天，他曾把李找去，談到當時左傾頑固勢力利用“四項原則”攻擊三中全會。所以他非常欣賞用三中全會精神來解釋“四項原則”，並要李繼續寫下去，“一定要在四項原則上和他們劃清界限。”^⑥

七月二十日，當胡耀邦得知胡喬木批評蘇紹智等人的觀點，並禁止討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時，在一份材料上批道：

“探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當然應當允許。我不相信喬木同志竟然不許。不能說我們黨對當前社會現狀沒有正確認識吧！說探討這些問題十分必要，我也看不出。十分必要的事是同心同德，聚精會神研究四化，大幹四化！”

這份材料還反映：因為胡喬木不准刊登反批評的文章，所以社會科學院有人說：“這樣做法還談得上甚麼雙百方針，這又是把理論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搞。”反映強烈者甚至說：“不准討論還有甚麼言論自由，簡直是封建法西斯！”有的人則惴惴不安，說“知識分子有一天還要倒霉。”

胡耀邦在這裏批示道：“我不相信知識分子有一天還要倒霉。放這個空氣不好吧。”善良的胡耀邦和很多天真的人們一樣，以為知識分子挨整的日子終於過去了。他怎能做到，不但有一天知識分子還要倒霉，而且他這個總書記都會因為同情和保護知識分子而下臺呢？

三 郭羅基事件

最有爭議的理論家

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郭羅基。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曾經起過重大作用。特別是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之後，思想解放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和黨分道揚鑣”的帽子已經扣過來的時候，郭羅基連續發表了幾篇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文章。這些文章提出的都

是敏感的政治問題，並且以精闢的見解贏得眾多讀者，同時也激怒了以“黨”自居的“權威”。因此，他成了這個時期最有爭議的理論家。

文化大革命中以“惡毒攻擊”罪慘遭殺害的張志新，一九七九年春得到昭雪。郭羅基為此寫了一篇《誰之罪》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

張志新被害之前曾經在監獄裏受盡凌辱和折磨，她不但作為政治犯備受虐待，而且作為一個女性遭到侮辱。因此她當時憤怒地指出：“行凶者，幫凶助威侮辱者，你們可以逃之夭夭嗎？不，我要向黨向人民控告你們，要聲討你們。你們要不認錯，將會受到歷史的懲罰。”

郭羅基在《誰之罪》中問道：那些行凶者和幫凶者是否認錯了呢？“是不是應該給以懲罰呢？”

使“權威”和他所代表的當權者特別惱火的是《誰之罪》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張志新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但是“在新中國，為真理而鬥爭，為甚麼還要不怕坐牢、不怕殺頭，難道這是合理的現實嗎？”所以郭羅基的結論是：“要改造那追求真理要以流血犧牲為代價的環境，這才觸及問題的本質。”^⑦

在黨報上首次公開呼吁言論自由

郭羅基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是《政治問題為甚麼就不能自由討論？》原來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內部刊物《未定稿》（第43期）上，後來修改一下，改名《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在《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篇公開呼喚言論自由、批判以言治罪的文章。

他寫道：“政治上的發言權是言論自由的靈魂，如果在政治問題上剝奪了言論自由，在其他問題上的言論自由就沒有多大意義，而且也往往得不到保證。”^⑧

在當代中國，甚麼問題只要牽涉到政治問題，或被宣布為政治問題，便成為禁區。冒犯禁區者便要被扣上政治帽子，便會由“人民”變成被專政的“敵人”。因此，知識界常常呼籲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不要混淆二者界限，不要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如此等等。也就是說，政治問題是掌權者的領地，是老百姓不能涉足的禁區。這不但是當權者的意願，而且也是老百姓自願遵守的戒律。只是老百姓都懇求當權者不要把政治的領地任意擴大罷了。

郭羅基是公然打破這個禁區的第一人。他說：“政治問題為甚麼就不能討論？”“現在要衝破這個禁區。是民主政治就應當允許討論，不許討論，就是獨裁政治、專制政治、法西斯政治。”^④

他還嘲笑了“發揚民主就是讓人講話”的流行說法。這是毛澤東所提倡並為中共內部較為開明的領導人所奉行的一則銘言。

他說：“讓人講話不過是一種開明專制，並沒有改變專制的實質。”“人民是社會的主人，國家工作人員是社會的公僕……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只是公僕讓主人講話，這不是笑話嗎？”^⑤

促使郭羅基寫出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大概就是胡奇木下令禁止討論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當時理論界對這則禁令極為不滿，並引起胡耀邦的關注。前述胡耀邦的批示，就是給這種討論開的綠燈，同時也是對胡奇木的含蓄批評。郭羅基的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的。也正是在同一個背景下，《人民日報》把這篇文章發表了。

顯然，這樣一篇文章決不可能平安無事。它不但直接刺痛了胡奇木和所有習慣于“輿論一律”的掌權者，而且是向三十年來的壓制言論自由的制度公開挑戰。

無巧不成書。此文的發表（十一月十四日）恰恰在審判魏京生（十月十六日）之後。而郭羅基的文章中正好有一處說到不能“以言治罪”。

他寫道：“反革命分子之所以成為反革命分子，是根據他的反革命行為判定的。如果發表反革命的意見，也僅僅是一種意見，不等於反革命行為，只能說是思想上的論敵。”“有人發表反革命言論怎麼辦？好辦，你發表革命言論同他辯論，對他批判就是了。對反革命言論不能放縱、姑息，但不要動手抓人。法律懲罰的對象是行為，不是思想，懲罰思想本身就是違法的行為。”^⑩

人們都知道，魏京生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貼出批評鄧小平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三月二十九日被捕的。十月十六日法庭以兩項罪名判他十五年監禁，實際上主要是“反革命宣傳鼓動”。而這個“反革命宣傳鼓動”到底是“言論”還是“行動”，一直是有爭議的。從當代中國三十年的思想運動史來看，大體上都是以言治罪的。被治罪者都認為自己只是發表言論。治罪者的邏輯則是：發表言論本身就是行動，因為這言論是在施加影響于他人。在這種邏輯下，倒霉的只能是知識分子，因為思想必須借語言來表達，一表達就可以被說成“行動”，因為表達出來就是說給人聽或寫給人看的。當年胡風寫給中共中央的意見書和寫給友人的信件都可據以定罪，如今魏京生的大字報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郭羅基事件背後的胡喬木和胡耀邦

郭羅基的文章本是審判魏京生之前寫的。不過這無關宏旨，文章的鋒芒所向，確實包括此案在內。所以這篇文章一發表，就被胡喬木告到鄧小平那裏去了。他告的是郭羅基，實際上連帶着胡耀邦，因為胡耀邦當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

這一下讓胡耀邦很為難。他是愛護郭羅基的，他並不認為郭的文章有多么大的問題，但又不得不讓《人民日報》再發一篇文章，把這個問題說得更周全些，以免被人抓鬚子。

《人民日報》當即約請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高銘喧寫一篇《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因為這件事是胡耀邦交代的，

所以他們十分慎重，下面是報社的報告：

“我們把文章的清樣送耀邦同志審閱。耀邦同志閱後作了指示：‘對於這個問題，要非常慎重，要考慮到各個方面，建議將高文送有關單位征求意见，然後修改發表。’耀邦同志這個指示是李洪林同志口頭傳達的。李洪林同志受耀邦同志委托，也看了這篇文章，提了修改意見。我們根據耀邦同志指示，把高文送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法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法律系征求意见……修改後才發表的。”^②

這篇文章主要說明有些言論可以構成犯罪。“刑法上規定的誹謗罪、誣陷罪、教唆犯罪都是與一定的言論分不開的。”

文章幾經推敲，最後在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九日發表。胡喬木仍不滿意，說是“非常沒有力量”。不過胡耀邦沒有再理會，《人民日報》也沒有再理會。這事好像就過去了，郭羅基好像平安無事了。

其實不然。“反革命言論也有自由”成了刺在郭羅基臉上的“犯罪金印”。“權威”們和黨內某些高層人士，只要想動手整肅“與黨分道揚鑣”的人們，差不多都要挂出這個靶子進行射擊。而郭羅基本人，也被“權威”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拔尖人物。”在最高當局的關懷下，他終於在一九八二年被強行趕出北京，調往南京大學任教，成為理論隊伍“分道揚鑣後”第一個中箭落馬者。（注一）

（注一）郭羅基到南京大學後，在哲學系任教授，一九八九年三月又獲博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六四”後因郭反對鎮壓，在黨員重新登記時，被清洗出黨。一九九一年南京大學黨委以“政治不合格”為由，取消郭的教授及研究生導師資格。郭為此向法院起訴南京大學黨委，成為企圖通過法律途徑控告中共黨組織違法行為的第一人。（詳見郭羅基著《共產黨違法案紀實》）

四 “生產目的”的討論

胡耀邦發動生產目的的討論

一九七九年曾經有一次重振思想解放運動勢頭的機會，可惜在胡喬木的扼殺之下中途夭折了。這次機會就是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

關於生產目的問題，最初是《人民日報》提出來的。幾十年來，由於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局面，再加上左傾路線和唯意志論，強制推行“先生產，後生活”和“重積累，輕消費”的方針，根本就不把人民的生活放在眼裏，因此反過來又損害了生產。到底是為生產而生產，還是為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產，這是兩種不同的出發點。在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之後，這個問題很有弄清楚的必要。

胡耀邦敏銳地覺察到，這是真理標準討論之後一次難得的良機，可以使已經沉寂下去的思想解放勢頭重新振作起來。因此他果斷地決定發動一場“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他指示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根據《人民日報》理論部提供的材料精心起草一篇文章，以便發動全國進行討論。這個討論將會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重要的是，它一定大大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三中全會雖然決定要改革，但只是從路線上指明方向。至于怎樣改革，樹立甚麼目標，採取甚麼模式，經過甚麼步驟，還完全沒有提上日程。胡耀邦當時抓住這個“生產目的”問題，確實抓到了關鍵。因為計劃經濟的出發點和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截然對立的兩極。計劃經濟的出發點是長官的腦袋。長官拍拍腦袋定出長期的和年度的計劃指標，這就決定了全國的生產，至于產品對不對路，消費者是否需要，那就不管了。因此，國民經濟結構失調，生產和消費脫節，是它根本無法擺脫的困境。而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

消費者需要，這只無形的手調節着全社會的生產。“生產目的”的討論如果自由展開並且深入下去，一定會接觸到經濟生活的深層機制，而且最終一定會找到市場經濟這條出路。

在胡耀邦的籌畫下，黨校理論研究室寫出一篇文章，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題目是《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這就揭開了討論的序幕。

全國各界對這個討論的反應十分熱烈，思想界一下子活躍起來了。首都和各地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參加討論。

可惜這種良好形勢只是曇花一現，一個多月之後，就悄然收場了。當時人們都非常奇怪，不知出了甚麼事情。

反改革勢力的反撲

原來這場討論觸犯了維護計劃經濟體制的當權派。因為《人民日報》的文章批評了他們“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說：“按照這個口號，似乎有一段時間可以只抓生產，不抓生活，或者重生產，輕生活。多年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只重視積累、不重視消費……與套用這個口號是有關係的。”事實上這正是中國多年計劃經濟的方針。《人民日報》的文章批評這個方針，當然是在主管計劃經濟的太歲頭上動土，于是由石油工業部出面，對《人民日報》進行反駁。

石油工業部的文章刊登在《石油通訊》上，題目是《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副標題是《兼論大慶“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如果是參加討論，批駁對方的觀點，當然是正常現象。可是這篇文章卻超出了討論的範圍。它先把“先生產，後生活”和“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針等同起來，然後就指責說：《人民日報》批評“先生產，後生活”的方針，是在“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發展生產引到追求個人生活上去”，接着就把政治帽子扣過來了。這篇文章用指桑罵槐的口氣說：“現在社會上有極少數

人，利用群衆生活上的某些困難，把矛頭指向中央……嘩眾取寵，製造事端，對此決不能喪失警惕，決不能姑息遷就，決不能讓他們占便宜。排除一切干擾，集中精力抓生產，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首要任務。”文章最後引用鄧小平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對於來自‘左’的和右的，總想用各種形式搞動亂，破壞安定團結局面，違背絕大多數人利益和意願的錯誤傾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團結起來，抵制、譴責和反對這些錯誤傾向。”^⑩

很明顯，生產目的的討論已經被這篇反駁文章說成“干擾生產”甚至是“搞動亂”了。

這場討論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發起的，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它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權威性更是社會公認的。如果說“生產目的”的討論有甚麼“後臺”的話，那麼這“後臺”是很硬的。然而一個石油工業部居然能夠用這種“大批判”的筆法寫出如此強硬的反駁文章，顯然有更硬的後臺給它撐腰。這後臺是誰呢？人們首先看到的是維護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力量。幾十年來，它一直控制着中國的經濟生活。“人、財、物”和“產、供、銷”，完全在他們手心裏掌握着。在這種體制下，長官意志不光決定着生產甚麼和生產多少，而且每個居民一月吃幾斤糧食，一年穿幾尺布，都由他們決定。也就是說，我生產甚麼，你就消費甚麼，我生產多少，你就消費多少。現在討論生產目的，就是說要把事情顛倒過來，讓消費者成為上帝，這樣一來，那一整套計劃體制不是泡湯了嗎？所以這場討論得罪的還不單是主管計劃經濟的個別大員，而是和這個體制命運攸關的整個利益集團。

當然，光是石油部這類扣帽子的文章，不可能改變討論的進程。《人民日報》就不為所動，而且主動把石油部的文章印出來送給中央領導人參考，準備繼續討論。

胡喬木提出真理標準討論夭折

但是，發動這場討論的胡耀邦最後把討論停下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胡喬木反對這場討論。當然，副秘書長硬不過正秘書長，所以胡喬木先找到黨中央主席華國鋒。華國鋒已經領教過真理標準討論的滋味，當然不會喜歡這個“生產目的”的討論。況且他自己在“生產目的”的討論中的處境，和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處境可以說完全一樣，因為他正是舊經濟體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主要決策人，“要搞十來個大慶”，就是他定的。所以這個討論如果進行下去，等待他的一定是又一次檢討。所以他自然不贊成這場討論。

於是胡喬木又到鄧小平那裏，說華國鋒不贊成“生產目的”的討論。鄧小平當然不會去維護舊的經濟體制，但他不能不考慮舊體制後面的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權衡。華國鋒的意見不能不占很大分量。而且“生產目的”問題畢竟不像解決“兩個凡是”那樣緊迫。所以，大概是出于維護團結，鄧小平採納了胡喬木的意見。

最後胡喬木來到胡耀邦那裏，把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意見拿了出來。胡耀邦還有甚麼辦法呢？只好在強大的壓力下面妥協了。

《人民日報》得知這個情況之後，專門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要求繼續討論下去。胡耀邦把《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面談，希望報社照顧大局，照顧團結，也照顧他的困難，把討論停下來。

“生產目的”的討論就這樣中途夭折了。一次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良機，就這樣錯過了。

事情都是事後看得更清楚。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現在摸到了它的規律，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是中國人經過痛苦的經歷之後所找到的真理。在一九七九年，人們自然不可能一下子看清這一點。但是只要思想界活躍起來，不設甚麼禁區，可

以自由討論，總會逐漸接近這個真理的。

這就是說，由於錯過這次機會，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步子，大約被推遲了十幾年。

五 痛清封建主義影響問題

思想戰線上最重要的任務是什么？

一九八〇年，已經沉靜下去的思想解放運動又有一次重振的機會。這一年六月，鄧小平接受李維漢的建議，提出一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任務。可惜這件事情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李維漢是中共元老（一九二二年的黨員）早年和毛澤東等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一九一九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和周恩來鄧小平等共事。他以前擔任黨的重要領導工作多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不在第一線工作，但勤于思考，很關心中共的建設。

一九八〇年五月，華國鋒在軍委總政治部一個會議上的講話中，忽然重新提出“興無滅資”的口號（即“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這本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的極左口號，現在又出現在中共中央主席的講話當中，不能不引起舉國關注。黨內外都議論紛紛。理論界有不少人向中央宣傳部提議，不要再使用這個口號。當時胡耀邦已經離開中宣部，專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宣部長改由王任重擔任。王任重把理論界的意見反映給鄧小平，因為華國鋒這個講話是經鄧小平看過的。

這時，李維漢也找到鄧小平，也向他提出“興無滅資”口號不宜再提。鄧小平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但是李維漢找鄧小平談話的主旨是批判封建主義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能如此深刻地揭示封建主義對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嚴重影響，並把肅清這種影響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提出來，李維漢是第一個人。

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的意見。

李維漢談封建主義對中共的深厚影響

這兩位老戰友談了兩個多小時。詳細內容只有等以後公布檔案才能知道。現在只能從鄧小平事後向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記錄中看到它的要點。(注一)

鄧小平是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召見胡喬木和鄧力群的。他一共談了三個問題(有關李維漢談話的是第二部分)，由他們兩人記錄下來，整理成文件傳達下去。但是後來編印鄧小平文集和黨的文獻時，第二部分不見了。世人看到的，只是同一天談話的第一和第三兩部分。而這兩部分則分別獨立成篇，第一部分的標題是《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第三部分的標題是《處理兄弟黨關係的一條重要原則》。

好在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的阮銘手中存有中宣部印發的鄧小平講話第二部分的原文，後來他在《鄧小平帝國》中把它全文披露出來。這是一份珍貴的文獻，不可湮沒：

前幾天李維漢同志來找我，從“興無滅資”談起，談了兩個多小時。我看這個口號有缺點，不完全。……

李維漢同志主要講了一個問題：我們思想戰線上最重要的任務還不是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而是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李維漢同志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很長，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在廣大人民群衆中，有很深的傳統，在黨內也有很大的影響。對它的影響不能低估。

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封建剝削制度消滅了。反封建主義的任務並沒有完成。毛、劉、周，都沒有完成。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受封建主義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沒有把肅清它作為一個重要任務來對待。

現在黨內為甚麼有人搞特權，這和封建主義影響分不開：

還有到處搞紀念館，主席的，總理的，現在又搞少奇的。特別是家長制，嚴重影響正常的黨內生活。李維漢同志說，他希望現在的黨中央能完成這個任務。

李維漢同志的意見很好，很值得重視。比如家長制，這在我們黨內是有傳統的。陳獨秀後期搞家長制就很厲害。那時候遞了八個大秘書，報到的只有我一個。每次中央開會我都參加。開起會來，不管別人怎麼講，都是他一個人說了算。黨內一些同志說，他是“老頭子”。“老頭子”說的話才算數，你照辦就是了。

瞿秋白同志管了一段事，態度比較溫和，不過時間很短。

接着是向宗發，實際上是李立三同志管事，家長制也是很厲害的。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領袖終身制的問題，我們這代人活着的時候非解決不可。

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

李維漢同志建議我在十二大講話專講一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我看，這個意思首先要體現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⑩

政治局常委接受李維漢建議

鄧小平談話之後十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據胡耀邦傳達，常委考慮從政治制度和思想輿論兩個方面來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在制度方面，他說：“革命成功以後，黨沒有搞好，國家制度也沒有搞好，權力過分集中，終身制，鐵飯碗，能上不能下，這方面我們比資產階級差……這個問題必須從制度上下決心解決。”

在思想輿論方面，胡耀邦說：“我們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的

洗禮。資產階級民主同封建專制來比是很大很大的進步。我們革命後無形中發展了封建的東西……我們現在的宣傳再不能搞封建那一套，再搞有亡黨亡國亡頭的危險。”他認為，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得搞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⑨

看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已經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了：這真是極其難得的好機會。知識界當然更是雀躍不已，理論界已經磨拳擦掌，準備把六十一年前“五四”運動打出的反封建大旗重新舉起。大家都認為，從思想上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掃清道路的時候來到了。

胡喬木一封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化烏有

誰知中國的政治真是“天有不測風雲”，最高領導核心已經決定的事情都可以改變。

六月二十五日胡喬木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耀邦同志：對於批判黨內、政府內和社會上封建主義思想殘餘問題，需要有慎重準備，究竟反對甚麼，糾正甚麼，如何改革，需要明確規定，以免一轟而起，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甚至組織上的混亂。”他還提出：“現在只提反對封建主義而放鬆反對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和各種惡性腐化現象，也不妥當。”最後，他建議“指定幾個人先研究一下提出方案，經書記處討論後再定……”^⑩

中央宣傳部印發了胡喬木的信。這雖然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並不是中央文件，但卻把中央已經決定的事情束之高閣了。因為他規定的這一套“要慎重”，要“指定幾個人先研究”，要“提出方案”，要“經書記處討論”，等等戒律，已經把人們的手腳都捆住了。整個宣傳系統，整個思想文化界，包括各個新聞出版單位，在中央拿出“方案”之前，誰也無法動作了。那麼胡喬木寫完這封信之後是不是去“指定幾個人”或“提出”甚麼“方案”呢？根本就沒有。他從來就沒有“指定”過“幾個人”，當然更不會“研究”出甚麼“方案”。

書記處自然不可能去“討論”那並不存在的“方案”。幾個月過去了，政治局常委關於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決定，就這樣被束之高閣。“生產目的”討論夭折之後又一次解放思想的機會，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

事實上，像肅清封建主義影響這件事，本是人民從舊思想束縛下的自我解放。這是一種思想解放運動。對這種事情指點一下，給個方向，也就夠了。實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根據李維漢的建議作了這件事。全國各界，特別是思想界，行動起來就是了。然而胡喬木在中央決定之外又給思想解放設下戒律，要群衆老老實實等候領導上指定的“幾個人”定出“方案”，這本身就是對“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極大諷刺。

當然，胡喬木這封信之所以能夠在實際上取消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而沒有受到任何追究，也正好反映出中共內部封建主義積習之深，特別是權力壟斷對這個黨的腐蝕已經達到甚麼程度了。胡喬木的信和他把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工作擱置起來的手法，正是壟斷權力的常權派求之不得的。所以那封短短的信件竟能發生如此大的效力，這在中共黨史上都是少有的。

(注一)鄧小平有些言論，都是向胡喬木和鄧力群兩個人談的，有時是向其中一個人談的。這些談話由他們記錄下來，整理之後，經鄧小平過目，然後再向下面傳達。

這種格局的形成，有歷史淵源。胡喬木擅于文筆，是中共黨內公認的大秀才，抗日戰爭時期就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以後也一直不離中央左右。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二度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專門讓胡喬木組建一個國務院研究室，集中一批精幹力量，成為鄧小平的得力理論班子和智囊團。

鄧力群早年在延安，後來在建國以後，都在中央機關工作，只是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作過地方領導工作，後來在新

疆和平解放上也起過重要作用。王震在新疆主持工作時，鄧力群是新疆區黨委的宣傳部長，兩人有良好的關係。鄧小平復出後，王震對鄧力群多有提挈。

一九七五年胡喬木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時，鄧力群為副主任之一。他曾負責為鄧小平起草一篇《論綱綱》的重要文章。四人幫批判鄧小平時，《論綱綱》被定為“大毒草”。但鄧力群沒有往鄧小平身上推，而是獨立承擔全部責任，因此得到人們尊重和鄧小平的賞識。而胡喬木則在“批鄧，反擊右傾癟衆風”中惶恐失據，向四人幫揭發了鄧小平許多“翻案罪行”，因而為人所不齒。

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第三次復出。胡喬木無顏再見鄧小平，懇請王震和鄧力群代為求情。鄧小平倒是諒解他的苦衷，對鄧力群說，胡喬木的“揭發”，都是事實，還沒有捏造。于是重新起用胡喬木。

胡喬木長期給中共領袖當“筆杆子”，極善於領會精神，演繹成文，而且義理詞章，俱稱精到，故總是受到重用。

這大概就是鄧小平為甚麼常常單獨召見胡喬木和鄧力群並且授權他們傳達他的談話內容的原因。

胡喬木和鄧力群因此在中共領導核心內部居于關鍵部位，常常起重要作用。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是鄧小平所倚重的人物。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他們成為理論界的“權威”，並不斷在黨內發動思想鬥爭，以整肅被他們指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

六 政治制度改革的夭折

鄧小平發動政治制度改革

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工作雖然被束之高閣了，鄧小平並沒有

停步。他在繼續沿着這條思路往前走。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他指出現有的政治制度有五大弊端：一是官僚主義，二是權力過分集中，三是家長制，四是領導職務終身制，五是形形色色的特權。^①

所謂官僚主義，不只是中共通常說的“官僚主義作風”。他一口氣列舉了二十四種現象：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官氣十足，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

他指出，當代中國的官僚主義除了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和社會主義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有密切關係。應該說，他抓住了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根源。封建專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相結合，就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龐大的官僚機器。

關於第二個弊端，他也是針見血地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

鄧小平在這裏已經接觸到中國政治的最大弊端：一黨專政，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共產黨手裏，而共產黨的權力又集中在少數人乃至一個人手裏。不過他沒有點破“一黨專政”這個要害，顯然他並沒有打算解決這個層次的問題。不過他已經提出制度的問題了，這是自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來，第一次由一個黨的領導人主動提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在這一點上，他比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們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鄧小平所遇到的頂點

他清醒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

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⑩他還說，毛澤東認識到：斯大林破壞法制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但毛認識到卻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就是因為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尤其使人耳目一新的是他下面這句意味深長的話：

“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⑪

這就是說，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人民就不會信任中國共產黨。所謂“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告吹。自從提出“四項原則”以來，特別是對於“黨的領導”，從來都是“決不許可”有絲毫動搖或懷疑的。如今鄧小平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作為人民接受黨的領導的前提條件，這就把中共從“絕對權威”的雲端放到地上，以人民的信任作為繼續執政的條件了。

應該說，鄧小平這個講話，是他在開拓中國新的歷史過程中所能達到的最光輝的頂點。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鄧的講話，于八月三十一日正式通過。看來，長期支配中國的舊政治制度好像來到一個轉折點了。思想界由於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被阻斷而鬱鬱不暢的心情一下子又振作起來了。

胡喬木的又一封信

誰知中國的政局波譎雲詭，幾個月後，事情突然逆轉了。逆轉的表面起因是波蘭政治危機。一九八〇年七月，波蘭人民起來反抗共產黨的統治，反抗蘇聯的壓迫。這個事件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引起震動，因為它表明傳統的蘇聯模式已經走投無路。中國共產黨當時是支持波蘭人民鬥爭的，而且有信心波蘭式的事件不會在中國發生，因為第一，中國獨立自主，不像波蘭屈從于蘇聯霸權

之下。第二，中國正在改革，三中全會路線深得人心。因此，雖然波蘭七月發生事變，中共中央八月決定進行政治改革，絲毫未受影響。

可是，胡喬木在九月二十四日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認為波蘭事件對中國有重大意義，要求黨中央和國家機關各個部門都要研究並制定對策，也就是認為中國有可能發生波蘭事件，要求黨中央“引為殷鑒”。^⑩十月初他又叫中央秘書局把這封信印發中央各機關和政府各部門及群眾團體。於是中央宣傳部馬上通知宣傳系統：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了。

決定性的逆轉——政治改革中斷

停止宣傳，還只是第一步，決定性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八〇年底。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主題是經濟調整。所謂調整就是緊縮財政開支，減少投資。因為一九八〇財政出現了一百多億元赤字，物價上漲幅度較大。其實這是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惡果。對國民經濟指標和財政支出作些調整當然是必要的，不過根本出路只能是堅持把改革進行下去。可是當時實際上採取的對策卻是這樣二十四個字：“抑需求，穩物價。促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這個會議的主角是陳雲和新上任的總理趙紫陽。鄧小平也講了話，他除了“完全同意”陳雲和趙紫陽的講話以外，在政治上也往後退了。他並沒有說不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了，但是加了一句話：“方法要細密，步驟要穩妥。”^⑪後來的事實證明，政治改革實際上停頓下來了。

鄧小平在這次講話裏，對“四項原則”又回到了八月以前的地方：“對於這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並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⑫八月份他講改革黨和國家

領導制度時，還把改革作為人民信任黨的前提條件。同時不言而喻，他認為黨的領導是建立在人民發自內心的信任上面的。現在他不但把“四項基本原則”當成人民必須無條件服從的絕對原則，而且要使之成為法律，也就是具有強制力量，誰要不服從，便要受到法律制裁。到了這個地步，不但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必改革，而且連領導作風都不必改進，因為任何人要是敢對共產黨的領導表現出三心二意，予以鎮壓就是了，何必費大力氣去改進作風以博得人民信任呢？

果然，一九八一年開始，思想界的形勢緊張起來了。

在阻擋政治制度改革上，胡喬木用的手法和他阻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時候一樣，也是寫了一封信。信是寫給總書記的，總書記沒有理會，胡喬木就直接叫秘書局印發給各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結果和上一封信一樣，又在實際上扭轉了中國局勢，使鄧小平改革中國黨政領導制度的宏願成為泡影，也使中央政治局關於政治制度改革的決定化為烏有。

同樣，這樣一封個人信件竟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為它投中了黨內壟斷國家權力的當權者的心願。

※※※

第九章 引文出處

- ①《三中全會以來》第4頁
- ②《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第110頁
- ③《理論風雲》第170頁
- ④同上，第184,186頁
- ⑤同上，第187頁
- ⑥《命運——李洪林自傳》第159頁
- ⑦《光明日報》1979年6月24日
- ⑧《人民日報》1979年11月14日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第 203 頁

⑤ 《石油通訊》1979 年第 36 期

⑥ 《鄧小平帝國》第 91—93 頁

⑦ 同上，第 93—94 頁

⑧ 同上，第 96 頁

⑨ 《三中全會以來》第 517 頁

⑩ 《三中全會以來》第 523—524 頁

⑪ 同上，第 524 頁

⑫ 《鄧小平帝國》第 107 頁

⑬ 《三中全會以來》第 632 頁

⑭ 同上，第 631 頁



一九七九年，郭羅基在鄧小平宣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後發表了幾篇繼續堅持思想解放的重頭文章，在全國影響很大，從而被說成“自由化的拔尖人物”。因為他的文章曾得到胡耀邦的支持，也就成為胡喬木和鄧力群著重打擊的對象，並被告到鄧小平面前，於一九八二年被趕出北京，成為思想解放隊伍中第一個中箭落馬者。

圖為一九九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的郭羅基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1981—1982)

新時期的最初兩年，“分道揚鑣”雙方的鬥爭大體上處于拉鋸狀態。以胡喬木和鄧力群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以“權威”自居，但是力量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壓倒對方的程度。一九八一年，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年，改革停下來了，意識形態收緊了。圍繞着評價毛澤東的爭論，已經以“高舉”毛澤東旗幟一方的勝利而告結束。接着一場新的思想批判運動就發動起來了：批判電影劇本《苦戀》。這是新時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第一次高潮。剛剛建立起來的“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體制”出現了第一道裂紋。思想解放運動的旗手胡耀邦，蒙受了“渙散軟弱”的指責。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思想界的形勢就急轉直下了。

一 收緊意識形態

攻守易位，全局逆轉

一九八一年是中共黨內“分道揚鑣”的兩支隊伍攻守易位之年。在此之前，思想解放高潮雖然已經過去，但是它的餘波仍在不斷衝擊。這種衝擊當然是不斷受挫，沒有一次能夠成為氣候，但它畢竟比較主動，可以說處于攻勢地位。

一九八一年起，事情就變化了。

陳雲曾在波蘭事件之後提出：“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在一九八〇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正式接受陳雲上述提法。這個會議不光調整經濟，同時也加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是個

全面“收緊”的會議。

加強政治思想控制的背景，除胡喬木給中央上書所說的波蘭“殷鑒”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國內狀況。在三十年來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激蕩下，民主空氣空前高漲，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特別活躍。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研究問題，出版手寫的或油印的報刊。雖然一九七九年“西單牆”已被取締，一些活躍人物如劉青、徐文立、陳爾晉等都已被捕，一九八〇年“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作為公民權利又被從憲法中取消，但是民主訴求並未減退。許多地方都有民間組織和民間刊物在活動。更令中共當局擔心的是一九八〇年在鄧小平“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倡議下，國內民主空氣異常高漲。這一年全面開展的縣級人民代表直接選舉（而且是差額選舉，即選民可在多個候選人中有選擇的自由，這比“等額選舉”民主多了），使有些地方的黨組織對選舉有“失控”之虞。特別使一些人驚張的是，有的地方居然出現了競選。尤其是北京大學，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的郭羅基竟被選為人民代表。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控制，對於獨掌政權的中共意味着甚麼，是不言而喻的。

胡喬木扼殺《生活》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這就是“《生活》半月刊事件”。這是被指控為“和黨分道揚鑣”的知識分子爭取開闢言論自由陣地的一次大膽嘗試。

《生活》原是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中國傑出的記者和政論家鄒韜奮主編的著名刊物。鄒韜奮所創辦的傳播新文化的陣地生活書店，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新知書店及讀書生活出版社合併成三聯書店，就是現在的三聯書店的前身。一九八〇年，也是在鄧小平八月關於政治改革講話的鼓舞下，三聯書店決定出版《生活》半月刊。取名《生活》自然有繼承和發展老《生活》周刊的意義。三聯書店總

經理、老出版家范用為《生活》半月刊擬定的“發刊旨趣”這樣寫道：

《生活》是一個思想性的半月刊。它要求以生動優美、犀利簡明的筆調，寫出文理清新，汪洋恣肆，幽默滑稽，韵味雋永的簡短文章，來論述政治、經濟、哲學、教育、文藝、歷史、自然、社會生活、道德風尚、青年修養、思想方法、工作作風等諸般問題。凡散文、隨筆、雜感、記事、紀行、回憶、讀書筆記、社會調查、讀者來信、寓言警句等形式均可采用。……

思想性是這個刊物的靈魂，生動優美、引人入勝而又深入淺出的文體是這個刊物的表達形式。”

顯然，光是這個“發刊旨趣”就有強大的吸引力。經過幾十年的思想禁錮，忽然在眼前出現這樣一塊思想園地，自然得到思想界的廣泛支持。所以經過一個短期的籌備之後，一九八一年一月就印出了《生活》(試刊)第一期。

按照慣例，籌備組把《試刊》送給“有關領導人”。同時送去的，還有準備作為這個刊物內部通訊的《生活通訊》第一期，上面有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為籌備《生活》半月刊而召開的座談會記錄。出席的有：于光遠、馬沛文、阮銘、何匡、劉賓雁、張順揚、嚴家其、胡平、項南、郭羅基、唐弢、蕭乾、廖沫沙、曾彥修、李洪林等。

籌備組大概沒有想到，當時掌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已經感到出版的刊物“太多了”，因為他們的任務就是“偵察”和“控制”，刊物越多，就越難控制。何況這個《生活》所接觸的作者名單就足以把這些官員嚇住了。(除了上述參加座談會的人們以外，在“試刊”上發表文章的還有方勵之、鍾惦秉、聶紺弩和已故的傅雷等老“右派”。)

果然，別的“領導人”還沒有過問，胡喬木首先就對名單中的胡平提出異議。他認為，此胡平是北京大學參加競選的青年人胡平。其實中國有許多個胡平。出席《生活》座談會的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胡平，並非北京大學那個“自由化”的胡平。不過這並不影響胡喬木一定要阻止《生活》半月刊出版的意願。果然，在他的“勸

阴”下，《生活》半月刊夭折了。它只出版了一期《試刊》。胡喬木使這本《試刊》成了當代中國思想史上的絕版珍貴文物。

劉賓雁早在座談會上就預言了：“《生活》不會很順當。我看得作打兩種官司的準備：一、小官司；為每期刊物的這篇那篇文章打官司；二、大官司——維護《生活》的生存權利。會有人要扼殺它的。”

不過這官司並沒有打。因為對方是胡喬木，而中國還沒有能受理控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法庭。

消滅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

其實《生活》半月刊之被扼殺，原是整個大局的一部分。一九八一年一開始，中共中央就對新聞報刊“加強領導”了。一月二十九日發出《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決定》說：“報刊、新聞、廣播、電視是我們黨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但是它們“存在着嚴重缺點”，“主要是沒有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富說服力地、經常和系統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言論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②

接着，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在中共和社會上民主運動的關係上是一個里程碑。粉碎四人幫後一直到三中全會，雙方一直合作得很好。社會上的民主運動一直堅定地支持鄧小平復出，鄧小平也明確地支持以“西單牆”為代表的民主運動。一九七九年三月以後，關係開始惡化。不過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的《指示》發布以前，雖然社會上的一些民辦刊物已被取締，一些青年已被關押，但都屬於“個案”。這個《指示》的出臺，標誌着中共和社會上的民主運動已經完全決裂。

《指示》說：“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採取的策

略，是盡量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着‘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④

《指示》中對人的處理沒有甚麼新意，和一般“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策精神完全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對“非法刊物”的處理方針：“決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指示》還有一項規定：“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⑤這大概是害怕國內外知道此事就會議論紛紛，特別是海外說三道四，使當局耳邊不得清淨。

這個《指示》本來要求制定“出版登記法”以控制“非法刊物”，但是後來陳雲制止了。陳雲說：“不要搞甚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⑥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沒有出版法。一切出版物都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出版局用行政手段控制。

二 重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

非毛化的勢頭

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中國就面臨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華國鋒作為中共第二代領袖，企圖用“兩個凡是”使中國繼續沿着毛的路線走，所以被歷史淘汰出局。鄧小平和胡耀邦舉起思想解放的旗幟，沖出毛澤東的陰影，把人們引上一條走向現代化的新路，才博得人民的信任，樹立起領導的權威。

這個過程，叫作“改革”，海外輿論有時也把它叫作“非毛化”。

叫作“非毛化”，是很確切的。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固然把中國引向絕路，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

十七年，也沒有太多值得留戀的東西。十七年間即使不折騰，頂多不過是把“蘇聯模式”搬到中國。那一套計劃經濟和極權政治照樣會把中國引入死胡同，只不過會比文化大革命那種胡作非為的後果來得晚一點而已。所以中共三中全會所實現的歷史轉折，實質就是擺脫毛澤東，也就是“非毛化”。這是中國人之幸。

如果趁熱打鐵，利用批判“兩個凡是”的勢頭，通過三中全會這個轉轍點，完全走上新路，雖然也會遇到毛派的阻撓，但是一定可以得到全黨和全國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套用秦朝末年農民起義時的一句話，可以說“天下苦毛暴政久矣！”這種人心所向，是無可匹敵的。

鄧小平怕作“赫魯曉夫”

可惜鄧小平沒有這樣做。海外“非毛化”的評論，無意中觸痛了他的心病——怕被指責為“中國的赫魯曉夫”。

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直是毛澤東終生擺脫不開的夢魘。因為他清楚，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斯大林的暴行，生前不可能有人敢說半個不字，但是死後必然有人清算。同樣，毛澤東預見到自己身後也一定有人會像赫魯曉夫那樣對待他。劉少奇因為被懷疑為“中國的赫魯曉夫”而被整死了。鄧小平則用“永不翻案”的保證獲得了毛澤東的寬恕。

其實赫魯曉夫掀開斯大林的蓋子是一步勇敢的行動。不管他的主觀意圖怎樣，正是這一步導致了蘇聯共產帝國的瓦解，使“大家庭”中各個被它控制的國家獲得獨立，也使俄羅斯人民最終獲得自由。當然，中國人好像特別愛從道德評價上責備赫魯曉夫，說他當面阿諛奉承斯大林，斯大林死後他又“鞭尸焚尸”，未免太有背于為人之道。其實在政治活動中，道德從來都無足輕重。鄧小平如果信守他對毛澤東許下的“永不翻案”的承諾，也就不會反對“兩個

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旗幟可能要由另外的政治家來擎起了。

批毛和撻毛的鬥爭

其實鄧小平不願作“中國的赫魯曉夫”，也不是從道德角度，而是從政治角度考慮的。他考慮的是中共內部“分道揚鑣”的兩股力量。作為領袖人物，他最好能團結全黨，但是在某個時期或某個問題上，他總有一個主導的傾向。自從理論工作務虛會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出現異議以來，圍繞這個問題的鬥爭一直不曾停止過。和這種爭議同時，社會上已經沖破禁區，多少年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原理”，已經成為人們公開批評的對象了。比如，報刊上這些文章，都是直接批毛的：

《“黨領導一切”的提法不科學》（《黑龍江日報》1980年10月29日）。文章說這提法不合邏輯，黨就不能領導太陽、月亮、刮風、下雨。

《“外行領導內行”的提法是有害的》（《北京日報》1980年12月5日）。文章說，這個提法使人甘當外行，成了官僚主義的一種借口，並容易造成瞎指揮。

《權力不能過分集中》（《人民日報》1980年11月14日）。文章批評毛澤東“大權獨攬”的口號，說它造成個人專斷。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科學？》（《人民日報》1980年10月30日）。文章說，這個提法意味着在民主之外有一個集中，而且高于民主，因而有資格指導民主。

《書記不等於“班長”》（《廣西日報》1980年11月17日）。文章批評毛澤東把書記比作班長。文章說：“班長和戰士是上下級關係，而書記和委員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關係。”

《“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口號不對》（《北京晚報》1980年9月2日）。文章說：現在我們有一千八百萬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那剩下的九十萬呢？再說“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

群衆”，我國有九億人口，剩下百分之五是四千五百萬，難道都是壞人？

《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是甚麼》（《解放日報》1980年11月5日）文章說，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是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而不是政治工作。

還有很多文章，從標題上就是直接批毛的。比如：《“全民大辦”是反科學口號》，《“政治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提法是錯誤的》，《“反潮流”的口號是錯誤的》，《“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口號應該摒棄》，等等。

公開評毛，公開批判毛澤東的錯誤，本來是使中國從毛澤東的陰影下解放出來的必經之路，但卻使一些人如喪考妣。鄧力群“痛心地”說：“他們在往毛主席臉上吐唾沫呀！”這是當時以“黨”自居的“權威”人士對評毛的控訴。這種語言是否由衷，外人當然不會知道。但重要的不是個人情感，而是現實利益。在這種情感後面，是一大批在毛澤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當年林彪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曾發出號召：誰在毛澤東去世後又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種廉價號召雖然林彪自己都不相信，但卻可以用來打人。同樣，在中國擺脫毛的陰影走上改革之路時，反對改革的人照樣可以用“擁護毛澤東”作號召，組織起一支新的“十字軍”。這是一股不小的力量，鄧小平不能不認真考慮並且謹慎對待。

毛澤東身後政治格局的形成

鄧小平的抉擇最終體現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中共有兩個《歷史問題決議》，一個是一九四五年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毛澤東路線，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另一個是一九八一年十

-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的起草工作早在一九七九年就開始了。當時在鄧小平和胡耀邦的領導下，成立一個胡喬木負責的起草組。胡耀邦實際上過問的不多，主要是鄧小平直接掌握。他曾多次對起草工作發表意見，其中他最關心的是怎樣對待毛澤東。他對起草組的第一次談話就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⑩後來他又談到為甚麼非“高舉”不可：“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⑪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且改變了中央領導的構成：華國鋒辭去主席職務，改任副主席。胡耀邦被選為主席。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以此以前，趙紫陽已經接替華國鋒擔任總理。）

毛澤東逝世後經過五年的曲折發展，中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了，人稱“鄧胡趙體制”。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理想的格局。

可惜的是，作為“非毛化”的領袖人物鄧小平，沒有像毛澤東在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中那樣，用自己的名字稱呼自己的時代。毛澤東當仁不讓，把自己作為王明路線的對立面載入史冊。而鄧小平卻不敢把自己作為毛澤東路線的對立面載入新時期的史冊。雖然他實際上是這樣做的。

舉着毛的旗幟走非毛化的道路

於是，他就使自己處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當中：走的是“非毛化”的道路，舉的卻是毛的旗幟。這也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可是他既然“打着紅旗”，便使自己的“反紅旗”活動處於非法地位，別人就可以用他所打出的“紅旗”去討伐他的“反紅旗”活動。於是不管他是否願意，他都必須順應揮舞毛的旗號的反改革力量的要求。

特別是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高舉毛的旗幟已經成為黨的方針，他的政治傾向也就定型了。

這就決定了中國改革的基本特點：一條腿走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而且連經濟也不可能順順當當改革，因為這種改革也常被指控為背離社會主義。這就決定了他不但和社會上的民主力量決裂，而且要不斷整肅黨內所謂“和黨分道揚鑣”的知識分子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就決定了“反對資產階級階級自由化”將是新時期中國思想鬥爭的主要形式。

三 批判《苦戀》

《苦戀》的命運

《苦戀》是部隊作家白樺和彭寧合寫的電影文學劇本，一九七九年發表。一九八〇年由彭寧執導拍成電影，改名《太陽和人》，尚未上演。

劇本描寫一個畫家凌晨光漂泊海外成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畫家夫婦放棄海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到他熱愛的祖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結果在逃亡中喪命荒野。劇中他女兒有一句臺詞：“您苦苦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畫家無法回答這個疑問。全劇結尾是畫家在茫茫雪原上用最後的一點力量爬出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問號的哪一個“點”，就是他冷卻了的身體。

這個劇本和電影的情節及藝術手法，都有可以商討的地方。但是應該說它忠實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懷着赤子之心回歸祖國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暴政下的悲慘命運。

中共一向重視文藝作品的“教育作用”。如果它真的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那麼《苦戀》就應該獲獎。但事實證明，中共當局是把文化大革命當作傷疤來護短，害怕人家來揭露它。所

以這個劇本不受當局歡迎，是注定了的。不過起初它並未引起注意。到了一九八一年初，要收緊思想控制的時候，《苦戀》被選中了。

或許因為白樺是部隊作家，批判是由部隊開始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鄧小平同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章國清等人談話，主題是“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是貫徹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為在思想領域全面收緊而作的重要部署。

鄧小平一共談了八個問題。最後一個專門談批《苦戀》的問題：“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要批判，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當然，批判的時候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片面性。”³

粉碎四人幫以後，常有一些文藝作品或理論文章被認為有“缺點”或“錯誤”。但都沒有發起一場公開的批判運動。上海作家沙葉新曾寫了一個劇本《騙子》，有點像果戈理的《欽差大臣》，描寫一個騙子自稱高幹子弟，結果受到某市官員破格接待。此劇上演後引起轟動，同時使一些官員大為憤火。胡耀邦沒有組織批判，而是召開一個“劇本創作座談會”，用和風細雨討論的方法說服作者不再上演，這使那些官員得以息怒。文藝界雖然並不滿意，但總算沒有掀起急風暴雨，沒有挨棍子，這一點，頗為人們稱道。

《苦戀》拍成電影後，內部就有不同看法。根據《百年潮》月刊所發表的張光年日記披露，一九八一年二月，文藝界領導已經對電影《太陽和人》的修改問題進行商談，並于二月二十三日取得一致意見。但三月二日的《日記》則記載着：“黃鋼借《太陽和人》電影事件向中紀委寫報告，要求調查出龍經過，追查支持者。”可見已經有人要借這個電影的由頭掀起一個政治風潮。所謂“出龍經過”，“追查支持者”等等用語，顯然已把《苦戀》的寫作和改編成電影《太陽和人》這種文藝工作當作“政治陰謀”，要制造一起新的文字獄了：張光年的《日記》還記載着：林默涵支持黃鋼，賀敬之贊成“調查出

龍經過”，而夏衍、陳荒煤、趙尋、陸石和張光年等則持反對態度。^⑨可見文藝界已經為《苦戀》發生分歧，鄧小平三月二十七日的談話，可能是對爭論做出裁決，決定對《苦戀》發起一場公開的批判。

新時期第一場大批判運動

這個決定的分量是很重的。由最高領導人親自布置對一個劇本進行批判，這在新時期還是第一次。它使人很自然地聯想到三十年前對《武訓傳》的批判。那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也是由最高領導親自發動，也是對一個電影進行批判。自從批判《武訓傳》之後，中國大地就陷入了連續不斷的思想鬥爭運動。

軍隊的動作很快。四月二十日，《解放軍報》就打響了戰鬥的第一槍。它發表了長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文章說，《苦戀》的主要錯誤有七：

1. 把愛國主義和愛黨愛社會主義對立起來。
2. 否定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
3. 通過藝術形象散布背離社會主義祖國的情緒。
4. 把祖國和四人幫，把黨和四人幫，都混淆起來。
5. 打着反對封建主義，反對現代迷信的旗號，詆譭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6. 以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間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題曲，反襯中國大地上人的命運的悲慘，實際上是指責我們黨踐踏了人的尊嚴，製造了人間悲劇。
7. 借屈原的故事所鼓吹的“求索”，實際上是引導人們懷疑黨、懷疑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要突破四項基本原則框框的“求索”。

這篇長文發表後，電臺廣播，許多省級報紙轉載，一時風雲突變，舉國震動，海外吃驚，不知道中國又出了甚麼大事。因為這種

“大批判”式的文章，自從四人幫垮臺以後，已經沒有人再寫了。如今忽然重新出現，大概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運動又卷土重來了。

這個信號的強度可以從白樺妻子王蓓的感受中略見一斑。批判開始之後，已故著名導演鄭君里的妻子黃晨去白樺家看望王蓓。王蓓一看見她就哭了，說：“在這種時候，你居然敢來看我，我實在沒想到。我非常感動，非常感謝，因為現在沒有人再到我們家來了。”^⑩

吳祖光挺身而出，語驚四座

《解放軍報》的文章發表後，周揚四月二十八日召開一次“老作家座談會”。劇作家吳祖光收到周揚的通知後準備動身赴會，但他妻子新鳳霞無論如何不讓他去。理由很簡單：吳祖光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也是周揚找他去上鉤的。現在歷史好像又要重演了。

不過新鳳霞沒有攔住，吳祖光還是去了，臨走時新鳳霞叮囑他：“絕對不能發言。”可是吳祖光到了會場就把夫人的叮囑忘了。他作了一個語驚四座的發言。他直率地指出：《解放軍報》的文章“邏輯上的不通、內容的蒼白、態度上的粗暴，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文章的再現。”“現在發表這樣的文章是給中國共產黨抹黑，給中國人民解放軍抹黑。”

而且吳祖光肯定地斷言：“人民群眾決不會由於看了或聽了這篇文章而認為作者白樺是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相反，會同情他，支持他。”^⑪

大批判走向反面，被批判者得到社會同情

果然，事情完全像吳祖光所斷言的那樣。《解放軍報》的文章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此時，還發生了一件同樣是幫倒忙的事：一份專門刊登報告文學作品的雜誌《時代的報告》，在一九八一年專門為批判《苦戀》出了增刊。這個刊物的主編黃鋼認為當前有一

股“反黨思潮”。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編者在“增刊”的《敬告讀者》中說：“我們決心與廣大工農兵及其幹部和愛國的知識分子站在一起。”他不但要組織階級隊伍進行征討，而且把知識分子劃分成“愛國的”和“不愛國的”，結果激起很多人的反感。北大師生在討論《苦戀》時，大多數發言都同情白樺，對《苦戀》表示理解和肯定。相反，認為黃鋼的文章如同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一樣，想把作者往死處打。

理論界的反響也很強烈，一些人說，許多人並沒看過這個劇本和電影，忽然開展這樣大規模的嚴厲批判，這是文化大革命遺風。這到底是“撥亂反正”還是“撥正反亂”？

所以，這場批判雖然一開始使人們緊張一下，但很快就轉為反感和冷淡。毛澤東時代那種一呼百諾的現象已經喚不回來了。對白樺的圍攻怎麼也鼓動不起來。而且，這時發生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鮮事：許多人給白樺寫去了大量的慰問信，以致白樺發出“春天對我如此厚愛”的感嘆。這種事情，在過去的三十年裏是絕對不可設想的。

因為《解放軍報》的文章沒有奏效，對《苦戀》批判很不景氣，所以總政治部不肯罷休，要求繼續批判。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把中宣部長王任重，副部長朱穆之，顧問周揚，新華社社長曾鳴和《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找去談話。

胡績偉頂撞鄧小平

鄧小平在談話中責問《人民日報》為什麼不轉載《解放軍報》的文章。胡績偉回答說，那篇文章不好，《人民日報》不能轉載。如果一定要批評《苦戀》，《人民日報》自己另寫文章。

建國以來的中共黨史上，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舉措上，一個黨員當面頂撞黨的領袖，這是極其罕見的。還好，鄧小平這一次並沒有堅持己見，而是和大家平等討論，他也承認《解放軍報》的文章

有毛病，最後“達成協議”：對《苦戀》，《解放軍報》不再批了，由《文藝報》寫出質量高的文章發表，《人民日報》轉載。

周揚領了任務回來，交給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張光年，張光年又布置給唐因、唐述成合寫。他們思想不通，根本不想接這個任務。後來勉強接受，結果是反覆修改，用張光年的話說，是“越改越亂”。因為這實際上不是文章，而是“共同綱領”。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可以對稿子提出意見；這篇文章必須滿足各方面的要求，才能達到“高質量”的標準，所以十分難改，有時作者都不知所措。改到第五稿時，胡耀邦說了一句話：“我看第一稿就不錯。”這個稿子弄得兩位作者苦不堪言，張光年也焦頭爛額，都失眠了。後來一直改到九月底，總算定下來，發表了，這件事終於過去了。

四 思想戰線座談會

鄧小平和胡耀邦裂痕初現

有些事情，當時未必清楚，過些時候回頭再看，就清楚了。胡耀邦一九八七年被迫辭職，是因為鄧小平不滿意他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太軟弱。從這個結局回頭來看一九八一年，就會發現，這時鄧小平已經明顯地不滿了。

鄧小平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找人談話的時候，沒有找胡耀邦，而是直接找中宣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他談的上題是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存在着渙散軟弱狀態”。《苦戀》是一個例子。他還舉出別外四個例子，兩個是理論界的（注一）；兩個是文藝界的。其中一個是青年詩人葉文福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注二），一個是新疆烏魯木齊市文聯負責人丁一在“大鳴大放了一通”（注三）。這兩個人猛烈地批評了一些人搞特權。所以鄧小平說他們“殺氣騰騰”，並據以得出結論，說黨的領導“渙散軟弱”，以致不得不由他親自出面來扭轉，使之堅強。

這兩個人講話確實有“出格”的地方。其實偌大一個中國要找出幾個講話“出格”的例子是很容易的。問題是誰促使鄧小平得出這種認識，作出這種決斷。

中國政治生活中，有一門學問叫作“簡報學”。差不多所有稍具規模的單位，都有自己編印的“簡報”用以交流情況，這裏面沒有多少學問。有學問的“簡報”有兩種：一是往上送的，可以影響領導人的思想；一是會議上發給大家的，可以影響會議的決定。這兩種“簡報”往往可以左右中國政局，那“學問”就在于：甚麼事情登“簡報”，甚麼事情不登“簡報”，以及在登簡報的時候怎樣進行“編輯加工”。

由於中國是人治，因此，用簡報對領導人作“思想工作”，便是用最小投資獲得最大效益的法寶。是誰把關於葉文福和丁一石的材料送到鄧小平手裏，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這個材料特地反映丁一石如何贊美胡耀邦。而按照黨內慣例，這種不利于領導人的材料照例都要用“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剛剛開過十一屆六中全會，胡耀邦剛剛當上黨中央主席。鄧小平在這個時候把他擺在一邊，直接對中宣部和新聞單位下達指示，應該說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這種局面是怎麼形成的，“簡報”的作用恐怕不能低估。直接向鄧小平進言的作用當然更是不能低估。至于都是誰能把“簡報”或某種“材料”送到鄧的眼皮底下，又是甚麼人能和鄧見面去“反映情況”，那就只有等到中國檔案解密的那一天了。

胡耀邦召開會議，承擔“軟弱漫散”責任

鄧的談話使胡耀邦不能不有所警覺，他很快在書記處開會研究鄧的談話，並決定召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不僅思想界所有單位都派人參加，而且各省市和軍隊都派宣傳部門領導人前來出席。

這個會從八月三日開到八月八日。胡耀邦在會議開幕時發表演講話，對鄧小平所批評的“渙散軟弱”主動承擔了責任。

座談會大部分時間都開小組會。總的看來，內容比較平淡，並沒有掀起甚麼“反自由化”的高潮。不過以作家協會為主的第四組曾經熱鬧了一下，據當時主持小組會的張光年在《日記》中記載：“黃鋼、李何林攻擊周揚，我在插話中指出其與事實不符之處。”（八月四日）“我先發言四十分鐘……接着介紹白樺的詩《春潮在望》給獎情況，說明這是對的，就此駁斥了黃鋼：究竟是我們的軟弱為敵人利用，還是你們粗暴批評引起軒然大波，使他人有隙可乘？還就李何林、黃鋼提出的“小集團、小宗派”，建議他們有根有據地向中央、中宣部提出報告，現在這樣是不嚴肅的，影響安定團結。對此李何林、黃鋼有所辯解，沒有內容。”^⑫

看樣子，思想運動一來，有人就要沿着“思想問題——政治問題——組織問題”的路子往前走，最後總要揪出一個甚麼“反黨小集團”或“反革命小集團”才算過癮。

吳祖光為《苦戀》的辯護詞

座談會爆出最大冷門的是第三組。這一組以戲劇家協會和電影家協會為主。劇作家吳祖光的發言成為整個座談會最精采的一筆。

他首先不僅為《苦戀》，而且為從事政治生活題材創作的作家當一回“律師”，為他們作一次辯護。他說，社會上各種黑暗和醜惡現象，都是客觀存在，決不是劇作家憑空編造。而且，電影與戲劇裏的描寫，與真實生活相比，還是大大沖淡和減輕了。“我認為，對社會主義最大的醜化是黨在多年來不斷進行的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以至于最後導致發生的這個萬惡的文革十年浩劫。說文藝作品醜化社會主義是一種誤解、歪曲；是因果顛倒。”

對於《苦戀》和影片《太陽和人》，他也認為存在相當嚴重的缺

點。他本人並不欣賞這個劇本和電影。不過對影片中最遭非議的兩個情節，吳祖光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一是影片中菩薩臉上被善男信女的香火薰黑了的情節。批判者說，這是打着反對“現代迷信”的旗號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吳祖光引用了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的批評，指出報刊中常說：“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就是說毛確實被捧到神化的高度。“既然如此，《苦戀》的作者用‘善男信女的香火把菩薩的臉薰黑了’的隱喻來批評對領袖的封建性質的吹捧，這不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允許的嗎？”這比黨的決議那種明確公開的批評“不是還要含蓄得多嗎？”

二是女兒問父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父親“無法回答”。這個情節使白樺遭到猛烈的批判。吳祖光卻不怕引火燒身，為白樺講了公道話。

吳祖光說，老舍的名劇《茶館》裏，常四爺也說：“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常四爺沒有得到回答，因為那是舊社會。文化大革命中，惡徒對張志新烈士說：“你愛黨，黨不要你了。”張回答說：“這不是黨，黨現在被壞人篡奪了。”但是《苦戀》中的凌晨光的確答不上來，因為這場“大革命”對他只能是個問號。在這場災難中無數死者，包括老舍，在臨終前的一刻，腦子裏也只有一個大問號。

吳祖光還用自己作例子。一九五七年響應黨的號召提意見，結果給打成右派，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心裏也一直帶個問號。“直到二十二年以後得到全部改正之後，我才知道自己並沒有犯錯誤，而是黨錯了。”因此，吳祖光認為《苦戀》作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⑩

在新時期第一場“反自由化”的暴風雨中，挺身而出，為遭到批判的作品和作者公開進行辯護的，只有吳祖光一人。

座談會的壓臺戲——胡喬木哭庭

思想戰線座談會的壓臺戲，是胡喬木講話。

胡喬木先給《苦戀》定性：“實際上否定了社會主義中國，否定了黨的領導”。他說，作者極力宣揚：“似乎‘四人幫’就是中國共產黨”，“似乎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並沒有得到解放和幸福”，“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於美國，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那裏的知識分子自由生活的命運才是令人羨慕的。”“這種觀點，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一種重要的典型表現。”^⑩

當然，白樺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他到底“實際上”怎樣想的，以及他是不是“似乎”宣揚了甚麼觀點，都不可能申辯了。

不過胡喬木講話的重點是批評黨的領導。

他說，“反自由化”不是新提出來的。他認為，有人“不承認存在這種自由化思潮，甚至想方設法加以掩護。”^⑪“極少數相當負責的幹部本人就對自由化的傾向表示同情和支持。”^⑫這些指責都是指誰，他沒有說。不過他說中央書記處“採取的切實有效的步驟還很不夠。”然後說：他自己應該作自我批評並接受批評。（因為他也是書記處書記。）不過他並沒有檢查自己是否“軟弱散弱”，而是檢討自己“沒有充分地和始終一貫地負起自己的責任，提出的意見也往往不夠周到嚴密”。^⑬就是說，“軟弱散弱”沒有他的份，他的缺點是負的責任不夠“充分”，提的意見不夠“周到嚴密”。所以他所說的有人對“自由化”“同情和支持”甚至“加以掩護”，顯然另有所指。

最後，使參加座談會的人們不知所措的是胡喬木講着講着，忽然哭起來了。結果會場一片沉靜，聽眾目瞪口呆，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會議主持者只好宣布“休息”，等他哭完了再接着說。

據張光年《日記》，這個會開罷，作家協會黨組又開擴大會，接着中央書記處習仲勛又把他們召去開會，然後回去又接着開作協黨組擴大會，把他開得精疲力盡。他在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中有

個小結：

“會開太多了，緊鑼密鼓地大半個月，強為支撑。今天休息，翻閱上半年日記，回憶一些事情，消耗了大半年生命力，究竟于工作有甚麼補益???”^①

當然，這只是給他個人這大半年的經歷作個小結。他並沒有也不會給這幾個月的“反自由化”作甚麼小結。

(注一)這一次理論界受到鄧小平批評的是郭羅基和王惠德。郭羅基的《政治問題為甚麼不能討論》早已在中共領導層中聲名卓著，有關郭的材料，上報的頻率也比較高。鄧小平對他的名字是很熟悉的。

王惠德是新任中宣部副部長，主管理論工作。他受到鄧小平批評，是因為他有一個講話，對中國是否已完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看法與胡喬木不同。此材料被人上報給鄧小平，但鄧把王惠德的名字弄成“王若水”了，所以談話時舉出“社會主義”的例子，指責王若水。此誤會後已澄清。

不過王若水躲過了這一次，卻沒有躲過下一次。即中國俗話所謂：“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也。

(注二)青年詩人葉文福創作的新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和《將軍，好好洗一洗》等批評軍隊高級幹部搞特權，受到一些青年人歡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八〇級學生請他去講話，有些話被學校黨委記錄上報，其中有：

“不管哪個時代的詩人，都對那個時代不滿。”

“毛的悲劇證明了這個時代是荒誕的。”

“我不聽從朋友的勸告，不為人所左右。我願意在詩中表現我自己。”

“我歌唱渺小的但是透明的芳香的靈魂。”

“偉大人物的靈魂不一定是透明的。”

“憲法一頒布，我就給彭真寫了信，我說這樣的憲法等於一張廢紙。因為我們國家只是共產黨執政的，這個憲法對共產黨中央領導未做任何限制，這就等於無用。”

據這份反映材料說：大多數學生對葉的講話十分贊賞，認為葉“敢講真話”，“敢于揭露特殊化”，是忠于人民的。一部分學生認為，“他反對官僚主義、反對特殊化是為了黨好、為了四個現代化早日實現。”

這個材料還說，一部分學生認為葉文福的講話“違背中央精神”。有的學生對校方說：“你們花了那麼大的氣力去抓思想教育，葉文福的一個報告就給吹掉了。”

(注三)丁一石的講話，被錄音摘錄上報，其中有：

“你要辦好文藝刊物，有兩個選擇，一個，你要想升官發財漲工資，平平穩穩，就要違背人民的意願去工作。一條道路，就真正要去替人民說話，那就請你伸出雙手，準備迎接鎗口！”

“我們的官僚主義，現在不是百分之零點幾，是百分之九十九，連我都有。大小給個官就有官僚主義。”

案 案 案

第十章 引文出處

①《鄧小平帝國》第 108 頁

②《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 351 頁

③《三中全會以來》第 702,703 頁

④同上，第 704,705 頁

⑤《鄧小平帝國》第 117 頁

⑥《三中全會以來》第 444 頁

⑦同上，第 452 頁

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133 頁

⑨《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39 頁

第十章 初反“自由化”

- ⑩《吳祖光闡文選》第 6 頁
- ⑪同上，第 9 頁
- ⑫《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40 頁
- ⑬《吳祖光闡文選》第 14—15 頁
- 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160—161 頁
- ⑮同上，第 166 頁
- ⑯同上，第 179 頁
- ⑰同上，第 180 頁
- ⑱《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第 41—42 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怕當中國的赫魯曉夫，堅信世世代代都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並且把這種思想貫徹在《六議》當中。這就決定了中國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要繼續沿着一黨專政和思想統制的道路走下去。這就決定了新時期必需繼續進行思想鬥爭運動。

全會還正式選舉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但這只是個形式。實際上還是鄧小平決定一切，同時，陳雲也有很大權力，足以和鄧小平相抗衡。胡耀邦得聽他們兩個人的旨意。上圖為全會休會時，陳雲和鄧小平坐在那裏，胡耀邦和趙紫陽趕候在旁。站在右側文件者為李先念。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是思想解放運動落幕以後，改革和反改革展開拉鋸戰的時期。三聯書店總編輯、老出版家范用經過慘淡經營，組織起一支實力雄厚的作者隊伍，在一九八〇年底創辦了當代中國第一份思想性雜誌《生活》半月刊，準備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不料剛剛出了一期試刊，就被中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扼殺在襁褓之中，從而使這一本《生活》試刊成為希世珍本。《生活》的夭折，標誌着思想界整個形勢完全逆轉，全面收緊的時期已經到來。

後來到了九十年代，范用的繼任者董秀玉又在高壓的夾縫中，終於使另一個《生活》得以出土，這是一份從多種角度反映社會生活的綜合性刊物。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閉幕，鄧小平就親自佈署對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開展批判，從而拉開新時期第一場「反自由化」運動的帷幕。

不料出師不利，這場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抵制。《苦戀》作者白樺不但沒有「批倒批臭」，反而越批越香，許多讀者紛紛給寫信表示支持和慰問，以致白樺感動地說：春天對我如此厚愛。因為白樺漫步在春暖花開時節



新時期的第一場“反自由化”高潮中，吳祖光是唯一挺身而出公開為《苦戀》辯護的人。

劇作家吳祖光青年時期以《鳳凰城》一舉成名，抗日戰爭時期活躍於大後方劇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價值連城之家藏文物全部獻於國家。後雖屢遭打擊，但個性未泯，剛直如故，故為中共所不容，一九八七年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親自登門勸其退出中國共產黨。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1982—1984)

一九八一年“反自由化”過後，王任重曾在胡耀邦支持下，試圖使思想界重新活躍起來。不料此舉完全失敗，而且連他自己的中宣部長職位都落入鄧力群之手。從鄧力群出長中宣部之日起（一九八二年三月），就進入新時期“反自由化”的第二個周期了。

這個周期主要是剪除胡耀邦的羽翼。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阮銘、李洪林、王若水、胡續偉先後受到整肅並被免職。周揚雖然未遭免職但被迫登報檢討，受到極大精神創傷。洪禹、吳江、孫長江則被逐出中宣部和中央黨校，離開意識形態部門。

一 中央宣傳部易手

■斷活躍思想界的喜劇

以批《苦戀》為標誌的第一次“反自由化”高潮過去了。這個“高潮”其實不太高，因為除了幾個人很興奮以外，人們大都很冷漠。連奉命寫文章批判《苦戀》的唐因、唐達成都非常冷漠，更不要說旁人了。

不過它的影響卻不小。思想界普遍感到壓抑。

繼胡耀邦之後擔任中宣部長的王任重對這種情況感到憂慮。他找胡耀邦商量，決定召開一次北京地區的“理論工作座談會”，目的是解除顧慮，活躍思想，使理論界重新振作起來。

王任重過去在地方工作，是中共高級幹部中對理論比較重視的人物之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他在湖北省委書記任上曾率先提出“超過馬克思”的口號，因而震驚一時。一九八〇年他接任

王宣部長時，“包產到戶”大潮已呈不可阻擋之勢。但他上任後首先表態支持“大寨”，曾給人們留下左傾印象，反應不佳。不過他比較重視實際，也能聽得進批評，不固執己見。在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中，他表現得沒有多大興趣，並在這一波高潮過去之後，立即着手解決“反自由化”所造成的沉悶局面。召開“理論工作座談會”就是他的對策。他曾表示，希望這個會能像“理論工作務虛會”那樣，對思想解放起推動作用。

為開好座談會，作了充分準備，主要是到全國各地調查理論界的思想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人們普遍對重新收緊意識形態很不滿意。吳江到上海召開一次調查會，帶回來的調查報告所提意見十分尖銳。有人說封建皇帝還能聽取批評，如今不能容許不同意見，連封建皇帝都不如。

座談會從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開始。參加者共三百多人，主要是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的理論工作人員，還有北京市和一些大學的理論教學和研究人員。

王任重在開幕式上有個講話，主要是解除人們顧慮，號召大家解放思想，暢所欲言。曾經有人以為，召開這個會大概和“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一樣，又要批判甚麼人了。王任重解釋說，這個會不批判任何人，鼓勵大家“敢想，敢寫，敢說”，並且許諾一定實行“三不主義”，保證決不“秋後算帳”。

這個開幕詞博得與會者普遍好評。有些熟悉王任重的人說，這是王任重最好的一次講話。

誰都不會料到，這個會簡直太像廬山會議了，以反左開始，以反右告終。王任重所作的“決不秋後算帳”的保證，不但立刻失效，而且連他本人也被推翻了。

新舊高層轉經的靈感問題

事情的導火線是郭羅基問題。

郭羅基被強行調往南京，引起理論界很多人不安，說是“發配充軍”。其實古代“充軍”的刑罰是把犯人押送邊遠地方去服苦役。郭羅基獲譴，從北京被逐往南京，並未“勞動改造”，況且所去之處是金陵勝地，比當年柳宗元（謫往柳州）或蘇東坡（謫往海南）的命運好多了。這顯示人民共和國已經比唐宋王朝文明多了。不過郭羅基是因言得咎，人們按照當代文明標準，又覺得不平，故有這等議論。

理論座談會的第三組是首都新聞界人士。《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在王任重講話“三敢”精神的鼓舞下，提出郭羅基的問題。他說，外界盛傳郭被調動，限期到南京大學報到，否則，戶口將被強行遷出北京。他還聽說，北大找郭談話時，郭要求知道調動理由。校方談話者答復說：“這由組織掌握，不能告訴你。”

馬沛文說：如果傳聞屬實，“理論工作者怎么敢想、敢說、敢寫呢？郭羅基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馬沛文不知道，這就又一次觸動了中共高層內部一個敏感的問題。他尤其不知道，“郭羅基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牌局中被人用來打人的一張王牌。

前面講過，郭羅基是早就被人作為“自由化的拔尖人物”送到鄧小平的桌子上挂了號的。鄧小平之所以批評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換散軟弱”，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待郭羅基這樣的“自由化代表人物”太“軟弱”。

胡喬木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指責“有極少數人”對自由化思潮“想方設法加以掩護”，那鋒芒顯然不是對着社會，而是對着黨內，對着領導層，而且是有所指的。顯然，這“極少數人”遲早要被擊敗，只看對手甚麼時候打出王牌罷了。

現在，出牌的機會來了。馬沛文的發言使牌局上出現了機會。而發起和主持座談會的王任重，被當作“極少數人”中的一個，結果成為首先淘汰出局的領導人物。

馬沛文的發言登了會議簡報之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鄧力群立刻把座談會辦公室負責人李洪林找去，要求把郭羅基的文章印發各組以便批評。李拒絕了，因為會議主持人王任重已經宣布，這個會不是批判哪一個人，所以會議辦公室不能印這種材料。

于是鄧力群就叫書記處研究室自己印了郭羅基的材料，加上“編者按語”，發給會議各組。“按語”說：馬沛文同志“竟為郭羅基同志的錯誤辯護”。現把郭的兩篇文章刊登如下，請“仔細讀一讀，並請考慮，對這兩篇文章應該批評還是不應該批評”。因為會議辦公室拒絕印發這個材料，而書記處研究室又不是會議的主辦單位，所以這份材料是一個“無頭文件”。文件的題目是《郭羅基同志的兩篇文章》，下面沒有印發的單位，沒有地址和時間，雖有“編者按語”，但不知“編者”是誰。

這個材料發到各組之後，起到相反的效果，不但沒有掀起一個批郭高潮，反而給會議澆一盆冷水。除了第一組（書記處研究室）和第七組（北京幾所大學）有幾個批郭發言之外，大多數人都感到空氣不對，有些人干脆不參加了。有人說：“剛剛保證決不秋後算帳，現在馬上就算帳了。”有人說：“保證的是決不秋後算帳，現在是春天，當然可以算帳。”

鄧力群發動突然襲擊，奪取中宣部

正在大家議論聲中，保證“決不秋後算帳”的王任重被免去中宣部長職務，改由鄧力群接替了。

在和平時期，一個重要領導崗位的更替來得這樣突然，是完全出人意外的。在正常情況下，即使王任重已不適宜此職，也總要等這個會開完之後再換也不遲。然而竟迫不及待到這等程度，可見一定是這個座談會本身使最高當局達到不能容忍的限度，才採取斷然手段的。而能觸怒最高當局的事情，只能是郭羅基問題。因為把郭羅基調出北京，早已不是郭本人的事情，而是黨內鬥爭的一

隻晴雨表或記分牌。要調他走，他不走，當時正鬧得沸沸揚揚。鄧小平是言出必行的領導者，他怎能容忍一件“小事”如此拖泥帶水反反覆覆解決不了呢？而王任重主持的座談會，居然又“鳴放”出馬沛文這種言論，這不是促使他立即改組中宣部的絕好機會嗎？

據阮銘在《鄧小平帝國》中披露，是鄧力群把馬沛文發言拿到鄧小平面前告了王任重的狀。“鄧小平大發雷霆，當場拍板決定由鄧力群接管中央宣傳部和這次理論座談會，讓鄧力群通知胡耀邦立即執行。胡耀邦急忙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按照鄧力群傳達的鄧小平的決定，通過任命這位連一個候補中央委員也未嘗當過的鄧力群為中央宣傳部長，這在中共黨史上也是破記錄的。”¹⁵

以阮銘和胡耀邦的關係，以及他和胡耀邦身邊工作人員的關係，他所揭露的這場中宣部長突然易人的內幕，是可信的。因為這個內部過程和人所共知的外部過程恰恰是瓦為表裏，恰恰能互相印證。

這樣，在理論工作座談會的第八天，即三月二十三日，鄧力群從王任重手裏接過部長的職位，開始主持座談會了。光拿過部長一職當然不夠，下一步首當其冲的是中宣部理論局，也就是理論工作座談會的辦公室。座談會第一組，即古記處研究室參加會議的人員，立即向座談會辦公室負責人猛烈開火，這“負責人”就是拒絕印發郭繩基材料的李洪林，他是理論局副局長。

鄧力群到任後發表就職演說，第一條就宣布“紀律”：“必須同中央保持一致”，“做不到這一點，隨時提出，隨時歡送，概不挽留。”他所說的“中央”，當然就是他自己。李洪林原是胡耀邦一九七九年調來的（那時胡是部長），此時趕緊提出調離中宣部的要求，但是晚了，鄧力群並未“歡送”，而是免了他的職，挂 在那裏，慢慢收拾。

理論局的老局長洪禹，思想解放，在理論界頗有人望，在組織和協調理論隊伍貫徹三中全會路線方面，作了大量默默無聞的工作。他為人正直，從不阿諛權勢。因此鄧力群一上任，洪禹不久就

被“歡送”走了。

思想戰線格局發生根本變化

在此之前，盡管理論界兩支隊伍“分道揚鑣”，盡管不斷有人被指控為“自由化”，但鬥爭畢竟是零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理論隊伍的主力尚未受到傷筋動骨的打擊。中宣部權力易手，事情就發生根本變化了。

中央宣傳部是中共三大職能部門之一（另兩個是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是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司令部。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理論，都歸這個部直接領導。人事任免雖然由中央組織部統管，但意識形態各部門的人事，實際上是中宣部掌握，中組部不過是履行任免手續而已。

鄧力群在此以前，只是中央書記處所屬的研究室的主任。它的前身是國務院研究室，集中了一批人才，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起了不小作用。思想解放運動落幕之後，它主要做兩件事情：一是用“簡報”的形式向上反映情況。一是用“通報”形式向下邊發布一些中央的信息或別的情況。當然它也到下面做些調查，也奉命起草文件或文章。但最重要的就是反映情況，而且它的學問就在這裏：反映甚麼，不反映甚麼，通報甚麼，不通報甚麼，都是由研究室的領導選擇的。這當然會起很大作用。當它的“反映”打動了決策人的時候，起的便是決定性的作用。（注一）

不過，研究室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它只是書記處的附屬機構，不是獨立的職能部門，也就是說，沒有行政權力。它沒有下屬單位，也沒有對口的部門。它不像宣傳部，即有下屬單位，又有對口部門（各省市黨委的宣傳部）。

鄧力群一當上中宣部長，這個缺陷就補足了。他仍然擔任研究室主任，因為這是他的基地，同時又是中宣部長。於是對於被認為“自由化”的分子就可以施行大手術了。

(注一)研究室在一九八一年就編印了《郭羅基同志部分文章摘錄》，專門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這份材料從郭羅基十二篇文章中摘錄了一些片段，並且加上畫龍點睛式的“附注”，以引起注意。

比如，郭羅基說：“對林彪、四人幫神化領袖創造迷信的批判，僅僅是退燒劑，還不是除病根。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曾致力于把神還原為人，馬克思說：‘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哩。’主要的事情是甚麼？就是要使產生宗教迷信的社會基礎‘在實踐中受到革命改造’。”

研究室的編者在這段文字後加個“附注”說：“關於反對神化領袖的問題，作者認為，主要地不是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而是要對現實的‘社會基礎’進行‘革命改造’。”這樣一來，郭羅基就可以被當作意欲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現行反革命”了。

再如，郭羅基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在實踐中發展的，在歷史條件改變以後，有些舊的結論會被新的結論所代替，應當允許對舊的結論提出懷疑。”

研究室的編者在這段文字後面加的“附注”說：“鄧小平同志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此文卻以各種借口，提倡懷疑四項基本原則。”在給中央領導人送的材料中，專門寫上這樣的“附注”，那“學問”也就很清楚了。

整個材料，都是這樣編排的。當時郭羅基本人根本不知道有人已把他告到中共中央，而以為是教育部和他過不去，想把他趕出北京的。

二 軍人入主黨校

胡耀邦失策——黨校棄守

胡耀邦是以自己的膽識和業績贏得衆望而成為中共一代領袖的。他對誰都一視同仁，身邊沒有一個特別親密的“班底”。只是由於傾向一致，黨內思想界有些人和他接觸多些，比較談得來。在這些年的思想鬥爭中，有些人在他的領導下做的事情多一些，所以很容易被人們看成是他的“智囊”或“筆杆子”，其實都談不上。不過中央黨校的理論研究室、《人民日報》的理論部、中宣部的理論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胡耀邦的三個“點”。在思想鬥爭中，這三個點，都處於關鍵部位，能起重要作用。因此，要剪除胡耀邦的羽翼，這三個“點”是必須攻占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鄧力群到中宣部一上任，首先就把理論局改組了。在理論工作座談會上向理論局進攻最勇敢的兩個人，成了理論局新任的局長和副局長。

第二個目標是中央黨校。黨校的理論研究室主任是副教育長吳江兼任，副主任阮銘和孫長江是理論戰線上兩員名將。他們三個人是當年胡耀邦指揮思想解放大軍的得力助手。中央黨校原來的校長雖然是華國鋒兼任，實際負責的卻是常務副校長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改選中央領導核心之後，胡耀邦成了中央主席，華國鋒變成副主席。此時胡耀邦理所當然地應當兼任黨校校長，但他不去兼任，而且辭掉副校長。這實在是政治上一大失策。結果軍人出身的王震一九八二年四月到黨校當了校長。據吳江說，他後來得知推薦王震出長中央黨校，“原本就是某股勢力針對胡耀邦的策劃。”王震被任命後，有人給吳江打電話告訴他：“書記處決定王震任命的當晚，鄧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來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準備啊！”^②

《理論動態》遭封堵

黨校領導換人，胡耀邦辛苦創建的《理論動態》和理論研究室就失掉屏障，直接暴露在鄧力群的火力之下了。

其實要拔掉胡耀邦在黨校的這個“點”，早在一九八一年就開始準備了。

這一年初，吳江被告知：有人對華國鋒即將下臺抱不平，認為華謙虛謹慎，而胡耀邦說話隨便，不夠謙虛謹慎。因此，要求《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說明怎樣才算真正謙虛謹慎，說明我們的事業需要創新精神和實幹精神，而謹小慎微、墨守陳規，不是真正的謙虛謹慎。

吳江還被告知：陳雲的秘書王某（同時是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也認為應該寫這樣一篇文章。

於是吳江就讓孫長江執筆，經反復推敲，于八一年六月刊登在《理論動態》第二八二期上。

誰知道篇文章被說成“針對陳雲”的，並經胡喬木鄧力群之手到達陳雲那裏。據說陳雲很生氣，當着鄧小平的面指着胡耀邦說：“我是支持你的，你不要在黨校弄一幫人反對我。”結果胡耀邦承受了很大壓力，而且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因為他並未布置黨校的人寫這篇文章，當然更不知道原來是陳雲的秘書王某的主意。

被指控“針對陳雲”的還不只這篇文章。《理論動態》第二九六期的《跳出圈子想問題》也蒙上這個罪名。這篇文章批評有人把第一個五年計劃當作模式，“言必稱‘一五’，行必法‘一五’，這樣就把當時的成功經驗，變成了妨礙探討新問題的框子”。^③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國按照蘇聯模式實行計劃經濟的樣板。陳雲因為當時負責領導財經工作，被認為是計劃體制的權威。（注一）因此，批評“言必稱‘一五’”，也被認為影射陳雲，這當然更使陳雲感到不快。

思想解放指揮部被拔除

在中國共產黨內，如果有人被認為反對某個中央領導人，這就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於是中央組織部專門派調查組進駐黨校，對吳江、阮銘、孫長江三個人進行調查（名義是“考察幹部”）。

調查從一九八一年下半年開始進行，只是搜集材料，並未觸動這三個人。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王震正式被任命為中央黨校校長。他到黨校立即對他所說的“胡耀邦的智囊團”展開鬥爭。一方面通知中央組織部把吳江、阮銘、孫長江調離黨校，一方面在校內布署“清除”阮銘的事情。

要調出三個人，也不是一件簡單事。吳江是副教育長，校務委員會委員，這職務是中央書記處任命的，要調走，也不能完全由校長說了算。所以此事就擱淺了。但“清除”阮銘的工作在抓紧進行。阮銘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參加造反，但很快就被“王關戚”（注一）打倒，從此受審查七八年之久，也沒有審查出個甚麼結論來。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比比皆是，許多人起來造反，然後被打倒，而打倒這個人的又會被別人打倒。中共中央曾指示清理“三種人”（注三），但這和阮銘根本對不上號。然而在黨校這場鬥爭中，阮銘竟被扣上“三種人”的帽子。其實誰都可以看出，這是對着胡耀邦來的，因為阮銘是胡耀邦調來的。阮銘思想敏銳，文筆犀利，是理論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之一，又因阮銘秉性剛直，心口如一，于官場中折衝周旋，非其所長，故主要以研究寫作為業。且其所寫多為黨內文件或“特約評論員文章”，故其名鮮為人知，但為胡耀邦所倚重。由於阮銘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一點複雜的經歷，便成為別人可乘之機。在黨內的政治風雲中，他就被選為一個突破口。

據阮銘所看到的一九八一年中央組織部對他的《考察報告》，其中有一份材料是《鄧力群同志談阮銘》。鄧力群是這樣說的：“阮銘是文革中的紅人，後來才挨了點整。說阮銘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一點也不冤枉。”^④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王震在黨校各部主任會議上宣布了對三個人的處理：吳江調離黨校。孫長江不進領導班子。阮銘這個造反派頭頭要清除。同時把阮銘的材料發下去給全校討論，但不准發給阮銘。（阮銘是從別人手裏看到的。）

阮銘立即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提出申訴，控告王震違反黨章，同時也給胡耀邦寫了信。中紀委負責人李昌接受了申訴，並告訴阮銘，胡耀邦有批示，要中紀委常委研究處理。中紀委已決定派調查組處理此案。

然而中紀委剛剛開始調查，王震就向黨校傳達了陳雲的三句指示：“阮銘不能留在黨內，阮銘不能留在黨校，全國報刊不能發表阮銘的文章。”王震同時宣布：“誰不同意陳雲同志這三句話，就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⑤

於是阮銘被開除出黨。吳江和孫長江也無法在黨校存身，調到其他單位。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被解散。

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批判極左思潮和“兩個凡是”，作為胡耀邦引導全國輿論走向的這個“指揮塔”，終於被拔掉了。

(注一)陳雲在建國以後長期主持財經工作。當毛澤東搞“大躍進”時，陳雲態度冷靜務實，被毛目為右傾。“大躍進”失敗後，陳雲又獲得發言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力群編輯《陳雲文選》出版。他去中央黨校作過長篇報告，題目是《向陳雲同志學習作經濟工作》。其中有這樣的提法：“毛澤東同志發現了中國民主革命的規律，陳雲同志發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⑥此話傳到鄧小平耳中，引起他的不快。後來鄧力群整理稿件時，刪去了這句話。^⑦

(注二)“王關戚”是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簡稱。他們都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是極左思潮的早期代表，都是被

毛澤東和江青看中之後，平地飛升的暴發戶。他們忘乎所以，到處掀“走資派”，不小心掀到軍隊裏去了。軍隊是毛澤東的權力基石，所以毛澤東先後把這三個人踢出去，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作法自斃的極左派。

(注三)“三種人”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幫後對這“三種人”進行過清理。但清理得並不徹底。在新時期的思想鬥爭中，可以明顯地感到四人幫餘孽的存在。往昔“批鄧反擊右傾復案風”的骨幹人物，至今還有受到重用的。

三 新的“共產風”

鄧力群的口號——“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

大概是為了給自己樹立一個新的形象，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即鄧力群被任命為中宣部長的那一天，他在理論座談會上作了一個長篇發言，題目是《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

“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不像一個普通黨員的口氣，也不像一個宣傳部長的口氣。宣傳部長只是中共中央一個職能部門的行政首長，他的任務是在宣傳工作方面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應該在中央的精神之外另提甚麼政治口號。現在他忽然鄭重其事提出一個全局性的政治口號，顯然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針對目前的現實而發的。這等於向全黨宣布一個新的政治綱領。“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我們”，當然是整個中國共產黨。但是“旗手”只能有一個。幾千萬共產黨員，誰也沒有舉起共產主義旗幟，只有鄧力群，在改革開放致“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情況下，振臂高呼，獨自舉起這面紅旗。這是多麼難能可貴！有朝一日，“黨變修，國變色”，改革開放使“資本主義復辟”成為事實，中國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時候，大家回過頭來一看，

早在一九八二年就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人，自然是眾望所歸了。

他這個“發言”在理論座談會第一組受到高度重視。第一組全是書記處研究室的人，他們對鄧力群這篇綱領式的演說給以高度評價，並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不過座談會的其他各組，雖然都收到了這篇講話的全文，卻不怎麼熱心，甚至根本沒去理會。不過這並不影響鄧力群實施自己的“綱領”，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握有實權的中宣部長了。原來大家還以為他不過是說空話，後來的事實說明，他是要把中共的全部宣傳工作納入他的“共產主義”軌道，進而用共產主義指導全國的現實生活，結果使中國大陸又刮了一次新的“共產風”。只是這次“共產風”沒有後勁，雖然引起不小的思想混亂，卻沒有造成太大的破壞。

用新的共產風曲解中共“十二大”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中共召開了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號召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胡耀邦的政治報告也貫穿了這個精神，並且把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作為鼓舞人們的奮鬥目標。

但是鄧力群卻把他的“共產主義”作為十二大的主要精神。在十二大召開前半個月，一九八二年八月中旬，中宣部召開一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鄧力群在會上提出：即將舉行的十二大，“貫串着實踐共產主義思想這條紅線。”他要求各地，學習和宣傳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產主義思想的教育。”他並且指定要學習胡喬木在十一屆七中全會上的發言，因為胡喬木的發言對共產主義“進行了十分深刻的闡述。”

胡喬木八月間在七中全會的發言叫作《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後來在九月二十四日公開發表。他最主要的論點是：“共產主義”除了是一種社會制度，還是一種“運動”，即“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實踐”。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將來才能實現的。但在

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實踐，即共產主義運動，卻是當今的現實。用他的話說：“共產主義運動是指從有共產黨到共產主義最後實現為整個過程”。因此，自從中共成立以來，黨員和革命群眾所作的一切，都是“共產主義運動”。他還舉例說：“我們今天在這裏開會，也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自從鄧力群在宣傳工作會議上布署以後，特別是胡喬木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發表之後，一個新的“共產主義”高潮在中國大陸興起了。不但中共十二大的精神被歸結為共產主義，而且全社會到處都“閃耀着共產主義光輝”。為了批駁“共產主義渺茫論”，很多地方在宣傳中都強調“共產主義就在你的身邊”，“共產主義就在你的腳下”，甚至小學生拾到五分錢交給老師，都成了“共產主義運動”。

“共產風”造成思想混亂，引起普遍反感

這種鋪天蓋地的“共產主義”宣傳，在黨內和社會上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亂，同時也有人對這種新的“共產風”提出許多問題要求解答。有些問題實際上是些辛辣的諷刺和嘲笑。下面就是各地反映的一些問題。

“現在又把共產主義思想搬出來了，是不是說毛澤東思想不行了，鄧小平和胡耀邦那一套也不行了？”

“社會主義都還沒有搞好，現在又提倡共產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不靈了，要抬出共產主義招牌來？”

“提倡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同實行按勞分配如何統一起來？”

“四人幫空喊共產主義，同現在高舉共產主義旗幟有甚麼區別？”

“怎樣劃清‘堅持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同‘精神萬能論’和‘空頭政治’的界限？”

“有些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他們的生活已經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要甚麼，有甚麼，真是‘各取所需’了。”

“宣傳共產主義是‘假大空’回潮。”

“有些中高級幹部，有些黨員，光為自己撈好處。他們不信共產主義，讓我們相信？”

“宣傳共產主義，不過是讓你多幹活，少掙錢。”

“現在說的和做的不一樣。說的是共產主義，做的是對外開放，扶持個體經濟，鼓勵少數人先富起來。”

“我們搞了三十多年社會主義，至今還這麼窮，怎么能對共產主義充滿信心呢？”

“中國古代社會甚麼主義也沒有，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走在世界的前列。現在我們一直講共產主義，卻落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後面，信不信共產主義有多大用？”

除了這類反映之外，有些地方的宣傳部門並沒有跟着這場新的“共產風”盲目地跑，他們認為，現行政策應當是主要的宣傳任務。

因為社會上思想混亂，黨內的看法也不一致，特別是下面做實際工作的幹部的抵制，這場“共產風”刮了幾個月就沒有後勁了。但是鄧力群顯然不想把已經舉起的“共產主義”旗幟放下，所以又親自組織人力在一九八三年寫出一個《共產主義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研究提綱)》用“中宣部文件”的形式發往全國，要求各地按照這個文件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和宣傳，“使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能夠真正開創一個新局面”。各地宣傳部門果然把它當作“中心任務”，很是忙了一陣，然而還是沒有起色。後來是中宣部自己按照鄧力群的“研究提綱”分頭寫了一些文章編成一本書出版了。可惜的是這本書和以前那些配合政治任務的出版物一樣，在思想界沒有引起任何漣漪。特別是在文化市場上，這本由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苦心策劃出來的“共產主義”著作，還沒有來得及閃耀出

“共產主義光輝”，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于是由胡喬木和鄧力群發起的這場“共產主義運動”，最後終於收場了。

四 人道主義公案

人道主義在中國的遭遇

人道主義問題，在中國是一樁老的公案。人道主義是這樣一種思想：它以人的利益和價值為中心，重視人的幸福和尊嚴。從這種價值標準出發，自由、平等、人權，自然是人道主義的訴求。這種思想本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不過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他那著名的《講話》之後，人性和人道主義便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除了“救死扶傷”或“優待俘虜”可以使用“革命的人道主義”（因為這是毛澤東用過的）之外，“人道主義”都被貼上“資產階級”標簽，無產階級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國大陸短暫的“解凍”期間，人道主義思想曾經稍微活動了一下，但不久就被壓制下去。（注一）以後人道主義一直是個禁區。

以慘無人道為特徵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大陸的思想界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反思。一九七八年，朱光潛第一個站出來打破這個禁區。他寫了一篇《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發表在《文藝研究》第三期上，指出人道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嚴，把人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劉賓雁在作家協會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人是目的，人是中心》的發言，理直氣壯地宣告：“無產階級既然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自然是最徹底的人道主義者。”^①

以後人道主義問題引起理論界和文藝界很大興趣。同時引起注意的還有“異化”問題（注二）。王若水、汝信、阮銘、高爾太等都發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據統計，到一九八二為止，已經發表有關

“人”的文章四百多篇。這股人道主義熱已經引起中共高層某些人的不滿，不過尚未爆發出來。

一九八三年，這種不滿終於爆發出來了。

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學術報告會

這一年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共中央決定隆重紀念。除了舉行紀念大會，由胡耀邦作報告之外，還要開個學術報告會，由中宣部邀請周揚作報告。周揚選了幾個人幫他起草講話稿，其中有上海的王元化（文藝理論家）和北京的王若水。

三月七日報告會在中央黨校舉行。周揚的報告最精采也是最惹麻煩的部分是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問題。

周揚說，過去，包括他在內，一直把人道主義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這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把對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批判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他們滅絕人性的暴行創造輿論根據。這個教訓必須記取。他說：“人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是關心人、重視人的，是主張解放全人類的。”

周揚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承認有異化，才能克服異化。”不過他沒有忘記和資本主義劃清界限，以免遭到非議。他說：“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我們體制上的問題。現在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是為了克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異化。”^⑬

黨校校長王震和中宣部長鄧力群都出席了報告會。周揚報告完畢，他們兩人都向周揚握手祝賀。王震說：“講得很好！”並向周揚請教“異化”兩個字怎麼寫。

胡喬木沒有出席報告會。但周揚報告後立即把講稿送給了他。他在三天後，即二月十日，約周揚和王若水面談。他對周揚的

報告提了一些“不足”之處，比如，周揚沒有談“學雷鋒活動”，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義高漲”，等等。但他沒有說周揚的報告有甚麼錯誤。

最後他建議周揚把講話修改一下，然後出單行本。其實後來周揚和王若水才明白，胡喬木的真正意思是不要發表了。可是他並不明說，周揚當時也沒有弄懂他的意思。原來《人民日報》已經預告，將全文發表周揚的報告。所以周揚對他說：“我還要交人民日報發表呢！”

胡喬木說：“那沒有關係……如果在報紙上發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個說明。”

最後他又說：“希望周揚同志能將論點搞得更完整一些，修改好了，再正式發表。”^⑩

其實在他們談話的兩天之前，即三月八日，胡喬木已經打電話給中宣部，主要的意思是：周揚的講話“難以處理，問題不少，不是你幾句話、刪幾句話能解決的。”^⑪這就是說，這篇講話是無法修改的，當然更談不到發表了。但這話他不對周揚說，而是告訴中宣部，意思是叫中宣部去“唱黑臉”，出面阻止周揚。可是中宣部接電話的副部長好像也不願意扮演這個得罪人的角色，所以並沒有把這個電話內容通知周揚、王若水或《人民日報》。

既然胡喬木當面只是建議周揚把講話稿修改一下再發表，而又沒有指出有甚麼錯誤，只是有“不足”之處，這當然就是可以發表。至于甚麼“不足”之處，本來無關大體，修不修改，那就是作者本人的事情了。所以王若水和總編輯秦川商議之後，在三月十六日把周揚的講話發表了，題目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周揚和胡喬木的鬥爭

結果引起軒然大波。胡喬木和鄧力群嚴厲批評了秦川和王若

水，不經請示就發表了周揚文章。中宣部並把此事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書記處同意後，中宣部在三月十六日把周揚、秦川和王若水召去開會，向他們傳達這個《報告》，胡喬木也來了。

《報告》嚴厲指責《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文章，並說王若水應負主要責任。這份《報告》的實質部分是“處理意見”，大意是：

一、人道主義作為學術問題可以討論，同時組織力量寫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述”。

二、對《人民日報》的編輯部進行必要的調整。王若水調出報社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揚不修改自己的講話就發表，勢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亂，希望他對自己不負責的表現有所認識。

周揚聽懶大怒，當場和胡喬木吵了起來。周揚指責胡喬木不正派，因為他三月十日談話時說“可以發表”，現在又說“不可以發表”。胡喬木堅持他沒有說過周揚文章可以發表。

吵到最後，還是各執己見。

周揚說：“一個政治局委員說話不能這樣不負責！”^①

胡喬木說：“不能這樣說話，那我沒有人格了！”^②

王若水也在會上進行了申辯，秦川也不同意《報告》的處理意見。鄧力群答應把他們的意見上報給書記處。不過事情已成定局，不可挽回了。雖然拖了幾個月，後來到“清除精神污染”的時候，王若水畢竟被撤消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職務並被趕出報社。

其實這場“人道主義公案”的理論爭論並不是最重要的。據知情者分析，周揚錯在他不該去作這個報告。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這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動作。紀念大會由總書記胡耀邦作報告，當然合乎規格。學術報告會自然是由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來唱主角才能順理成章。然而周揚偏偏不識時務，沒有謙讓，所以就把禍惹

下了。要知道，周揚雖然資格較老，三十年代在上海作地下工作時曾經領導過胡喬木，但時移事易，此時胡已經是政治委員，地位遠在周揚之上了。

胡喬木和周揚的矛盾，理論問題雖然不是主要的，畢竟要通過理論表現出來。中宣部給書記處打的《報告》中，第一點就是“組織力量寫文章”，對人道主義“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闡述”。這任務當然非胡喬木莫屬了。他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寫作組，動員大量人力，前後寫了好幾個月（注三）。文章寫成之後，也是先作報告，然後正式發表。文章的題目是《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報告的地方，也是中央黨校。這時已經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了。時間雖然晚了一年，但是對人道主義畢竟有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闡述”，這就足以彌補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由周揚報告所造成的遺憾了。

這個講話不但在報刊發表，電臺廣播，而且出了兩千萬冊單行本，並譯成少數民族文字（但是沒有出版官方的外文譯本）。中央宣傳部為此專門發出學習和討論胡喬木文章的通知。《通知》說，胡喬木的文章已經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了“科學的回答”。於是這場公案就以胡喬木大獲全勝而落幕了。

王若水和胡喬木的較量

不料王若水沒有認輸。他從已經落下的帷幕後面走出來了。因為胡喬木自己說過，他歡迎不贊成他的觀點的人“參加爭論”，所以王若水針對胡喬木的文章寫了一篇《我對人道主義問題的看法》，交給《哲學研究》雜誌編輯部。

一個黨員竟敢寫文章公開批駁代表黨中央講話的政治局委員，這在中國大陸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而且那後果是完全可以預料的。所以王若水周圍的人們紛紛勸阻，但王不為所動，堅持要發表。後來《人民日報》新任社長和總編輯聯名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寫信，要求制止此事。

胡啓立立即回電話說：“同意你們的意見。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發表為宜。請說服動員王若水同志。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⑩胡啓立同時也給《哲學研究》編輯部的上級中國社會科學院打了招呼。這樣一來，《哲學研究》當然就不會發表王若水的答辯文章了。

事情好像又可以畫上句號了。

誰知接踵而來的是一個更大的波瀾。

王若水沒有罷休。書記處既然不讓他發表文章，他就直接給鄧小平寫信。鄧小平沒有表態，把信轉給中央書記處。胡啓立很為難，只好給胡喬木打電話，胡喬木回答說，王的文章可以推遲一期在《哲學研究》發表。

這個期間，王若水加緊把文章修改得更周密一些，打印了若干份去征求意见，準備讓《哲學研究》在六月號上發表。

誰知道時節外生枝，香港的《鏡報》月刊不知從甚麼渠道得到王若水文章的打印件，搶先在六月號的《鏡報》上全文發表了。《鏡報》在“編者按語”中稱王是“理論界有名的硬骨頭”，同時刊出王若水和胡喬木的照片。更令習慣于尊卑有序的大陸當局感到難以容忍的是：居然把王若水的照片放在胡喬木之上。

這一下炸了鍋。文章內容早已無關緊要，當局全力追查是誰把王若水的文章交給《鏡報》的。後來還動用了安全部門來偵查王若水。不過最後甚麼也沒查出來。有關方面還向《鏡報》調查。《鏡報》斷定稿件不是得自王若水，但拒絕說出送稿人名字，因為編者有責任保護他。

由於《鏡報》發表了王若水的答辯文章，倒使胡喬木擺脫了困境。他當然不喜歡王若水對他的“科學回答”又挑甚麼毛病，所以指示中宣部說：

“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來了，國內就不發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應予以拒絕。”^⑪

追緝“人道主義公案”終於落幕了。

(注一)作家巴人(王任叔的筆名)受一九五六年短暫的“自由化”的鼓舞，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號《新港》月刊上發表一篇《論人性》。他敢于提出和毛澤東《講話》不同的調子：人們除了階級性以外，還有共同的人性。他說：“我們當前文藝作品中最缺乏的東西，是人性，是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巴人僥幸地躲過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卻在一九六〇年身陷重圍。姚文元和李希凡向他展開了大批判。姚文元特別會上綱，把倡導人道主義的作家扣上“反動文人”、“修正主義者”的帽子，說他們都在“向中國共產黨進攻。”^⑯

于是王任叔以“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被定為“反黨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成“叛徒”，遣送回鄉勞動，一九七二年去世。

(注二)據王若水解釋，“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這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力量反過來反對主體本身。後來他用一個通俗例子來比喻：母親生下孩子，孩子長大後變成逆子，反過來虐待母親。現實生活中，人民公僕變成人民的主人，就是“異化”。

(注三)奉命幫助胡喬木寫作這篇文章的單位有八個：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央黨校，《紅旗》雜誌，《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研究室。

五 清除精神污染

鄧力群的下一個目標——《人民日報》

“清除精神污染”是鄧力群掌揮中宣部之後所掀起的一場波及全國的“反自由化”高潮。

在攻下中宣部和中央黨校的兩個“自由化”據點之後，《人民日報》便成為下一個捕獵目標了。

粉碎四人幫以來，《人民日報》一直是堅持思想解放和堅持改革的主要陣地，在整個新聞輿論界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點改革派和反改革的力量都清清楚楚。因此，自從中共黨內兩股力量“分道揚鑣”之後，《人民日報》就是胡喬木和鄧力群志在必得之地。

“人道主義事件”使他們找到了這個機會。就像在中央黨校從阮銘下手一樣，在《人民日報》要從王若水下手。在發表周揚文章這件事上，他們打開了一個缺口，於是就發生了前面說的那些風波。但是光拔掉王若水還不行。《人民日報》的主將是社長胡續偉，此人在反抗“兩個凡是”的時候，以“不聽話”著稱，如果不拔掉他，就攻占不了《人民日報》這塊陣地。然而不巧的是：發生“人道主義事件”時，胡續偉正好不在北京，這事株連不上。

終於有了機會，不但能撤掉王若水，而且能撤掉胡續偉，同時還可以擴大戰果，把整個思想戰線都“清除”一下，以便牢牢控在手裏。

挑動鄧小平清除精神污染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央要召開十二屆二中全會。在開會前一個月，胡喬木和鄧力群繞過胡耀邦和書記處，直接找到鄧小平，向他匯報了思想界的“嚴重污染”情況，並且成功地使鄧小平相信“現在思想界一片混亂”。二中全會本來是解決整黨問題，這一來就插進一個“精神污染”問題，而且實際上成為壓倒整黨的首要問題。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十二日兩天，中共舉行二中全會。鄧小平作主題講話，題目是《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他的要領是兩句話：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在這個講話裏，有許多都是胡喬木和鄧力群這幾年以黨的“權

誠”身分對理論界的指控。所不同的是這些指控都由胡喬木寫到鄧小平的講話稿裏，變成鄧小平的話了。

被鄧小平指控為“精神污染”的例子有：

“抽象地宣傳人道主義、人的價值”。

“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

“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表的自由”。

“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

“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

“認為我們這個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是社會主義階段，‘一切向錢看’就是必然的，正確的。”^⑩

鄧小平講話時都沒有指名。但多少留思想界的人都知道指的是誰。因為胡喬木和鄧力群早已在各種場合反復批判過這些人了：除了周揚和王若水（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以外，還有郭羅基（言論自由問題），胡績偉（黨性和人民性問題），李洪林（四項基本原則問題），蘇紹智和王惠德等（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于光遠（“一切向錢看”問題）等等。

其實這些人的觀點都是被人斷章取義加以歪曲之後才匯報給鄧小平的。鄧小平本人對理論興趣不大，即使有興趣也不會有時間去看那些文章。因此對於這個領域，他只能靠看“簡報”或聽匯報來了解情況，決定對策。

除了重點批評理論界，鄧小平還批評了文藝界熱心寫陰暗的東西，鼓吹“現代派”思潮和“人性論”等等。

他最後的落腳點還是“領導軟弱涣散”，這顯然是又一次對胡耀邦敲起警鐘。

整肅王若水和胡績偉

鄧力群和胡喬木在二中全會上集中力量批判王若水。他用書記處研究室所提供的詳細材料，把王若水一九七八年以來所發表的言論，不但包括文章而且包括他所講過的話，都搜集起來，加上“人道主義”和“異化”，一共歸納成十大問題，目的在于說明王若水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拒絕中央領導的批評，即拒絕胡喬木和鄧力群的批評，堅持不改正“錯誤”。

除了王若水的材料以外，鄧力群還向會上提供了書記處研究室編印的《幾年來〈人民日報〉理論版宣傳中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指控《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所發表的李洪林論述四項基本原則的系列文章是“從反面提問題，不是積極宣傳四項基本原則，而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製造了思想上的混亂。”更嚴重的指控是：李洪林的文章是“針對”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方針”而寫的。^⑩

按照鄧力群在二中全會上的發言和所提供的材料，這個《人民日報》主管理論部和評論部的副總編輯老是和中央不一致，這份黨中央的機關報老是發表“反面”文章，而且居然敢把矛頭針對鄧小平，當然是不能容忍的狀況了。於是，不但王若水必須撤換，而且《人民日報》也必須改組。

果然，三月間沒有完成的任務，到了十月間“超額”完成了。中央書記處不但立即決定免去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調離《人民日報》，而且“同意”社長胡績偉“辭職”。（注一）

這樣，《人民日報》社裏這兩個“和黨分道揚鑣”的眼中釘，終於拔掉了。

不過並沒有“萬事大吉”。新任社長秦川原是胡績偉的老搭當，雖然不像胡績偉那樣楞角分明，但在堅持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方針上，兩人是完全志同道合。而且在中國的政治風雲當中怎樣

周旋，秦川比胡績偉更在行些。特別是《人民日報》的理論部，一直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三中全會路線這一邊。因此，雖然胡績偉和王若水被拔掉了，《人民日報》並沒有被接管過去。所以對這塊陣地的爭奪並沒有結束。

周揚和李洪林

除了胡績偉和王若水之外，周揚和李洪林也是胡喬木和鄧力群“精神污染”名單上應予“清除”的對象。周揚是中宣部顧問，本應到中宣部來接受批判。但他在二中全會期間已經在顧問委員會受到批判，本人又有病，就沒有再到中宣部來“受教育”。但是他必須公開承認錯誤，否則過不了關。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下，他被迫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一篇談話，其實這篇“談話”乃是新華社替他起草的，他被迫點了頭，就算是他的談話了。在這篇“談話”裡，他承認自己“輕率地、不慎重地發表了那樣一篇有缺點、錯誤的文章。”他違心承認“錯誤”的談話，登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全國的報紙上。這是在全國人們面前對他的公開羞辱。

周揚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藝界忠實地執行毛澤東的左傾路線，傷害過不少人，最後自己也身陷牢獄，在鐵窗中苦度了十幾年歲月。平反後他誠懇地反省了自己的錯誤，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一直走在前列，因而得到大家的諒解和敬重。但這一次打擊對他來說太重了，以致從此臥床不起，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含恨去世。（注二）

鄧力群又動員整個中宣部的人馬，經過周密準備，對李洪林開了五次批判大會。舉行這樣大規模的批判會，對一個人連續五次進行圍剿，這是三中全會以後的最高紀錄。不料李沒有檢討，反而在批判大會上批評了鄧力群違反中央決定和打擊報復的錯誤行為。此後，李即被調往福建。

在此之前，全黨和全國範圍內的“清除精神污染”，鄧力群早在

二中全會之後就部署下去了。這是在批判《苦戀》之後，由中央發動的又一次全國規模的思想鬥爭運動。批判《苦戀》雖然也引起全國震動，但對象很少，只是白樺一人。“清除精神污染”把社會各界都捲進來了，所以震動巨大。而且甚麼叫“精神污染”，界限也十分含糊；怎樣“清除”，更是各顯神通。許多文學名著和電影，因為有些情節和鏡頭涉嫌“污染”而被查禁。女子的鮮艷服裝和化妝，披肩髮和高跟鞋，也被當作“污染”而取締。甚至書刊封面的美女像都成了“污染”，更不要說美術作品中的人體像了。這樣弄得人心惶惶，有人以為二次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鄧力群的重點是理論界。在向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全會精神時，他布置了一個震驚全國知識分子的任務：各單位都要清理公開的和內部的報刊、書籍、文章。不但清理本單位發的各種材料，而且要清理“本單位工作人員在這個學會那個學會上的講話”。

這樣一來，所有在公開和內部場合，寫過的和說過的東西，都要清查。而且鄧力群還交代：“自己查，別人也查”。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一個接一個的思想運動已經把全國知識分子弄得焦頭爛額了。但是不論哪個運動，也沒有對文字和口頭的言論這樣徹底地清查過。

新的“專案組”和黑材料

為了準備和推動這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鄧力群領導的作記處研究室連續編印了許多“簡報”，把他們所選擇的“自由化”言論摘錄下來，一份接一份向中共中央報告，同時又從中選出一部分向全國通報。被他們當作獵物的人，一般是看不到這些“簡報”和“通報”的。這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專案材料”在對被害者保密這一點上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研究室所整的材料只是“思想材料”罷了。

在背後搜集和整理某些人的材料，經過“加工”以後向上控告，

使本人事先既不知情，事後又不能申辯，這種手法引起人們普遍反感，有人憤怒地把它叫作“克格勃”。

鄧力群也知道這種做法聲譽不佳。但他認為這是正確的，所以堅持這樣做。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他向首都部分理論工作者講話時，為自己作了辯護。他說：“書記處研究室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思想戰線的情況。”他強調這種反映要準確，不過他用語很有分寸，叫作“力爭不出任何差錯”。這就是說，反正他已經“力爭”了，至于出不出差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指責有人反對他們向上反映問題。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風氣”。他舉阮銘為例：“比如阮銘。摘了他若干文章中的一些錯誤觀點上報中央，而且反復查對，是負責的，嚴格實事求是的，他就抗議，說是整他的黑材料。”（注三）鄧力群還說：“最近有的討論會上也有人說，‘我們當中有沒有克格勃啊？’這樣的話，居然是共產黨員說出來的！不允許別人向組織、向中央報告自己文章、發言中的錯誤觀點，你要報告，你就是搞黑材料，就是克格勃。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夠這個樣子呢？應當襟懷坦白嘛。”但他沒有說，他們所整的那些背後告狀的材料，為什麼不能“襟懷坦白”地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讓大家都見識見識，特別是讓被告者本人看看。

“達於極端，走向反面。”這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走的太遠了，結果在黨內和社會上引起廣泛的惶惑與不安。連國際上都弄不清中國究竟出了甚麼大事。在這種情況下，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不斷努力限制它的範圍，使這場運動不要破壞經濟建設和安定團結的局面。他們的努力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這就使“消除精神污染”的運動逐漸停下來了。後來的說法是“清污”只搞了二十八天。胡耀邦下臺時，有一條罪名就是說他打斷了“清污”，才搞了二十八天就停止了。其實這個運動連頭帶尾不止這些天，不過它在大家的抵制下，還沒有泛濫成災就悄悄收場了，卻是事實。

這件事又一次證明，在新的歷史時期，再想發動一場大規模的

思想運動，已經很不容易了。

(注一)書記處關於《人民日報》問題的決定是十月二十日作出的，十月二十九日向報社領導人正式宣布。本來這就完事了。但十月三十日胡喬木和鄧力群兩人又專程到《人民日報》社召開大會，由他們兩人再向全體人員宣布這個決定。胡喬木在講話中又把胡績偉和王若水仔細批了一頓。

鄧力群在會上也講了話，他最後有一句話引起人們注意：“我表示一種願望……就是願意來參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報的某些問題的討論，同報社新的領導班子一起合作，共同學習，共同提高，來實現黨中央對我們的希望。”^⑩

起初大家不知道為甚麼他要講出這幾句話，好像在拉關係，甚至有“一家人”的味道。後來才知道，胡喬木和鄧力群想把《人民日報》變成中宣部的下屬單位，並為此作了極大努力，那樣中國大陸這塊最主要的輿論陣地就完全歸他掌握了。

但是《人民日報》新任社長秦川和報社全體堅決反對這種企圖。在中央內部幾經折衝，《人民日報》終於保住了自己，仍和中宣部平行，都是中共中央直屬單位。

(注二)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胡喬木的文章正式發表時，周揚已經臥床不起。這一天胡喬木志得意滿，詩興大发，吟詩一首送給周揚：

第十一章 二反“自由化”

誰讓你逃出劍匣，誰讓你
割傷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從他手上流出，也從
我心頭流出，就在同時。

請原諒！可鋒利不是過失。
傷口會愈合，友情會保持。
雨後的陽光將照亮大地
更美了：擁抱着一對戰士。

他還附一張便箋：

周揚同志：
近日寫了一首小詩，謹以奉呈。
祝春節好，重揚同志並此問候。

胡喬木 一月二十六日②

“重揚”是周揚夫人蘇重揚，此刻正陪侍在周揚病床左右。

胡喬木的“心”，到底是在流血，還是在發出勝利的微笑，別人永遠不會知道。但周揚卻不是傷了手指，而是被胡喬木一劍刺中心臟。這個傷口沒有愈合，而是致周揚于死地。

至于胡喬木對周揚的“友情”如何，周揚自然是深有體會的。這種“友情”，從蘇重揚的反應中可以得到證明。她曾大罵胡喬木和鄧力群，一口氣罵了兩個多小時。

(注三)鄧力群所整的關於阮銘的材料，足以使阮銘被開除出黨。但是這份決定阮銘政治命運的材料卻一點也不“光明磊落”：一直對阮銘保密，使他無從申辯。所以阮銘說它是黑材料。

※ ※ ※

第十一章 引文出處

1《鄧小平帝國》第142—143頁

- ②《十年的路》第 138 頁
- ③同上，第 120 頁
- ④《鄧小平帝國》第 139 頁
- ⑤同上，第 140 頁
- ⑥《十年的路》第 112—113 頁
- ⑦《鄧小平帝國》第 111 頁
- ⑧《文藝評論》1979 年第 6 期
- ⑨《人民日報》1983 年 3 月 16 日
- ⑩《胡耀邦下臺的背景》第 49—51 頁
- ⑪同上，第 59 頁
- ⑫同上，第 74—75 頁
- ⑬同上，第 76 頁
- ⑭同上，第 247 頁
- ⑮同上，第 260 頁
- ⑯《文藝報》1960 年第 2 期
- 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269—271 頁
- ⑱《理論風雲》第 202 頁
- ⑲《胡耀邦下臺的背景》第 183 頁
- ⑳同上，第 228 頁

第十一章附圖



一九八二年王震入主中央黨校，首先拔掉胡耀邦指導全國理論戰線的旗幟——《理論動態》。主編《理論動態》的是理論研究室，它的主任吳江、副主任阮銘和孫長江是王震整肅的對象。吳江和孫長江被調出黨校，阮銘則被開除黨籍，成為“分道揚鑣”後第一個被清除出黨的“自由化分子”。上圖為阮銘遭清洗後，在李洪林家中與部份好友合影（後排：右一為阮銘、右三為《新觀察》主編戈揚，左二為哲學家王若水，左一為法學家于告成）。



第二場「反自由化」運動中人道主義公案的主角周揚和他們
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講話稿起草小組合影

前左一為周揚，左二為王元化，後排中為王若水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1985-1987)

由于鄧力群的“清除精神污染”弄得怨聲載道，並被胡耀邦及時制止，所以它的破壞作用沒有來得及充分發揮，而且鄧力群和胡喬木也因受挫而有所收斂，所以從一九八四年下半年起直到一九八六年底，總的說來思想界較為平靜。

不過這種平靜只是表面現象。反改革的政治暗流從來沒有休止過，並且終湧現出來，形成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高潮。

這是第三次“反自由化”高潮，它是第二次“反自由化”高潮的繼續，不但完成了第二次高潮的遺留任務，而且沖垮了中共的“鄧胡趙體制”。

一 “反自由化”間歇期的平靜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又一次突破馬克思主義

“清除精神污染”被制止以後，據說鄧小平已經意識到鄧力群謠報軍情，以致弄得人心不安，輿論譁然，因此決定撤掉他的宣傳部長職務。但此事因被海外傳媒提前曝光而擱置，所以鄧力群在宣傳部的位子又保住了一段時間。不過這個期間他已很難有所作為，實際上是拖延時日而已。這可以從兩件事情上明顯地看出：

首先是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在改革的路上跨出了一大步。這一年十月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全面的經濟改革，把商品經濟引入社會主義。這是繼農村“包產到戶”之後，對馬克思主義框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注一）這件事在胡喬木和鄧力群的眼裏，當然是貨真價實的“離經叛道”。一向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

鄧力群，在中共中央這個決定面前能幹甚麼呢？作為中宣部長的他，當然不敢公然反對中央的決定，於是就只能是消極怠工了。專以鬥爭為職業的人既然不做事情，自然就天下太平了。這是當時思想界較為平靜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胡耀邦在這個期間得到鄧小平較多的支持，在宣傳工作上當仁不讓，抓的比較得力。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唱主角的不是鄧力群，也不是胡喬木，而是胡耀邦。

胡耀邦在會上作了主題講話，題目是《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裏所說的“部門”，實際上就是指鄧力群所控制的宣傳部。他針對胡喬木和鄧力群一九八二年以來背離中共的現代化路線，另搞一套的作法，要求宣傳部門必須為四個現代化服務，要克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消極影響。^①

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民主選舉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八五年一月初，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中宣部照例“安排”了作協的領導人名單，結果被中央書記處否決。胡耀邦指出：像作家協會這樣的社會團體，其領導人選不應當由共產黨來決定，而應當由作家們自己選舉。大會實行自由選舉的結果，巴金當選為主席，劉賓雁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是《人民日報》的著名記者，又是廣大讀者喜愛的作家。他這幾年足跡遍南北，寫了幾十萬字的報告文學和通訊。他除了報導改革開放的新事新事以外，也勇敢地揭露為非作歹的當權者，伸張正義，為受害者鳴冤，因而得罪了不少權貴，備受他們指責，成為有名的“自由化”人物。這次在作協大會上，他以僅次于巴金的高額票數當選，大快人心。此事在知識界傳為美談。

這次作協代表大會，由胡啓立按照胡耀邦的意思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賀詞的主旋律是創作自由，這更使人們精神振奮。不光是文藝界，整個知識界都深表歡迎。

以“三寬”精神著稱的朱厚澤出掌中宣部

一九八五年七月，鄧力群終於被撤掉中宣部長的職務。以開明著稱的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被調來接任中宣部長。不過鄧力群仍舊是中央書記處一名書記，再加上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兩人都會是所謂“分管思想戰線”的“中央領導人”。這使朱厚澤的中宣部長很難當，雖有胡耀邦的支持，他也不得不謹慎從事。

為了使全國的思想界免遭胡喬木和鄧力群的扼制，朱厚澤上任以後從不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因為要開這種規格的會議，勢必要向胡喬木和鄧力群請示報告，他們也一定要來作報告，發指示，貫徹他們那一套左傾精神。如果不開這種高規格的會議，那就没有必要去麻煩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中宣部日常工作的範圍以內，部長自然可以獨立負責，便宜行事了。

朱厚澤就是這樣開展工作的。他的指導方針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以促進這塊園地的繁榮。這是他在一九八五年七月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來的。他呼籲，對於不同的思想觀點採取寬容的態度，對於有不同意見的人寬厚一點，要創造一種寬松的環境。後來人們稱之為“三寬”。

由於主管意識形態的新任中宣部長採取“三寬”方針，所以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到一九八六年間，思想界繼續保持一種較為平靜的局面，甚至有點活躍。《人民日報》、《新觀察》、《讀書》，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都有為改革開放立論的高水平文章陸續發表。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北出版的理論刊物《青年論壇》。它是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間中國思想園地一朵奪目的鮮花，可惜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凋謝了。

《青年論壇》是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一些青年人自發創辦的，雖然依附於社會科學院，實際上是自負盈虧的民辦刊物，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開始出版。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青年論壇》創刊號寫了一

篇文章《為自由鳴炮》，把中共最害怕的“自由”作為主題，一炮打響，震驚全國。這份刊物不但為青年喜愛，而且迅速在理論界甚至整個出版界贏得相當高的聲譽。

當然，這樣一份旗幟鮮明的刊物不可能逃過胡喬木的眼睛。一九八五年《青年論壇》曾經受到很大壓力，鄒力群指名批評這個刊物，指責它發表了很多談自由的文章。不過這個雜誌還是硬著頭皮撐下來了。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宣部明確地給《青年論壇》以支持。朱厚澤率人到武漢時，專門去看望這個雜誌的編輯部，並和他們座談，這就使它重新獲得生機。曾在北大參加競選的青年學者胡平的著名論文《論言論自由》在《青年論壇》發表，更加擴大了這個刊物的影響。

胡耀邦訪華

從表面上看，一九八六年確實是思想界的好年景。這好丫頭還體現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會議開到十一月一日，胡耀邦忽然來了。這是自從一九七九年理論工作務虛會閉幕以後他第一次和理論界人士會見。他在講話中非常明確地指出，阻礙社會科學繁榮的阻力，首先來自黨的領導：“不正確的干預太多”，“讓一些理論工作者坐冷板凳”，“拿着棍子在頭上搖晃”，等等。談到打棍子問題時，他說：“中央是決不會打棍子的。幾年來打的棍子不是黨中央的，這一點你們心中有數，不用我說。”他把話說到這個程度，就只剩下點出人名了。大家都清清楚楚，這是在批評胡喬木和鄒力群。這是一個重要信息，表明中央內部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變化，思想界的又一個春天快要來到了。當時在會場上就有人提出這幾年已經有人被撤職、有人被開除黨籍、有人被趕到外地。胡耀邦答復說：“寫報告來，我們就糾正。”^②

這次講話使人心大振。人們都認為思想界第二個春天快要到

了。

然而這個春天始終沒有來臨。更使人想不到的是，這次談話竟是胡耀邦和理論界的最後一次見面。那一席鼓舞人心的談話竟成了他的遺言。不但那些遭到大棒打擊的知識分子未能平反，而且這位總書記自己，都被大棒打下臺了。（注二）

（注一）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商品經濟是互相排斥的。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國民經濟一切部門都必須嚴格按照統一的計劃進行生產。這種產品不是商品，不通過市場進行交換，而只能按計劃進行調撥，並按計劃分配給社會成員進行消費。每個成員都按自己付出的勞動量向社會領取消費品，而不是使用貨幣到市場上去購買。

馬克思主義認為，商品生產是通過市場自發的價格波動來調節的，它必然產生競爭，必然導致生產無政府狀態，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導致工人失業，導致階級矛盾激化，導致社會革命。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就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把全部生產資料收歸公有，實行計劃經濟。

（注二）胡耀邦和理論界這次會見，有薄一波陪同。他當時和胡耀邦完全一致，配合默契。

例如，當胡耀邦要大家給受打擊的人寫報告來，以便糾正時，薄一波插話說：“被打的同志頭皮要硬一點，頂住。”

再如，當胡耀邦談到“要說理，不要打棍子”時，薄一波插話說：“真理挑得起棍子”。

二 決戰前的外圍之戰

而胡耀邦的撤退基礎

思想鬥爭從來都從屬於政治鬥爭，或者本身就是政治鬥爭。

而政治鬥爭的成果差不多都要落實在“組織”上，也就是人事安排上。總之，不管甚麼鬥爭，都是由人來進行的，因此人事問題歷來是戰鬥最激烈的所在。它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是決定勝負的標誌。

中國擺脫毛澤東路線，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是以“鄧胡趙體制”的建立為標志的。這個體制的建立，當然有黨內外民主力量的擁戴，但它不是民主制度的產物，而是專制制度的產物。當初總書記人選的確定，不是民主選舉，而是黨內一些元老挑選的。鄧小平挑選胡耀邦，當時就有人不同意。有人傾向于趙紫陽，因為趙紫陽上張“經濟上放開，政治上收緊”。不過最後還是胡耀邦入選。但是胡耀邦當上總書記那一天起，反對者的活動就沒有停止過。這些人的切身利益和毛澤東的傳統體制是緊密相連的。胡喬木和鄧力群是這股力量的代言人。他們的觀點無非是保守勢力現實利益的理論表現。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胡喬木和鄧力群對理論界“分道揚鑣”的指責和幾個“回合”的鬥爭，雖然都是思想界的風雲雷雨，實際上都是指向胡耀邦的。

任仲夷和項南中箭落馬

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平生光明磊落，政治上從不玩弄權術，組織上更不拉幫結派。可是他的對手卻不這樣，幾年來他們堅持不懈地把胡耀邦的陣地一塊一塊奪去，把他的羽翼一根一根拔掉。就在鄧力群政治上受挫，在思想戰線上處于守勢的時候，陳云掌握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就在一九八五年把任仲夷（廣東）和項南（福建）拔除了。（注一）這兩個人是在改革開放前沿省份掌權的最著名的省委書記，是“鄧胡趙”體制在地方上最得力的支柱。中紀委利用“海南汽車案”（當時海南未建省，屬廣東）和“晉江假藥案”（晉江是福建一個縣），追究省委責任，把他們兩人撤換下來，並給項南一個“警告”處分。（注二）

在這場權力鬥爭中，不但胡耀邦無力回天，就是鄧小平也只能作壁上觀，這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格局所造成的形勢。名義上的總書記是胡耀邦，但是鄧小平和陳雲是在胡耀邦之上“垂簾聽政”的兩位元老。這兩位元老之間雖然鄧小平為主，但是陳雲也足以和他分庭抗禮。他並不是鄧的下級，鄧對他還得尊重。如今陳雲已經從簾子後面走了出來，運用他直接掌握的中紀委的權力，志在必得地拔掉項南和任仲夷，鄧小平和胡耀邦也就只好認帳了。

但是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反改革勢力的日標是胡耀邦。從控告郭羅基到撤換項南和任仲夷，都是在掃清外圍，一步步向核心逼近。當然最後解決戰鬥要以鄧小平的向背為轉移。因此，怎樣使鄧小平最後和胡耀邦決裂，就是能否打倒胡耀邦的關鍵。而鄧小平恰恰在“反自由化”的問題上不滿意胡耀邦，並且同反改革的勢力站在一起。這就是把鄧小平調動過來打倒胡耀邦的最佳切入點。

“反自由化”問題上的短兵相接

在“自由化”上挑起鄧小平和胡耀邦的矛盾的機會又一次來到了。

預定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舉行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將通過一個《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一個決議稿，總的精神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稿裏沒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樣，倒是強調高度民主的重要性。這個稿子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時，遭到王震、彭真、薄一波、胡奇木和鄧力群的猛烈反對，他們堅持必須加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胡耀邦做了妥協，加上了一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④

但是陸定一堅決反對在決議中寫進“反自由化”。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中宣部長，知道這個名詞的來龍去脈。原來這是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為反對中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而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幫用它來打人，造成極壞的後果。因此陸定一主張不再使用。

這場爭論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六中全會閉幕時達到高潮。《決議》即將提付表決，陸定一又一次重申他的主張，並得到萬里的支持。彭真、薄一波、王震等繼續反對陸定一的意見。結果鄧小平表態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④

鄧小平的話當然就是結論。于是這場爭論就結束了。胡耀邦在會後曾布置大家不必把會上的爭論向下傳達，以便集中精力領會決議本身的精神。他沒有料到，這正好給對手提供了一個挑撥他和鄧小平關係的機會。

鄧力群和胡喬木向鄧小平報告說，胡耀邦想隱瞞鄧小平的講話，不讓大家向下傳達。鄧小平大怒，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紀中葉。”^⑤

拔掉胡耀邦的門爭就這樣一步一步接近最後的決戰了。當胡耀邦在薄一波陪同下和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的參加者見面時，顯然對此一無覺察。他還滿懷信心要給遭到大棒打擊的理論家們平反，卻不知道反改革的勢力已經把大棒舉到他這位總占記的頭上，就要打下來了。

(注一)據《鄧小平帝國》揭露：“一九八五年七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利用晉江‘假藥案’、海南‘汽車案’打擊走在改革

開放前列的福建、廣東兩省，是陳雲親自策劃部署的。他堅持將項南、任仲夷調離福建、廣東兩省，並堅持給予項南黨內警告處分。”^⑩

(注二)這兩個案件是屬於經濟違法案件，應該處理。但是中紀委小題大作，目的就是整倒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從而削弱胡耀邦的力量。拿“晉江假藥”來說，這是晉江縣幾家辦廠企業，把一些“銀耳沖劑”之類的飲料冒充藥品(雖然不能治病，但也不是毒品，未曾致人死命)，當然應該取締。實際上福建省行政當局早已發現此事並且已經做了處理，假藥已經完全停止生產和銷售。也就是說，這是福建省自己已經解決過了的問題。但是—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忽然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給福建省委的《公開信》。這封信嚴厲指控省委對於假藥“竟然熟視無睹，聽之任之，甚至把大量制造假藥危害人民的辦廠加以表揚。”這完全是瞪着眼睛說瞎話，因為福建省早就發現並且處理了這件事。現在中紀委忽然這樣大張旗鼓，重新提起過去的事，把舊帳當新帳，而且由中紀委用“公開信”的形式譴責一個省委，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怪事。這封信發表之後，誰都看得清清楚楚，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三 三反“自由化”的背景

片面改革導致嚴重腐敗

中國自從走上改革道路以來，一直沒有把政治改革放到日程之上。經濟上逐步放開搞活了，但是政治制度依舊。這種跛腳走路的辦法不但拖延了改革的進程，而且必然引發許多社會矛盾。人們普遍能夠感受到並且也最不能容忍的是有權者的腐敗，比如大量揮霍浪費或直接侵吞國家資財，利用權力為子女親友謀取利

益，趁改革開放之機進行權錢交易，以及各種各樣的貪贓枉法行為。

腐敗當然不是中國特產，凡有權力的地方都不可能杜絕。但是在民主政治的環境裏，政治透明度高，權力受到制約，特別有強大的輿論監督，腐敗就不易藏身，一旦被揭露，便難逃法律懲處。而最終制約這一切的，是人民手中的民主權力。相反，在專制制度下，不管甚麼冠冕堂皇的招牌，實際上實行的是人治。政治上是“黑箱作業”，根本談不上分權制衡，更不會有甚麼輿論監督。在這種環境裏，腐敗現象就是必然的，中國就是這樣。

人民既然不能通過輿論監督來揭發和制止官吏的腐敗，又不能通過正常的民主程序和法律程序制裁和撤換腐敗的官吏，這種憤懣的情緒和改變現狀的要求便總得有個表達和宣泄的渠道。可惜這種渠道在中國很不通暢，因為一切傳播媒介都是官方的，它們只是“黨的喉舌”，而不是人民的喉舌。人們如果想通過官方媒體表達意見，也必須經過黨的過濾和選擇。原來的憲法還規定公民有貼大字報的自由。一九八二年以後這項權利也取消了。丁是街便是人民唯一能表達自己意見最直接的途徑了。

這就是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學生上街游行示威的真正原因。一九八五年示威的規模比較小，當局採取較為容忍的態度，也就過去了。一九八六年規模比較大，波及全國十八個省二十八個城市的高等院校。

一九八六年的學潮

學潮最初是從安徽合肥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當時合肥正在進行人民代表的選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科技大學校園內有人貼出大字報《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信中說，“人民代表太會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們“為真正的民主而鬥爭。”¹⁴四日晚上，學校召開了候選人與選民見面的大會，有學生登臺演講。科

大副校長方勵之也講了話。他說，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議論好久了，真正自由的選舉就是一個突破口。他告訴大家，前不久青海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省長，結果欽定的省長幾次都選不上，因為代表們不投他的票。這表明民主意識的抬頭。方勵之還不指名地批評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連起碼的民主都不懂。周曾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大開會表決的票數是三千比零，這比美國的五十一比四十九要民主得多。

方勵之號召大家爭取民主，他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會被收回去的。”他的講話受到熱烈歡迎，不斷被聽眾的鼓掌和喝采所打斷。^⑧

科技大學學生第二天就在合肥市各高等學校串連，並在當天下午舉行示威。消息傳出，許多城市的大學生都動起來了。

方勵之的思想無疑在促進學生民主意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學生上街。然而學生還是去了。

據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估計，只有“少數學生上街游行，他們只占全國在校大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一二”。^⑨其實這就不是一個小數，百分之一，大約是兩萬多人，百分之二就有四萬多人了。

這些人一上街，那影響就不止幾十萬或幾百萬了。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規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共的傳統政治文化，除了官方組織的以外，一切群眾自發的游行示威都是“鬧事”。其實這本是民主政治的常規，是公民和平表達意見的一種方法，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就連何東昌在記者會上也承認：游行的學生是“熱愛祖國，支持改革”的，他們“關心民主和自由”，“希望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進程加快些”。他特別指出，只有個別人趁游行之機進行搗亂，有破壞活動，已被抓了起來，而這幾個人恰恰不是學生。^⑩

可見，即使從何東昌所表達的官方觀點看，這次學生運動的主

流也是好的。群衆起來要求民主自由，支持改革，這不正好是給中共的三中全會路線撐腰嗎？然而這次學生上街引起的卻是反作用；最堅決的改革派胡耀邦被趕下政治舞臺。領導中國改革事業的“鄧胡趙”體制破裂了。

老人幫的變換和反胡聯盟的形成

本來在一九八六年夏天，鄧小平曾和胡耀邦商量過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換代問題，並且預定要在一九八七年的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實現。鄧小平對胡耀邦說：

“我全下，辭去一切職務，不再當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那個軍委主席職務，把總書記讓給年輕人當。趙紫陽也半下，當國家主席，把總理讓給年輕人當。這樣，可以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有利於幹部的年輕化。”^①

這種安排方法當然談不上“民主”，而只是封建家長式的安排。不過它確實是專制政體內部的一種改革，不但取消了終身制，而且可以把一大批干預政治的老人換下來。這批老人曾經是戰爭年代的英雄和功臣，如今到了新時期，除了少數站改革前列之外，從總體上說，不論從年齡還是知識結構上看，都很難和現代化的需要相適應。更何況有少數人固守舊的傳統和既得利益，成為現代化的包袱甚至是拌腳石。

胡耀邦完全贊成鄧的意見，並把它告訴趙紫陽。但是很快這個提議就傳出去了，立刻引起嗜權如命的一些老人群起而攻之：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小平同志不能下！”王震在中央黨校一次大會上竟破口大罵：“誰讓鄧小平退下來，誰就是反革命！”^②其實不便說出來的真正理由是他們自己不能下。為了避免在即將到來的“十三大”上被迫退下來，這些老人們加紧進行打倒胡耀邦的活動。如果能在“十三大”之前把胡拉下來，那麼“十三大”時整個大換班就可以避免了。因為胡是改革終身制最堅決的，他一下臺，別人就

未必那麼堅決了。為了實現這個戰略意圖，他們的策略是“捧鄧，拉趙，打胡”。時機呢？學生們送上門來了。“學生鬧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煽動的”；“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濫，是胡耀邦姑息縱容的結果”；結論是“胡耀邦不能勝任總書記職務”。打倒胡耀邦的遊擊就是這樣推出來的。

事實證明，這種策略是有效的，反胡聯盟形成了。鄧小平完全站在反胡聯盟這一邊，趙紫陽也是這樣。

胡耀邦剩下了孤身一人。

鄧小平的強硬決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國家教委副主任）到他家裏，就學生運動發表了嚴厲的談話。

他談話的主題是要用嚴厲手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指責胡耀邦“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⑩他以前曾指示，要開除老作家王若望的黨籍，因為他被人指控散布“自由化”言論。王若望在上海，上海的黨組織沒有聞風行動，胡耀邦也存心保護，此事就壓下來了。這種事當然早有人向鄧小平打過報告，所以鄧小平質問胡耀邦說：“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甚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的群衆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⑪

他又搬出老帳，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寫不寫“反自由化”的爭論來責備胡耀邦。“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起甚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達。”

連他曾經打算從文集裏刪除的關於“精神污染”的講話，這時也成了好東西。他特地指出：“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

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⑩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這個談話裏已經明確表示，為了平息學生運動，要有不惜流血的決心：

“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甚麼辦法？”^⑪

再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決心不顧國際輿論，並且自我感覺良好：

“我們不是把魏京生抓起來了嗎？難道因此中國的名譽就壞了嗎？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此而變壞，我們的名譽還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這一段話在發表時被胡喬木把魏京生的名字刪去了。）^⑫

講完話，他吩咐說：“今天講這些話，主要是明確方針，具體事情你們去辦。”

事實上這一次學生運動，由於學生和警察都相當克制，並未發生嚴重事端。北京學生在一九八七年元旦早上游行到了天安門，被警察拘捕。當晚有更多學生進城來到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公安部門不但迅速釋放了被捕學生，而且把來游行的學生全部用大汽車送回學校，和平地解決了這次事件。

其他幾個城市的學生運動也都先後平息了。

然而對於反胡耀邦的勢力來說，這僅僅是八股文的“破題”，這場戰略決戰的正式文章還沒有作呢。

四 “鄧胡趙體制”的破裂

反胡耀邦的書面抗議

鄧小平召見後的第三天，即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一說一月

日)，胡耀邦向鄧小平提出辭呈。

他在辭呈中表示沒有聽鄧小平的話，以致犯了錯誤，並且講出這樣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話：“一些壞家伙居然把我當作他們的保護傘，蠱惑人心，毒害青年，制造動亂，使已經開創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不能更好地發展，這個後果是嚴重的。”“鑑于我的錯誤嚴重，我請求讓我下來，以便認真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代。”^⑩

胡耀邦此時亂了方寸。

他是黨的總書記。總書記是中央全會選出來的，要辭職也只能召集中央全會，由中央全會按照民主程序決定是否接受他的請求。而且他這個總書記正好有權召集中央全會，但是他卻沒有這樣做，而是把辭職的請求交給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的胡耀邦向排名第二的鄧小平遞出辭呈。有權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會議的總書記自己不召開會議，而是被別人召來召去。所有這些極簡單的程序都亂了套，可見胡耀邦事實上已經被中共強大的專制傳統壓垮了。或者更確切些說，他本來就不曾跳出這種專制傳統的框子。中共的“馴服工具論”培養出來的“黨性”，實際上是逆來順受的奴性。所以盡管胡耀邦本來有合法的權力，但事到臨頭還是跌到專制傳統的宗祠裏，在鄧小平這個大家長的壓力下面，完全失掉了自己，而把命運拱手送給別人。這“命運”還不單是他個人的去留，而是中國改革的前途。

接到胡耀邦辭呈的第三天，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鄧小平召集趙紫陽、彭真、王震、薄一波、楊尚昆到家裏研究。只要看看與會人的名單，就知道胡耀邦的下場了。此時，唯一能保護胡耀邦或至少能起緩沖作用的，是趙紫陽。當時在場的只有鄧小平和他是政治局常委，別人只是些反胡的老人，他們當然可以鼓噪，但在中共最高決策圈內沒有法定權力。然而趙紫陽恰恰主張罷黜胡耀邦，於是胡耀邦的命運就決定了。

“決定”做好了，怎麼實施呢？延安整風模式又派上用場了：先

進行思想批判，然後進行組織處理。這樣一篇文章做下來，才顯得順當。當然，那組織處理的結論早在鄧小平家裏做好了，現在的邏輯只是從結論出發，回過頭來找出“前提”而已。

非法圍攻總書記的“生活會”

經過準備之後，從一月十日到十五日開了六天“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這種“生活會”是專為罷黜胡耀邦而創造的“新生事物”，它既不是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書記處會議，更不是紀律檢查委員會或顧問委員會的甚麼會議，同時也不是中央委員會特設的甚麼會議。就是說，這是黨章上根本沒有合法依據的一個不倫不類的“會議”。誰能出席這個會議，誰不能出席這個會議，完全沒有章程可循，而是隨意挑選的。這個“生活會”的“生活”，就是圍攻黨的總書記。這個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由誰來主持？是薄一波，而他連中央委員都不是。

根據薄一波的報告，會議參加者連胡耀邦在內，大約三十人，其中發言的二十一人，書面發言的六人，沒有正式發言但有插話的二人。至于有没有光參加會議而不發言的，就不得而知了。

與會者對胡耀邦的批評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 對“反自由化”一貫消極。而對“自由化分子”則採取縱容保護政策。胡在一九八四年作協“四大”籌備期間宣布“反對精神污染以後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不提了”，這就造成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濫。一九八六年胡在“自由化”思潮面前繼續軟弱退讓，以致“自由化分子”提高了“自由化”要求的水平，這就為一九八六年冬天的學潮提供了思想準備。

2. 很少提“四項基本原則”，在言論和行動上，都是只反左不反右。

3. 在經濟工作方面，宣揚高指標，提前翻番。提倡刺激消費，促進生產，把消費放在生產前面。這是從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那

裏拿來的觀點，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相容的。

4. 在政法工作方面，宣傳國家大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5. 違反外交紀律，說了許多極不應該說的話。

6. 擅自發表許多“未經中央授權”的有關重大問題的言論。

這六個方面中，前三個“錯誤”應該說大體符合胡耀邦的實際。其實這三條恰恰是胡耀邦忠實執行三中全會路線的證明，是他堅持改革開放方針的體現。其中第三條“刺激消費，促進生產”正是他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的表現。在這一點上，他比中共中央領導層裏的任何人都看得更遠。

至于第四、五、六這三條“錯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純粹屬於無端尋釁。胡耀邦是中共歷任領袖中民主傾向最為堅定的一個，怎么可能去主張人治而反對法治？至于他平時說話，應該說是最坦誠的。他說話最少官腔，最少空話。包括他最受指責的與香港記者陸鏗的談話，也沒有甚麼可以詬病之處。中共甚麼時候為黨的領袖規定過甚麼話能講，甚麼話不能講，甚麼話要經“中央授權”？誰代表中共中央向他“授權”？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和鄧小平，有誰在張口講話之前經“中央”授過權？為甚麼胡耀邦就要有個保姆抱着他去接見記者，就要有人教導他如何說話？這真是大方夜談！

可惜的是，陷入重圍的胡耀邦已經失去還手之力。他作了一個《我的表態》的發言，表示“除了幾點事實有出入”之外，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

按照中共思想鬥爭慣例，被批判者的檢討不管多麼深刻，永遠都是“初步的”，“不夠的”，永遠都不會讓批判者滿意，永遠都要“進一步檢查”，“繼續深挖”，如此等等。這些公式，在這個“中央一級生活會”上，當然要照搬不誤。所以批判者們“希望”胡耀邦“進一步”檢查時，思路要“再寬一點”，認識要“再深一點”，云云。

對於這樣一個違反黨章、臨時拼湊一些人馬向合法的總書記

發動圍攻的所謂“生活會”，圍攻者自己是怎樣評價呢？據薄一波說，“同志們”認為開得很好，“比黨的歷史上任何同類的會議都好。”趙紫陽事後向下邊部署“反自由化”時也講道：“這次對胡耀邦的處理，是歷史上黨內鬥爭最完美的一次。”^⑩

外國人到中國來，一般都埋怨中國人辦事太慢。但這次罷免胡耀邦，卻辦得非常迅速。一月十五日批判完畢，十六日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在當天晚間播出了新聞公報：

1. 同意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之職。
2. 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
3. 以上決定將提請下次中央全會追認。
4. 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職務。

曾經被海內外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一致看好的“鄧胡趙體制”破裂了。盡管鄧小平還允許胡耀邦留在政治局常委會內，以示寬大，但是胡耀邦實際上已經退出政壇，在家閉門幽居，過起寓公生活了。

鄧家獨斷專橫的導向錯誤

鄧小平當然是親手打碎“鄧胡趙體制”的人，不過趙紫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最早老人們選拔總書記人選時，趙紫陽和胡耀邦是同時被考慮的。論起領導才能，趙紫陽不會在胡耀邦之下。胡耀邦在總書記任內確實對政府範圍內的事情過問得多些。他曾在一九八四年提議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聯合召開各經濟部門匯報會。在這個會上他經常插話表態。但是趙紫陽精明強幹，不是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輩。況且胡耀邦比起趙紫陽，領導財經工作非其所長，然而又愛發表意見。這樣，胡趙之間在工作上難免會有矛盾。其實這正是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造成的。趙紫陽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曾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要求解決黨的領導制度問題，而且要求

“趁您和陳雲同志健在，及早解決這個重大問題。”這封信主送鄧小平，並抄送陳雲，但沒有給胡耀邦。^①所以信中雖然沒有指名，實際上是要求解決他和胡耀邦的矛盾，以利工作。當時鄧小平沒有機會這封信。到了一九八七年一月的“生活會”上，主持會議的薄一波忽然把趙紫陽這封信拿出來宣讀，以證明胡耀邦早就不適于當總書記了。黨內老人們是否由於趙紫陽這封信而決定罷黜胡耀邦，當然值得存疑，但一九八四年他們確想搞掉胡，則是事實。關於這一點，趙紫陽在接任總書記之後的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向黨內高級領導幹部講話時，是這樣說的：“中央在一九八四年已經覺察胡耀邦不行，想去掉他，考慮到十二大開過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題對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準備在十三大解決，更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了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提出辭職。在京政治局常委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由胡耀邦出面去解決學生問題已不適當，所以必須提早讓他下來。”^②

據說趙紫陽這封信在“生活會”上公開出來，使胡耀邦受到致命一擊。他沒有想到在黨內親密合作的同志之間，會有這種事情。

不過還有一則從可靠渠道傳出的消息說，下臺後閉門幽居的趙紫陽斷然否認他曾寫信“要求解決胡耀邦問題”。他說，一九八四年那封信的原稿尚在，信中寫的是關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和完善中央領導制度，根本沒有針對胡耀邦的內容。

這件事當然總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不過不管趙紫陽本人在倒胡的問題上有多少主動成分，客觀現實是唇亡齒寒，他們兩人都是改革派的領袖人物，胡耀邦倒了，趙紫陽也就孤立了。

鄧小平原來說過：“天塌下來有胡耀邦和趙紫陽頂着。”現在胡耀邦這根柱子被拔掉了，剩下趙紫陽一根柱子，他不是必須承受雙倍的壓力嗎？

至少，沒有堅定地支持胡耀邦，是趙紫陽最大的失策。這個苦果他在兩年半以後就嘗到了。

五 對“自由化分子”的第一波清洗

執行鄧小平的指示，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和劉賓雁的黨籍

作為“壞人保護傘”和“自由化縱容者”的胡耀邦被迫辭職之後，一場對“自由化分子”的大清洗開始了。

最早遭到清洗的當然是鄧小平直接點名的王若望、方勵之、劉賓雁。

首先被清洗的是王若望。因為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談話中已經責問胡耀邦：“早就說要開除，為甚麼一直沒有辦？”所以上海市的行動最快，還沒有等到中央正式罷黜胡耀邦，就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把王若望開除黨籍了。

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關於開除王若望黨籍的決定》中列舉王若望的“主要錯誤”有：

“攻擊和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

“妄圖取消黨的領導”。“污蔑共產黨就是喜歡權力鬥爭”，說“共產黨書記甚麼也不懂，靠整人吃飯”。

“造謠說從事改革的人‘大部分被打下來了’”。^②其實王若望一點也沒有造謠。事實上發表這個《處分決定》的時候，連改革派的領袖胡耀邦都被打下來了。

這個《決定》是中共上海市紀委直接作出並于一月十四日向王若望本人和他所在支部宣布的。(注一)

第二個被清洗的是方勵之，因為鄧小平已經說了：“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甚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③

於是中共安徽省委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作出開除方勵之黨籍的《決定》。在此之前，一月十二日方的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已被撤消。

這個《決定》說，方勵之的“主要錯誤”是：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

“宣揚全盤西化”。“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現代式的封建主義”，“基本上都是獨裁制、集權制”。

“主張大學擺脫黨的領導”。“主張大學應獨立于政府，成為獨立思想的中心”。

“鼓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煽動學生鬧事”。“說學生是民主化的進步力量”。^②

劉賓雁是一月二十二日被開除的。

據說原來鄧小平談話時沒有提到劉賓雁，是當時一位聆聽鄧的談話者把劉賓雁給增補上去的。增補的理由是劉賓雁參與發起“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討論會”。這個討論會的發起人是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他們在全國範圍內邀請一些人士參加，其中有北京大學教授費孝通和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這兩人都是當年的“右派”。不料他們二位把此事向中共中央“舉報”了。當鄧小平談話時，提議增補劉賓雁的人就把這件事匯報出來了。所以鄧小平

方面把應予開除的黨員名單加上劉賓雁，一方面表揚了兩位“舉報”的教授，說“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③

開除劉賓雁黨籍，也是不經過支部，由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直接決定並通知下去的。

《決定》說：“劉賓雁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是陳腐的、曾經把中國幾次引向災難的過時觀念，僵硬的、教條主義的東西”。

“詆毀共產黨墮落”。“誣蔑學習好八連和學習雷鋒、王杰、歐陽海、曲嘯等，都是為了把人變成黨的馴服工具”。

“把新聞工作者接受黨的領導說成是當‘三孫子’”。^④

劉賓雁既是《人民日報》記者，又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他的組織關係在《人民日報》社，所以開除黨籍這件事就由中共《人民

日報》紀律檢查委員會來做。至于他另一個職務，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當時並沒有動，因為這是作協代表大會選的，而作家們又不是都聽話，很不好辦。

這一波清洗，來勢很猛。當時報紙上又是發消息，又是發社論，一時成為時事焦點。黨員被開除黨籍，在全國範圍內造成這樣大的聲勢，還是很少見的。它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壓力。這三個人，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老作家，一個是自然科學家。人數雖不算多，但代表了方方面面，所以這次整肅，對各界知識分子都起了很大的威懾作用。

“敢于撫哭叛徒的吊客”——邵燕祥

魯迅早就慨嘆中國缺少“敢于撫哭叛徒的吊客”。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由於一連串思想運動的摧殘，有這種風骨的特立獨行之士更稀少了。每當運動一來，罹難者便成為眾人爭相射擊的靶子，親友都躲之唯恐不及，又有誰敢冒險前來撫哭？

可是中國畢竟還有人在。第一次“反自由化”時有吳祖光挺身而出為白樺辯護。現在，第三次“反自由化”的高潮裏又有邵燕祥仗義執言，為劉賓雁講了公道話。

著名詩人邵燕祥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作協主席團總結工作的會議上，他作了一個震驚四座的發言。

對於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的戰績，邵燕祥從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兩方面略加評論。他說，在理論批評方面，沒有看到像樣的文章，“倒是出現一些帶有大批判開路色彩的黨八股。還有不耻于土林的人出來大談‘土氣’。”在創作方面，“現實主義作品幾乎斂迹”。他形容一九八七年的文壇是“一片叱咤吆喝聲”，這其實是對那一年整個“反自由化”喧囂的簡短概括。

更使在座者側耳而聽的是邵燕祥在引用了鄧小平對作家的期

望之後指出：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被鄧小平下令開除出黨的劉賓雁。

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詞中，希望文藝工作者“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同各種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鬥爭。”

引完了鄧小平的話之後，邵燕祥說：

“在中國作家中，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我認為應推在十一屆二中全會以後恢復了寫作報告文學的劉賓雁。他在從《人妖之間》開始的大量作品中，表現了高度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人的黨性（不管他現在有沒有黨籍）。為什麼這樣說呢？我認為是因為：他毫不隱蔽自己的觀點，敢于面對事實，講真話，披露和解剖社會的真相，並且總是從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的觀點出發，來伸張正義，打擊邪惡，維護黨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抨擊一切與此相背離的壞事和弊端；從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那些損害人民利益的官僚、腐敗現象，怎樣嚴重損害了黨的政治信用和社會主義的聲譽，只有維護人民的利益才是保衛黨的領導的唯一途徑。”^②

這個發言引起一些人的不悅。邵燕祥已經做了迎接打擊的準備，不過後來沒有甚麼下文，這也是一種進步吧。其實邵燕祥無非是把人們對劉賓雁的共同看法集中表達出來罷了。劉賓雁無情地揭露危害這個黨的腐化分子和官僚們，正是對黨的愛護，是對人民負責。劉賓雁並因此而被一些人稱為“中國的良心”。可惜的是中共當局自己不要這顆良心，硬說這個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反黨”，一定要把他清除出去才甘心。其實這種倒行逆施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中國共產黨本身。這正是包括邵燕祥在內的許多正直的共產黨員深感痛心的事情。

(注一)按中共黨章，處分黨員的過程是：由所在支部大會表決（本人也有表決權），“決定”作出之後要由本人簽字（或接

受，或不接受），然後報紀委批準。本人如果不服，還可以向上級申訴，直至向中央申訴。不過在“反自由化”的清洗中，這個程序都顛倒過來，由上級作出“決定”，向下級和本人“宣布”一下，就算完成了。本人認可與否，已無意義；向上申訴，更無必要，因為“決定”本來就是上邊來的。

六 對“自由化分子”的第二波清洗

理論界的變遷

隨着胡耀邦的下臺，他所配備的中宣部長朱厚澤也下臺了。鄒力群兩年前失去了這個意識形態司令部，如今該收復失地了。不過他沒有親自來，而是推薦《紅旗》雜志總編輯王忍之來接替以“三寬”著名的朱厚澤。

在理論隊伍“分道揚鑣”以後，胡喬木和鄒力群有一支“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另一支所謂“自由化”的隊伍，本來應該成為胡耀邦推動改革的理論力量，但是胡耀邦既不知怎樣運用也不去認真保護，最多是在他們遭到打擊時，起一點緩衝作用，有時甚至還和這些人“劃清界線”，以表示自己清白。所以這支隊伍已經被打得四零五散了。

趙紫陽對思想理論問題興趣不大，或許和他長期擔任地方黨政領導有關，到中央工作（取代華國鋒成為總理）以後，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具體操作的層次上。他有自己的幕僚班子，這一點和胡耀邦不一樣。他的幕僚主要集中在體制改革研究所，由他的秘書兼助手鮑彤領導，另外還吸收了政治學家嚴家其。他們都是胡耀邦時期思想解放的名將，也是胡喬木和鄒力群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除了這兩個人，趙紫陽對胡耀邦時期的理論界概不接觸。他的幕僚班子主要是由一批中青年組成，其中當然有優秀人才。不過，如果不去評論某些具體人物，而是從理論表現上來看這個整

體，那就可以說這個“智囊團”功底不深。他們較為傾心于自己也未必了解的西方新潮術語，力求提出能夠博得當政者垂青的主張。比如，“新權威主義”就出自這個“智囊團”。他們主張由一個強權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範例就是韓國、新加坡和臺灣。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一個政治強人的專制統治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因此中國大陸也應該這樣。這種“主義”很合乎趙紫陽的口味，他就是主張“經濟要放，政治要收”的。其實這種主張可以說是中共高層主流派的共識。問題只是這個“新權威”由誰來擔當。趙紫陽的幕僚當然把目光集中在趙紫陽身上，豈不知這正是給趙紫陽幫了倒忙，預先寫下了他將要被廢黜的伏筆。

這一場“反自由化”運動，在思想和理論上已經沒有多少新戲好唱，於是剩下的就是組織上的清洗了。開除王若望、方勵之和劉賓雁的黨籍，只是一個開頭，要清洗的還有一大批。當時鬧得滿城風雨，以致國內外都有人詢問中共領導，是否繼續清洗。鑑於人心惶惶，趙紫陽等領導人一再表示，除了王若望等三個人以外，不會再清洗第四個人了。

然而到了一九八七年夏天，第二波清洗開始了。

文字獄製造廠

這時，專門有一批人集中在一個招待所裏，搜羅和整理“自由化分子”的材料。這是一個新的文字獄製造廠。它的產品，有的印發全國，有的上報中央。比如，《方勵之言論摘編》、《劉賓雁言論摘編》、《王若望言論摘編》、《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就是當作“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還有一本《若干言論對照》，是把“自由化分子”的言論和大學生的游行傳單和口號或大字報對照排印，以便證明“自由化”言論煽動學潮。例如，關於“黨的領導”問題，有一則是這樣對照的：

要實行多黨政治，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要平起平坐，分庭抗禮。

(王若望言論)

一黨制有甚麼好處，兩黨制又有甚麼壞處？西方國家有甚麼不好。

(南京學生演講)^②

令人不解的是這些材料一律沒有編者和出版者，不知是那裏搞的，沒頭沒腦，應該說是地道的非法印刷品，或黑材料。然而這些材料卻是權威的，它被發往全國各個有關單位。誰的名字，誰的自論，只要被選入這些材料，“自由化”的帽子就戴定了。

除了這種綜合材料外，更厲害的是個人材料，即每個“自由化分子”的單行材料。這又恢復了文化大革命時“專案組”的辦法，背着本人整理材料。它極端機密，極端重要，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但是本人卻不知道，更無權去反駁或申辯。

因為這個整材料的招待所的地址是在北京的“廠橋”，和明朝的特務機關所在地“東廠”有一個“廠”字相同，所以有人又把它叫作“東廠”。

當時紛紛傳說要清洗一批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據說送到中央的名單是十三人，人稱“十三太保”。不過一九八七年七月，中央書記處開會時，實際上只討論了五個人。討論的結果是：

吳祖光——勸其退黨。如不退，則開除黨籍。

王若水——勸其退黨。如不退，則除名。

蘇紹智——撤消黨內外職務。

張顯揚——開除黨籍。

孫長江——開除黨籍。

“勸退”不是黨紀處分。按中共黨章第九條規定：“黨員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黨員義務，不符合黨員條件，黨的支部應當對他進

行教育，要求他限期改正；經教育仍無轉變的，應當勸他退黨。”對吳祖光和王若水這兩個名揚海內外的劇作家和哲學家，采用“勸退”而不是開除，大概是為了避免輿論大噪，因為中共一直向海外媒體保證，不會在三個“自由化分子”之外再清洗第四個人了。

政治局委員親自登門勸“自由化分子”退黨

為了使“勸退”能夠奏效而不必動用“開除”的強硬手段，胡喬木于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自告奮勇親自登門去找吳祖光。

為了“勸”一個“不夠黨員條件”的人退黨，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出面，而且是親自登門拜訪，真是黨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聞。這是說明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重視”，還是問心有愧？還是怕把事情鬧大，無法面對世界輿論，而想悄悄了結？（注一）

不過對王若水的“勸退”，胡喬木就不出面了。這位政治局委員在和王若水的交手中已經嘗過一次苦頭：在人道主義的較量上，胡喬木很不體面地輸給了這位倔強的對手。現在雖然終於把他清除出黨，報了一箭之仇，但胡喬木畢竟沒有鼓起再次對陣的勇氣，于是改由中紀委把文件送給《人民日報》，由報社領導向他宣布了。

其實文件中所列的王的“錯誤”，都是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候的老“問題”，這些“問題”早就處理過（免掉了王的副總編輯職務），這時又重新拿出來，作為清除出黨的理由了。王若水當然不服，於是“勸退”就改為“除名”了。

基層黨委拒絕中央書記處的決定

對蘇紹智和張顯揚的處分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執行的。蘇和張都在該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社會科學院先召開馬列研究所黨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關於處理蘇紹智和張顯揚的決定，當場遭到馬列研究所副所長兼黨委書記彭克宏的堅持反對。彭認為中央書記處無權直接處分黨員。處分黨員必須

經過支部大會，書記處此舉違反黨章。於是黨委擴大會的參加者響起批評書記處的決定，並拒絕接受。

當時事情鬧得很僵。過了些天，社會科學院把中央書記處的決定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名義發下來，才把蘇紹智的所長兼分黨組書記的職務撤了，把張顯揚的黨籍開除了（按中共黨章，紀律檢察委員會在必要時可直接處分黨員。）

蘇紹智是海內外有名的學者。對他的處理，在中國社會和學院內引起強烈反響。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浦山曾經憤怒地提出抗議。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

張顯揚是這個所的研究員，然而開除他黨籍的文件，除了政治帽子以外，舉不出任何具體事實，只是說張顯揚“一貫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種毫無事實根據就整肅和清洗共產黨員的粗暴作法，使得群情大嘩。有人憤怒地指責這種作法“比四人幫還要墮落”。

聶榮臻仗義執言，孫長江虎口餘生

開除孫長江的決定沒有執行，這是因為聶榮臻元帥講了話：孫長江被王震從中央黨校趕出來之後，先是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教書，後來到《科技日報》任副總編輯。原來中央書記處討論清洗“自由化分子”時，本來沒有他的名字，是討論張顯揚時被人臨時提出來加上去的。（注二）但在貫徹這個決定時，《科技日報》總編輯林自新站出來打抱不平，他給自己的老領導、主管過科技工作的老革命家聶榮臻元帥寫信要求“刀下留人”。聶元帥給中紀委書記陳雲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他不了解孫長江，但了解林自新是老實人，講話可靠。於是陳雲批示說，對人的處理要慎重，材料要核實。這個批示到了趙紫陽處，趙還想趁這個批示一並挽救王若水等，但是已經晚了，除了孫長江以外，中紀委的決定都已經執行過了。（注三）在中國，真要處理一個重大腐化案件，常常需要牽延歲月，很難下

手，比如後來的陳希同案件，經年累月都不見動靜。但是收拾“自由化分子”，卻是雷厲風行，說到做到，毫不含糊的。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主要的任務是給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作準備。趙紫陽沒有把中紀委準備的全部“自由化分子”名單提交會議討論。討論了五個人之後，趙就把它擱置下來，最後是不了了之。這樣，其餘幾個人暫時沒有受到整肅，于是這一波清洗也就過去了。

(注一)吳祖光被“勸退”之後，曾給中紀委寫信申辯，披露了事件詳情，現摘要摘錄如下：

胡喬木到吳家後，將中紀委勸吳退黨的文件宣讀一遍，不給他看原件。吳曾幾次要提出意見，但胡喬木說“今天不辯論”，並強調“今天沒有時間”，頻頻看表，阻止吳祖光發言。

這份文件列舉的吳的“錯誤”有：

- 一、吳在五十年代就反對黨的領導。
- 二、吳八〇年入黨後曹說：入黨使他“啼笑皆非”。
- 三、吳認為“清除精神污染”是給中共丟了臉。

四、吳著文反對戲劇審查制度，認為有權勢者就能判定一部影劇的生死，是荒唐可笑。

五、吳著文說，戲劇審查制度是繼承了腐朽的國民黨政權的可耻傳統。

這些指控，前兩項是無的放矢，後三項是斷章取義。因為第一項是當年劃吳為右派的理由，此案本來就是冤案，而且已經平反。第二項是捕風捉影，本無其事，是中紀委根據香港刊物報導強加給吳的。

但是吳祖光還是接受了“勸退”。他說，這是出于三點考慮：

第一，“尊老”。胡喬木年老，親自爬上四樓來到吳家，使

吳“深感不安”，故接受。

第二，維護黨的“信譽”。黨中央已保證不再開除第四個人。如吳不接受勸退，將被開除，使黨再次失信于民。

第三，對黨失望。中共拒絕批評，摧殘人才，迫害忠貞敢言的知識分子，至今難以糾正，故吳願意退出。^②

(注二)據說書記處會議討論開除張顯揚時，宣讀他的材料，上面有這樣的記載：文化大革命中，張顯揚曾經打蕭前(人民大學教授)。孫長江在場，沒有加以制止。(按，文革中兩派武鬥，在人民大學亦然。當時張顯揚與蕭前均在人民大學。但並無“張顯揚打蕭前”之事。)不料書記處與會諸公把“蕭前”聽成“蕭乾”了。蕭乾為著名老作家，平白無事被打，當然引起公憤。有人插話說，這比打人的還壞。於是會議決定把孫長江也一並開除。其實他們連“蕭前”並非“蕭乾”都未弄清。

(注三)趙紫陽雖然對胡耀邦時期的理論界人士沒有興趣，但是也不想把他們通通打倒。據《鄧小平帝國》揭露，中央書記處專門討論如何整肅這些人，是鄧力群通過王震向鄧小平進言，由鄧小平向趙紫陽施壓的結果。^③

崇 淳 崇

第十二章 引文出處

①《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紀》第 282-283 頁

②《命運——李洪林自傳》第 264-266 頁

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 1184 頁

④同上，第 1171-1172 頁

⑤《鄧小平帝國》第 186 頁

⑥同上，第 176 頁

⑦《國史通鑑》第 4 卷，第 65 頁

⑧《方聯之言論》第 93-9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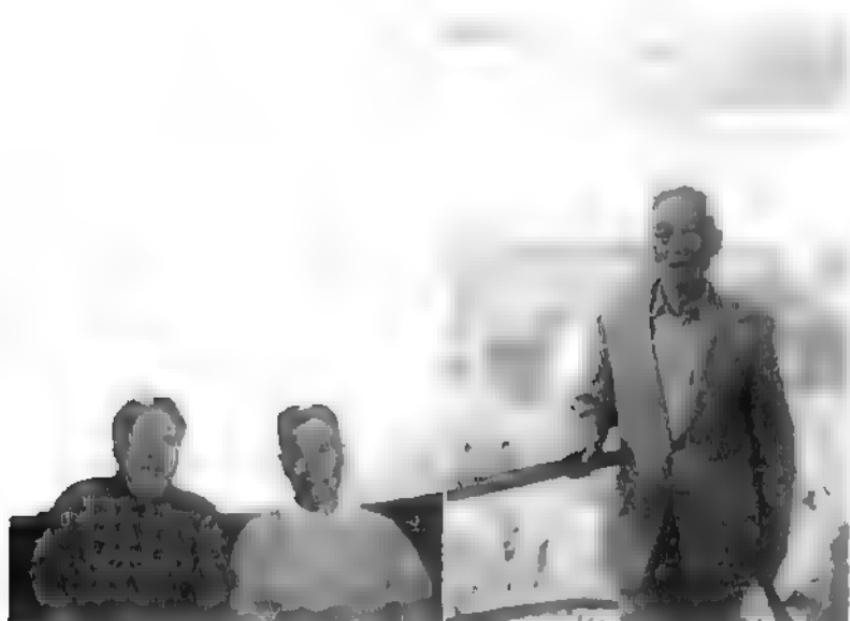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三反“自由化”

〔《國史通鑑》第 4 卷，第 66 頁〕
① 同上，第 66 頁
② 同上，第 187 頁
③ 〔《十年的路》第 211 頁〕
④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369 頁
⑤ 同上，第 370 頁
⑥ 同上，第 371 頁
⑦ 同上，第 371 頁
⑧ 同上，第 370 頁
⑨ 〔鄧小平帝國〕第 191 頁
⑩ 〔鄧小平帝國〕第 200 頁
⑪ 〔十年的路〕第 198 頁
⑫ 〔鄧小平帝國〕第 200 頁
⑬ 〔共和國歷程〕下卷，第 2078 頁
⑭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369 頁
⑮ 〔共和國歷程〕下卷，第 2077—2078 頁
⑯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 371 頁
⑰ 〔共和國歷程〕下卷，第 2079 頁
⑱ 〔邵燕祥在中國作協主席團四屆六次會議上的發言〕（原稿）
⑲ 〔若干言論對照〕第 17 頁
⑳ 〔吳祖光閻文選〕第 49—53 頁
㉑ 〔鄧小平帝國〕第 209—210 頁



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左上圖)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右下圖)，是中國大陸思想最解放、在改革開放中走得最遠的兩個省委領導人。任仲夷原任遼寧省委書記，是他最早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到廣東後，敢想敢幹，使這個省迅速走在全國改革開放的最前列。項南在福建堅定不移地貫徹三中全會路線，解決了這個省的歷史遺留問題，發揮地方優勢，給經濟起步打下堅實的基礎，施政極得民心。但這兩位最優秀的省委書記，卻遭到保守派的打擊，在一九八六年都被撤換下來了。

第十二章附圖



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直接下令開除黨籍的三個中共黨員：最早被開除的是上海作家王若望（上右），第二個是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下），第三個是中國

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與作者合影）





上圖為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高潮中第二波被清洗之王若水(右二)和張顯揚(右三)。孫長江(左一)本在清洗之列，因聶榮臻元帥建言，得免於難。

右圖為同案被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之蘇紹智(與作者合影)





邵燕祥和吳祖光一樣，是中共高壓之下又一位“敢於撫哭叛徒的吊客”（魯迅語）。他在鄧小平下令開除劉賓雁一年之後，在作家協會主席團上發表評論，認為在中國作家中，對妨害四化的思想作鬥爭，劉賓雁做得最好。邵燕祥這個發言，是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後鴉雀無聲的中國大地上第一聲驚雷。

圖為邵燕祥一九九八年與作者攝於北京



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唯一真正傾向自由民主並真誠愛護知識分子的胡耀邦，和這個黨的本性不能相容。然而他的力量還不足以改變這個黨，所以最後是他自己被淘汰出局。在廢黜胡耀邦的過程中，鄧小平當然是起決定作用的人，然而他也不過是集中代表了這個黨強大的左傾傳統和頑固的保守勢力而已。

這是胡耀邦下台後在家中賦閒時所攝的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滿面愁容表現了他胸中難消的塊壘。這次沉重的打擊無疑摧毀了他的健康，使他過早地離開人世。

第十二章附圖



這是胡續偉組織的和官方“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唱對台戲的一本書，幾經周折，勉強出版。出版後適逢“六四”，正好趕上四反“自由化”，被官方大批一通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1987－1991)

趙紫陽和胡耀邦的矛盾，是在同一條改革路線下的權力鬥爭。因此，胡耀邦下臺並沒有導致路線改變。趙紫陽上臺後繼續推行改革，並且在思想上有所鬆動，因而和保守勢力的矛盾日益尖銳。不過趙紫陽在黨內政治鬥爭中比胡耀邦更有魄力，所以在新一輪鬥爭中曾經占有領先地位。黨內和社會上的民主氣氛也因此活躍起來。

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民主運動，在五四以來的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並因此引發了獨裁勢力的暴力鎮壓，以及第四次“反自由化”高潮。

一 鄭力群的挫敗

趙紫陽控制局勢，左派未能得手

胡耀邦下臺使鄭力群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欣喜若狂。新上任的中宣部長王忍之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一個“第二次撥亂反正論”，（注一）表達了他們這種心情：他說，第一次是“撥”文化大革命之“亂”，這一次是“撥”自由化之“亂”。“這兩次撥亂反正，在性質上是不同的，一個是反左，一個是反右”。^①

按照“馬克思主義者”們的心願，這次“反自由化”應該完成“消除精神污染”時沒有完成的任務，把它弄成一場大的運動，推向各個領域。

但是趙紫陽對這個問題很清醒。他顯然不想讓“反自由化”的

領導權落在鄧力群們手裏，以免他們搞得驚天動地，破壞安定局面，打斷改革進程。因此他上任之初就叫鮑彤起草一個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出（即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四號文件”）。

這個文件一方面強調“反自由化”多麼重要，要求全黨“把這場鬥爭作為今年的一件大事”，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另一方面又強調這個鬥爭的“長期性”。文件說，反自由化的鬥爭“存在於開放和改革的整個過程中”。這就是說，它實際上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沒有甚麼特殊的意義，也不具有壓倒其他工作的突出地位。而且這個文件還對“反自由化”作了些限制：“不要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科學技術研究、文學藝術風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不涉及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

把這些方方面面通通排除之後，“反自由化”的鬥爭就剩下中共內部了。所以文件規定：“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不過對於黨內也有限制：“農村不搞”，只搞城市。而城市的黨政軍和企業事業單位，也“主要是對廣大黨員進行正面教育”。^②就是說，不搞運動，不搞批判。

這樣一來，趙紫陽既把“反自由化”的大旗拿在手裏，表明他這一手很“硬”（胡耀邦就是因為這一手太“軟”而下臺的），但是又嚴格限制了它的範圍和做法，並且實際上把它容解在日常工作當中了。

鄧力群當然不甘心。不過趙紫陽此舉得到普遍歡迎，特別是得到鄧小平的首肯，所以中國的政局由於鞭撻胡耀邦所產生的巨大震蕩，在較短的幾個月內就歸於平靜了。一九八七年夏季的第二波清洗，也因為趙紫陽的有意擋臂而中止了。

百分之六的民主把鄧力群淘汰出局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舉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爆

出的最大新聞是鄧力群落選。

原來中共執掌全國政權以後，按照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原則，在各種選舉當中，一向實行“等額選舉”。這種“選舉”是由領導上按照應選的名額提出“候選名單”，然後由選舉人去劃圈。從理論上講，選舉人可以不選這個名單上的“候選人”而另外寫上自己想選的人。但是，事先既沒有競選過程，各個選舉人也難以互通信息，即使大多數人都在選票上另外寫上自己要選的人，票數也必定非常分散，實際上不可能改變選舉結果。所以，只要是“等額選舉”，領導上欽定的“候選人”肯定當選無疑。中共就是用這種“無產階級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來保證權力壟斷的。

然而“十三大”卻出現了例外。這次大會，在選舉上有了一點改革：給了選舉人一塊小小的選擇餘地；預選時實行“差額選舉”，在一百七十五名中央委員的名額之外，多加了十名候選人，共一百八十五名。這個差額其實也很可憐，還不到百分之六。但是這百分之六的餘地果然很有作用，鄧力群被選掉了。這樣，他就沒有資格被列入正式候選名單，自然就當不上中央委員了。

本來籌備“十三大”的“人事組”（注二）給鄧力群安排的職務是“政治局委員”。既然他連中央委員會都進不去，政治局委員也就沒有指望了。為了挽救這個頹局，鄧力群又被安排到顧問委員會（注三）去當一名“常務委員”。顧問委員會由二百名委員組成，是“等額選舉”，鄧力群算是被選上了。但是到了選舉常務委員的時候，居然出了差子，鄧力群只得八十五票，不夠半數，又落選了。^②

鄧力群在中共“十三大”遭到慘敗的消息不脛而走，知識界許多人額手相慶。這個事實表明，即便黨內高層，多數人對於鄧力群所代表的左傾路綫也都討厭了。

鄧力群的能量和他在黨內鬥爭中的位置

鄧力群的落選是他一生最嚴重的挫折。在中國共產黨內，他

是經受戰爭年代艱苦鬥爭考驗並有黨政工作經驗的老幹部，同時又充分了解理論工作的重要性並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在中共的思想理論隊伍中，不但那些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新貴不能和他相比，就是延安時期一些老的理論家，也因為缺乏實際鬥爭經驗而相形見绌。和學者型的胡繩或才子型的田家英不同，鄧力群讀書沒有他們多，自己也不大寫東西。但他思路清晰，能夠組織力量寫出大塊文章。他善于用人，也善于整人。他對於投靠者愛護備至，而對於異己者的打擊也絕不留情。他深沉持重，信念執着，不像胡喬木那樣朝三暮四。他又因長期身處最高領導核心，所以深諳中共高層內部政治遊戲規則。他是毛澤東路線所造就的骨幹人才，不管心裏是怎樣想的，反正手裏高舉的是“共產主義”旗幟，口裏念念不忘的是毛的教導。凡此種種，使他在黨內一部分高級領導骨幹中頗有人望，不但像王震這樣只認得槍杆子的人對他言聽計從，而且在鄧小平面前他都有不小的發言權。

本來在批判四人幫和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鄧力群和他所領導的研究室一直是走在思想解放隊伍裏面的。或許是受了領袖欲的驅使，三中全會以後，他毫不猶豫地站到反對改革的傳統勢力一邊。而反改革者也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鄧力群正是這樣一個得力的角色。恰恰他又是能向鄧小平進言的人，于是他的位置就越發重要了。以後在改革和保守這兩股力量的鬥爭中，不光是鄧力群影響鄧小平（例如謊報軍情，誘使鄧小平去清除“精神污染”），而且鄧小平也需要鄧力群。因為鄧小平要在全黨保持平衡。當他要改革的時候，就要傾向胡耀邦，當他要照顧保守勢力以便得到他們擁戴時，就要傾向鄧力群。所以鄧力群是他手上一張有用的牌。

鄧力群早就沒有把胡耀邦看在眼裏。事實上在政治波瀾裏，胡耀邦也的確不是鄧力群的對手。不過使鄧力群難以接受的是，胡耀邦下臺後，上臺的竟不是他鄧力群，而是一個務實的趙紫陽。更使他受不了的是“十三大”竟把他淘汰出局，使他蒙受了一場

奇耻大辱，弄得從此抬不起頭。

其實這件事也不單單是鄧力群個人的挫折。它反映了歷史的趨勢。一向奉行毛澤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中國共產黨，剛剛把束縛黨員手腳的選舉制度放鬆了百分之六，就被下面的“民主”犯上作亂，造了“集中”的反，把領導上安排的人給選掉了。這件事充分說明：不但鄧力群所代表的毛澤東的路線已被黨內多數人所唾棄，業已無法挽回，而且中共傳統的黨內專制制度，也難以照舊維持了。

“十三大”後政治空氣的活躍

“十三大”還有一個新的進展，就是正式提出政治改革。雖然這個政治改革比起一九八〇年鄧小平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已經大為遜色，但是在沉寂七年之後能夠在黨代表大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也是一個進步。這次提出的政治改革主要是“黨政分開”。雖然它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但是也觸及中國政治一個重大弊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如果真能解決這個問題，那倒真是在政治改革上前進一步。

事實證明這個黨政分開的決定並沒有實行，而且以後還被“三代”給取消了。不過當時對活躍政治空氣卻起了推動作用。“十三大”以後，特別是一九八八年，中國思想界又開始活躍起來。

這種活躍的氣氛甚至感染了鄧小平。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常委向鄧小平匯報“價格、工資改革初步方案”時，話題最後轉到有人說中共領導人“在海外有存款”的問題上。薄一波說：“對那些胡說八道、造謠誹謗、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要硬一點。”這時鄧小平說話了。他認為，造謠誹謗要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依法處理。但是對不同政見，不能這樣。他說：“有些人有不同政見，這是允許的，比如他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見，不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如

把這個納入法律解決的範圍，太複雜，整個社會空氣都要變了。”
(注四)

這是自從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以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對不同政見表示寬容。

當然，在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之前，在人治的條件下，這種話說了也可以收回；即使他不收回，下面也可以不照辦。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句話說了也等于白說。當局對不同政見的鎮壓反而變本加厲了。不過，這個時候由鄧小平說出這句話，畢竟反映了一九八八年的政治空氣確實是大大活躍了。應當把這種現象當成舉步艱難的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進步。

(注一)中共自粉碎四人幫以來，就提出“撥亂反正”的口號。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個口號一直是反左的。雖然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原則”是為了反右，但是他始終把反左作為主要方向，從未改變過。王忍之這個“第二次撥亂反正論”代表了極左勢力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共中央的方針的，所以不久就在趙紫陽的批評下收回去了。

(注二)中共籌備每一次代表大會，都要成立兩個組：一是文件起草組，準備本屆中央委員會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二是人事組，準備下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和中央主席的名單。這兩個組都很重要，一個是確定黨的政治路線，一個是安排黨中央的人事。其中人事安排尤其重要，鬥爭也最為激烈。而且這個人事安排還不限于黨中央，包括下一屆國家領導人，也都一併在這裏決定。至于在黨代表大會或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選，那不過是走個形式罷了。為了免于在投票時失控，“等額選舉”是最穩妥的辦法。這就是為什麼中共不肯放棄“等額選舉”的真正原因。

(注三)顧問委員會可以列席黨的同級委員會，可以發言，但無決策權。這是中共為取消領導職務終身制及實現幹部年輕化的一個過渡措施。它使一部分年老的領導幹部從黨的各級委員會和國家機關中退下來之後，在顧問委員會裏過渡一下，可以減輕驟然放棄權力的失落感。這樣可以減少領導機構新陳代謝的阻力。不過事實證明進入顧問委員會的老人們對中國政局起了很大作用，特別在關鍵時刻，比如廢黜胡耀邦這種事情上，可以說是起了決定作用。顧問委員會從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開始設置，到一九九二年“十四大”時撤消，共存在十年。

(注四)這次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主要是為了解決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問題。要使中國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必須進行價格改革，使價格從行政命令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在市場上按價值規律自由浮動。當然，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這種轉軌是很困難的，弄不好會引發經濟混亂甚至陷入危機。鄧小平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下決心要“開物價關”。然而國務院在實行物價改革時用的是行政命令方法，對幾種商品實行提價。結果導致刮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漲價風，弄得價格改革半途而廢，並且換了一個政策：把整個經濟改革停下來，進行“治理整頓”。

二 “個人”的覺醒

社會在思想上的進步不可逆轉

一九八八年是真理標準討論十周年。雖然當年批判“兩個凡是”並堅持思想解放的理論界人士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但是整個社會在思想上的進步是不可逆轉的。當局可以動用政治的、組織的甚至法律的手段去阻擋先進思想的傳播，但是已經傳播開來

並為社會所接受的思想，卻無法從人們頭腦裏奪走了。

十年間，中國社會在思想上的收穫是豐盛的。這種收穫可以從不同方面總結出許多成果。不過，如果放在人類文明史這個大背景上來觀察，那就可以發現，“個人的覺醒”是這十年最大的進步。

從傳統文化看，中國是一個不承認個人價值的社會。除了天子，每個人都處於人身依附當中，沒有獨立的人格。五四運動是一次啓蒙運動，它對幾千年的人身依附發起一次勇敢的衝擊。但是在五四運動中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卻用集體的、階級的、組織的價值，壓倒了個體的價值。這種壓倒，是在革命的浪潮中實現的，因此能風靡一時。等到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集體主義便取得至高無上的地位，個人主義被看作“萬惡之源”。這已成為全社會普遍的價值標準。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現代迷信的氛圍中，就更談不到人的價值了。那時候只有一個人具有最高的價值，其餘的人簡直都不是人，可以任意侮辱和摧殘。

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標準討論，只是從認識論上打破現代迷信，從“兩個凡是”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種解放意味着不再迷信偶像，而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當然蘊含着人的解放的意義，但它畢竟屬於認識論的範圍，即怎樣認識世界，還沒有涉及價值觀，即怎樣評價世界的問題。

“人”的覺醒的歷程

一九八三年那場人道主義的論戰，標誌着人的價值問題已經正式提到全社會面前了。以王若水為代表的知識界，站出來為人道主義辯護，實際上是從理論的高度上喚醒人們意識到自己的主體位置和價值。人道主義的聲音在中國當然早就有，但一則那聲音太微弱，再則以前也根本不存在把人當人看的社會條件。自從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經過短短幾年，就把中國大陸上所有的

個人都編織到一張無所不包的羅網當中了。每一個人都屬於某個組織：或是機關，或是團體，或是部隊，或是學校，或是生產隊。即使某人不屬於任何單位，他也必須屬於“街道”，受居民委員會管轄。絕對沒有任何人能游離於這張羅網之外。即使你甚麼行政關係組織關係都不要，也不能不要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糧票，沒有糧票就要挨餓。所以這種制度完全剝奪了個人的獨立性，怎麼能談到人的價值？

只是改革開放以後，先是農村包產到戶，後是城市自謀職業，有了個人的經濟基礎，才能有個人的獨立地位，才能使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那張羅網，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正是社會條件的這種變化，使得人的價值問題真正能夠提到社會面前。但是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要使人的價值得到社會公認，是很難的。現行的社會制度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制度。中國共產黨高踞于金字塔的頂端主宰一切，黨的意識形態在全社會處于支配地位，每個人都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是馴服工具。“個人服從組織”不單是黨員的天經地義，也是全社會每個人立身處世的準則。在這種條件下，凡為個人爭人格爭獨立的言行自然都是異端。而且這種社會條件是經過幾十年的鑄造，早已定型並且深入人心。在這種環境裏要在價值觀上為個人爭取地位，遠比在認識論上給實踐爭取地位要難得多。

不過，由於改革開放所導致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中國畢竟來到重新認識人的價值的歷史關口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間，除了人道主義討論，還有一些表現個人覺醒的文化現象陸續出現，特別是在青年當中首先出現。它表明了作為主體的人的躁動不安。

對中共傳統“思想工作”的挑戰

一九八〇年五月《中國青年》第五期發表了署名“潘曉”的青年

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從而引起了一場人生觀大討論。潘曉提出的“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的人生態度，引起青年們的強烈關注。要是在毛澤東時代，潘曉肯定要陷入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滅頂之災。但是這一次卻不是。青年們對她的觀點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各抒己見，但都是在認真探討這個問題。從五月到十二月，編輯部共收到六萬件來稿和來信，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盛況。^④只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人人都“甘當螺絲釘”，“一切聽從黨安排”的年代已經過去了。青年們這樣熱切地關心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說明他們開始覺醒了。

這種覺醒，對於中共的“傳統優勢”——思想政治工作——是嚴峻的挑戰。中共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專門轉變人的思想的，也就是克服“錯誤思想”，樹立“正確思想”。其實從人的價值這個角度，說到底，這種思想工作無非是貶抑個人的價值，消滅獨立個性而已。但是，這種方法在新時期不大靈應了。特別是青年們，對這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從大學的公共政治課到黨團幹部的個別談話，都表現了明顯的厭倦。

“青年導師”蛇口碰壁

八十年代初，胡喬木發現了北京師範學院一位教師很有口才，便囑該校晉升他為“德育教授”，使之專門以德育人。（這大概是中國大學獨有的一門學問。有一種教授的專業是“德育”，其品德之水平可想而知。）後來遼寧又涌現出一位教育工作者，早年被打成右派和“現行反革命”，平反後以毫無怨言而著名。當代中國在左傾路線下，冤獄遍于國中。人性未泯，蒙冤者總難免略有怨氣，而這位右派竟甘之如飴，殊為難得，堪稱青年楷模。況且他也有口才，於是被調到中宣部，成為“局級調研員”，實際上也是被任命為德育專家。這兩位專家，再加上另外一位專家，常被一些地方請去，以他們的“德行”對青年進行教育，據說效果卓著。

但是一九八八年，這幾位青年導師卻在深圳的蛇口碰上了麻煩。一月十三日，蛇口舉行一個“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中宣部那位專家對青年宣講德育的時候，把蛇口青年分成“建設者”、“創造者”和“淘金者”，結果引起了一位青年的發問，要求專家解釋一下甚麼叫“淘金者”。

專家說：“我認為內地有少數青年到深圳、蛇口來，目的不是為了創業、建設特區，而是圖這裏的生活好、工資收入多，如果錢少了，生活又艱苦，他們就不肯來，我把這類人當作淘金者，並認為特區不歡迎這樣坐享其成的淘金者。”

不料青年們沒有接受專家的這種德育，反而予以駁斥：“淘金者有甚麼不好？”“我們到蛇口深圳來為甚麼不能賺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過錯。‘淘金者’來蛇口的直接動機是賺錢，但客觀上也為蛇口建設出了力。這樣的‘淘金者’有甚麼不好？”

於是這個座談會變成了辯論會。教育人的專家和被教育的青年各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根本談不到一起。比如，青年喜歡深圳“比較自由”，專家認為這是“錯誤言論”。專家在深圳看到許多外國車就感到“難受”，青年則認為，在開放的主題下，“沒有一點外國的東西是落後的表現”。專家主張應“大力提倡”個體戶把很大部分收入獻給國家，青年則認為個體戶已經為國家作了貢獻，只有“理直氣壯地把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人相信黨的政策的穩定性。

座談會的高潮是一位專家對質問他的青年說：“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訴我？！”他以為會把這個不聽教誨的人嚇住，不料這位青年毫不在乎，當場掏出名片交給了他。

這次事件，後來《人民日報》用《“蛇口風波”答問錄》[◎]予以發表，一下子轟動全國。它表明傳統的價值觀已經動搖，按照傳統模式鑄造馴服工具的思想教育，在開始覺醒的個人面前已經不靈了。

三 知識分子的獨立意識

“毛”與“皮”的關係發生變化

毛澤東一直把知識分子比作一根根的“毛”，總得依附在一張“皮”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歷次思想運動，可以說都是用強制的方法把“毛”附在中共這張“皮”上的過程。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也真是在努力使自己能附在中共的“皮”上，以圖有個安身立命之處。就連被目為“反黨小集團”首領的胡風和幾十萬“右派”又何嘗不想附在中共的“皮”上？問題是中共一方面要求他們依附過來，一方面又不放心，老是把他們看成“非我族類”，因此又不斷地排斥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打入“另冊”才心裏舒服。就連理論工作務虛會後被指責為“和黨分道揚鑣”的理論家們，其實都是忠貞的共產黨員。他們並沒有想另樹一幟，只是希望黨在改革的路上繼續走下去而已。

但是這種情況在一九八八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直想攀附在中共“皮”上的知識分子，不但開始獨立思考，而且開始獨立行動了。

一九八八年，青年作家蘇曉康等編寫的電視系列片《河癌》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引起巨大反響。作者的主旨在于從文化的角度對中國歷史進行反思，熱情呼喚改革開放。影片顯示了以黃河為象徵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沒落，歌頌了以海洋為象徵的現代文明的興起，這種觀點和表現方法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強烈的衝擊。特別是影片的解說詞第一次通過公共傳媒喊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依附於政治權力”，“沒能形成獨立的社會群體，並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這種痛苦的聲音，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被壓抑了幾十年之後的覺醒，它應該說是延安整風以來首次向中共貶抑知識分子的政策公開的挑戰。

果然，就在這一年，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顯示了自己的獨立人格。

民間和官方的對話

這一年是三中全會十周年。中宣部早就準備召開一次理論討論會來“紀念”它。但是當年為反對左傾路線和“兩個凡是”而冲锋陷陣的理論戰士幾乎全部被清洗了，僥幸逃過清洗的幾個人也被打入冷宮閒置起來。而“凡是派”卻成了這個會議的主人和上賓。(注一)

針對當局這種排斥異己的做法，原《人民日報》社長，反對“兩個凡是”的主將之一胡績偉，決定用自己的方式紀念三中全會。他自任主編，邀集于浩成、王若水、李洪林為副主編，編輯一套《民主研究叢書》，其中的一本，就是和官方針鋒相對的“三中全會十周年紀念專輯”，取名為《猛醒的時刻》，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這部書收入當年從思想上為三中全會做過掃清道路工作的二十位作者所寫的紀念文章。這些文章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是堅持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的路線，繼續解放思想。有的文章呼喚五四精神，要求繼續完成五四運動未曾完成的民主使命。王若水和阮銘更在文章中提出“新啓蒙”的任務，以便根本改造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

這樣，在同一個首都北京，便有兩個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的群體在唱對臺戲。一個是官方的，一個是民間的。民間群體的知識分子，既不畏懼官方的打擊，也不希罕官方的拉攏，而是自己聚集起來形成力量，向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當代中國四十年來的第一次。雖然他們的力量還很微弱，但事情已經開始了。

王元化創辦《新啓蒙》叢刊

和《民主研究叢書》同時籌辦的，是《新啓蒙》叢刊。這是上海

著名學者王元化主編的一份刊物，本來要辦成一本雜誌，因為當局對報刊的嚴密控制，只好用“叢刊”的形式在夾縫裏出版。這叢刊大體上兩個月一期，每期一個書名，但封面上都冠以“新啓蒙”和順序號，這樣實際上仍是雜誌，但避免了申請“刊號”遭到扼殺的命運，只要每本有一個“書號”，就能出版了。（注二）

編者在《新啓蒙》第一期的“編後”寫道，“叢刊”“不打算兼收並蓄，而要選載表現叢刊個性的文章。”接着編者寫了一句話解釋叢刊的“個性”，這是在中共政權下面任何刊物都不會說過也不可能說出的語言：“理論的生命在於勇敢和真誠，不屈服於權勢，不媚時阿世”。^④

從一九八八年十月到一九八九年二月，《新啓蒙》一共出了三本，書名分別是：《時代與選擇》、《危機與改革》、《論異化概念》。第四本還沒有出，就被“北京風波”淹沒了。

正如“叢刊”的名字一樣，它是繼承五四精神以啓蒙為使命的。這正是歷史已經擺在中國人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任務。王元化、阮銘和王若水在叢刊第一期和第二期上關於這個問題有精辟的論述。

呼喚個人自由

王元化在《為五四精神一辯》中寫道：“我國傳統觀念側重於共性對個性的規範和制約”，“但是，真正活的創造力是存在於組成群體的個體之中。沒有個體的主體性就沒有創造力，正如沒有個人的自由發展就沒有人類的自由發展一樣。”作者雄辯地說：“不能想像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個體都是無價值的，而由他們構成的群體竟會是有價值的。”^⑤這是對中共一貫用“黨性”消滅個性，以“集體”的名義抹殺個人價值的有力駁斥。

阮銘的《時代與選擇》從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生產力發生的根本變化談到人的解放問題。他說，現在已經到了人的智慧和創造直

接轉化為生產力的時代。“新生產力時代需要賦予每個社會公民獲得知識、信息和實現創造的自由權利。這是解放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根本條件。”“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解放使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任何‘偉大的’獨裁者也阻擋不住人類向民主、自由、開放的歷史性進軍。”^⑤

他認為必須有一個“徹底鏟除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新的文化啓蒙運動。”而肩負新啓蒙使命的中國知識分子“首先要實現自身主體意識的覺醒”。^⑥

王若水在《論人的本質和社會關係》中對馬克思一個命題作出與傳統觀念截然不同的分析。

“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注三)幾十年來，馬克思這個命題一直被理解為：人的本質是由一定的社會關係所決定。只能由社會關係來說明人的本質，否則就是宣揚抽象的人性。

王若水指出人的本質“是自覺能動性，是自由”。^⑦這種本質當然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但異化的社會關係使人的本質遭到壓抑，陷于不自由的境地，使人成為非人，需要通過革命的實踐來改造它。這才是馬克思的本意。

王若水指出，中共建國以後“人對人的依賴關係仍然是普遍的。這不是封建社會中那種依賴，但是變成了下級對上級的依賴、個人對組織的依賴，人民對國家的依賴。”不過他認為中國新時期情況已經變了，現在“需要獨立的個人，也創造著獨立的個人。”^⑧所以最後他呼籲理論和文學應當喚醒人的主體意識，使之投身于變革現實的鬥爭。

(注一)為了表示“寬宏大量”和分化“自由化”陣營，中宣部特地“邀請”了幾個“犯過錯誤”的人出席紀念三中全會十周年的理論討論會：于光遠，王若水，蘇紹智。對這種污辱性的“邀請”，于光遠和王若水予以拒絕。蘇紹智出席了，但他不是

去當花瓶，而是到會上作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發言。他理直氣壯地批評當權者對堅持思想解放的理論工作者的迫害，結果使當局弄巧成拙，狼狽不堪。

(注二)《新啟蒙》叢刊原定每月出版一期。但是為它找一個出版社十分艱難。許多出版社都不敢承接這個出版任務。主編王元化本是名人，在文化界有廣泛交往，並曾擔任過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但是在上海居然找不到一個出版單位。後來是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朱正不畏風險，接過這個出版任務。這樣每期編校印發都要兩地跋涉，特別苦了責任編輯龍育群，為此空耗了許多時間，出版周期因之延長，實際上是兩個月一期。

(注三)馬克思這個命題是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來的。原話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⑫

四 民主運動和“六四”慘案

知識分子獨立發出政治聲音

一九八九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又是《人權宣言》二百周年。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界普遍懷着興奮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這一年一開始就連續發生知識分子上書事件。最早是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然後是老作家冰心和哲學家王若水等三十三人發表公開信，支持方勵之的信件，要求釋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接着是老科學家王淦昌和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實行政治改革和取消以言治罪等要求。

從自中共執掌政權以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公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它的意義不比尋常：

首先，它表明知識分子已經不甘心充當共產黨這張“皮”上的“毛”了。一向乖乖聽黨的話的知識分子，如今要求黨來聽聽他們的聲音，而且表達意見的方式既非“交心”，也不是“匯報”，而是“公開信”，這就意味着他們要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了。

第二，被清洗出黨的方勛之，不但沒有被“批倒批臭”，反而越批越香，居然有這樣多的名人支持他的公開信，這不光使中共難堪，而且蘊含着更嚴重的政治意義。

第三，中共一向對文學家、藝術家、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存有戒心，在改造方面也抓的特別緊。但是對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中共一向優禮有加，比較放心，因為他們的專業是自然界和工程技術，離政治比較遠。然而這一波簽名運動卻有許多著名的老科學家都參加進來，這說明中共的政治舉措已經到了這個程度，連受到眷顧的科學家都忍受不住，覺得必須出來講話了。

在這些活動的前後，首都大學校園裏的民主空氣也一天天高漲起來。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組織了一個民主沙龍，許多名流被請去演講或與學生交談，影響很大。

胡耀邦逝世引發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民主運動

正在這個時候，胡耀邦突然在四月十五日逝世了。

中共有史以來最得人心的一位總書記，在平反了千千萬萬冤案，使政治重壓下數以億計的無辜者站起身來之後，自己卻被打倒在地，並且含冤離開了人間。這個消息像晴空霹靂一樣，震碎了每一顆善良的中國人的心。

四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率領他的全家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前獻上了第一個花圈。獻花圈的人為了對此事負責，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彭克宏。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當然，這個行動理所當然地給他帶來

可怕的後果：“六四”後被投入監獄。

第一個花圈引來了無數的花圈和數不清的人群。和一九七六年一樣，天安門廣場成了群衆的海洋。花圈和撓聯旗擁着人民英雄紀念碑，使它變成了海洋中聳立的高山，山上那巨幅胡耀邦畫像，憂傷地凝視着他生前爲之獻出全部心血的悲痛的人民。

中共會局一開始就準備鎮壓

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也是最悲壯的民主運動開始了。

運動的主力是大學生。他們開始時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胡耀邦和反對腐敗。真正促使運動擴大的是中共當局的某些人。他們通過三次無的放矢，或者說謊報軍情，一方面激怒學生，一方面激怒最高當局，既促使運動升級，又促成軍事鎮壓。

據陳希同事後向全國人大的報告，四月二十四日，李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已經把學生運動定性爲“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且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⑩這就是說，在那些天真的學生剛剛開始運用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時，最高當局已經組織好指揮部，把他們的合法行動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來對付了。接着，四月二十六日，發表了《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肯定“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⑪

這種語言，人們都很熟悉。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以來，凡是祭起“反黨反社會主義”法寶的時候，就是要對你實行政治打擊的時候。不料這一次這個法寶沒有把學生嚇回去，反而激怒了他們。社論發表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七日，首都高校學生不約而同地走出校門，一次規模空前的示威游行發生了。他們冲破了警察的防線，從郊外游行到天安門。和《人民日報》社論無中生有的指控相反，游行隊伍沒有去“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們的口號是“擁護共

產黨”，“擁護憲法”，“消除腐敗”，“打倒‘官倒’”。

當局強硬立場促使事態惡化

以後學生運動始終堅持兩點最基本的要求，這兩點要求很簡單，只有八個字：“要求對話，不是動亂”。

如果從四月二十七日以後，不論哪一天，當局只要遵循三中全會的實事求是原則，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承認學生舉行 是愛國民主運動，學生的示威立刻就能平息下來。然後雙方坐下來理性地對話，這事情早就解決了，以後的種種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然而當局卻不這樣做，始終堅持《人民日報》社論的強硬立場，寸步不讓。這就是學生抗議示威曠日持久的真正原因。

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已經是無的放矢了，然而當局忽然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這是第二次無的放矢。學生游行示威絕食靜座雖然給北京市內交通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這僅僅是公民在憲法範圍內和平地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絕對沒有發生任何“動亂”。相反，那些日子北京的治安恰恰非常良好。交通堵塞是任何都市都難以避免的，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因此就實行戒嚴？顯然，如果不是蓄意使局勢惡化，也是神經過于衰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更嚴重的是第三次無的放矢。六月四日凌晨，忽然宣布北京市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事實上直到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都沒有任何異常的表現。至于一些路口群眾阻攔軍隊進入市區，那是為了保護學生免遭屠殺，同時也是愛護人民解放軍的榮譽。人民群眾所有這些舉動，哪裏有一絲一毫“反革命暴亂”的成分？相反，制造暴亂的正是奉命向和平居民開火的武裝部隊。

“六四”屠戮——中共在政治上毀掉了自己

在國際上，一切侵略者攻入別國的理由永遠都是“對方先開了

槍”。不幸的是這種倒打一耙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國內。當局宣稱手無寸鐵的和平群衆舉行了“反革命暴亂”，因此不得不動用坦克為前導的野戰部隊予以平定。

這一次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了。當局收到了眼前的“功效”。他們也許明白，也許不明白，這種“功效”的代價究竟是甚麼。向敵國的和平居民開槍都是戰爭罪犯，如今向自己的和平居民開槍又是甚麼呢？暫且把法律問題放下不說，從政治上看，這場屠殺已經摧毀了統治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是永遠不能挽回的最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身為十二億人口大國的領導人而不明白這種暴行的後果，那就說明他們的水平之低，根本不配當政。如果他們明白這種暴行的後果而一意孤行，那就是已經喪失理智。不論屬於哪種情況，當局的合法性都被他們自己親手斷送了。

當然，當局的失敗並不等於學生運動的勝利。應當說，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學生運動最慘重的失敗。五四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運動，一二一運動，分別遭到過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但是都沒有這一次損失如此慘重。

痛定思痛，學生運動的當事人已經有過一些反思，但是存在分歧。從局外來看，也確有冷靜檢討之必要。

首先，總的說來，這次民運之失敗是雙方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結果。中共掌權四十年，在中國大陸已經建立起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黨的領導”使中央（實際上是一個人，最多是幾個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的意志能立即無條件地貫徹到所有的角落，指揮一切，調度一切。面對這樣一個超級對手，示威的學生簡直就像一個嬰兒和拳王泰森在臺上對壘一樣。“六四”坦克碾平了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正是這種力量對比的實際演示。從這一點上說，民主運動遭到失敗，是必然的。

當然，事情發展到“六四”，也有一個過程。當局也並不是一開始就要動武的。當他們受到全世界譴責時，曾有“不得已而為之”

的表示。這也是事實，不過卻是在“決不退讓一步”（堅持《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的錯誤立場）的前提之下的“不得已”。前提就錯了，“不得已”當然站不住腳。不過政治鬥爭最後都是以力量對比來決勝負，而不是以非曲直來分高下的。

學生運動既無計劃和無組織

反過來再看學生這邊，就不能不為他們扼腕嘆息了。當局一口咬定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極少數人”掀起的“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其實學生的失敗恰恰在於他們沒有計劃，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特別是沒有領導。這場學生運動完全是自發的。只是胡耀邦逝世這個偶然因素，觸發了中國社會積累了多年的矛盾，才演變成五四以來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一九七九年以來跛足改革（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所積累的矛盾，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路線統治所遺留的矛盾，以及一九一九年以來從未實現的民主與科學的訴求，都匯集到一起爆發出來了。

這個運動來得太突然了。不但官方毫無準備，學生也毫無準備。被指控為幕後操縱者的黨內外民主派知識分子，所謂“動亂精英”，更是毫無準備。人們都是倉促上陣，使這次運動一開始就處於無政府狀態。當然，學生們也有某種組織，比如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就有“指揮部”，也有談判代表，但是卻不具備應有的權威。比如五月十四日，談判代表答應撤離天安門廣場，但是廣場上卻有人不答應，結果就不撤。這種“有組織”，和無政府狀態有多大區別呢？以“烏合之衆”（不是在貶義上使用這個詞）對抗歷史上最集中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那勝負的格局早就注定了。

學生錯過了兩次良機

正因為學生運動是無組織的，所以有幾次可以爭取較好結局的良機都錯過了。

一次是五月十四日，十二位學者作家到廣場勸說學生撤離。一次是五月十七日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學生發表書面談話。

十二學者作家，都是在學生中頗有影響的人，他們以學生的朋友身份出面呼吁，這本是結束絕食的絕好時機；不是在政府的壓力下屈服，而是接受了朋友的意見，並且保持了民主運動的勢頭，為以後開展和平和理性的對話，促進政治改革贏得了很大的空間。可惜的是這個呼吁最後遭到學生拒絕。（注一）

趙紫陽的書面談話代表官方立場。這個談話對學生運動有相當高的評價。他勸學生停止絕食，當局決不“秋後算帳”，並答應繼續對話。^⑤應該說，這是當時學生所能爭到的最佳結局了，可惜同樣被學生拒絕。顯然，學生運動的領袖們不懂得，政治需要妥協。現實的政治，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純粹，或百分之百地實現某一方的意願。某種妥協，某種程度的適可而止，以便鞏固已經取得的陣地，或避免喪失更多的陣地，是一種高級的政治藝術。這種藝術，對於弱勢的一方尤其重要。當學生領袖封從德在廣場上用擴音器領導學生高呼“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以拒絕撤離的時候，那氣氛的確很壯烈。但是當坦克車開進廣場的時候，能用這個口號鼓舞學生們用肉身去阻擋鋼鐵的履帶嗎？事實是“六四”凌晨學生們不得不在槍口下撤離廣場。這仍然是妥協，保全了廣場學生的生命。但它的代價卻是學運初期爭得的東西全部喪失，外加幾千人的死傷。

當然，下令開槍的罪責是沒有任何開脫餘地的。即使當局有權強制執行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也完全可以避免流血；既然有幾十萬大軍，那麼，兩個大兵抬一個學生，押上汽車送回學校，那不就完事了嗎？然而下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這就是蓄意殺人，將來此事是絕對逃不過正義審判的。不過也應該看看另一方面，因為雙方都有回旋餘地。當局有槍，“開槍”和“不開槍”之間，是他

們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學生有腿，“走”和“不走”之間，則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的餘地。只要雙方當中有一方採取理智的態度，慘案就有可能避免。結果呢，當局做了錯誤的選擇，學生也做了錯誤的選擇。雙方的錯誤性質不同（官方有心，學生無意），但學生畢竟為它付出慘重的代價。五月十四日或五月十七日學生領袖們如果從政治上考慮而不是從感情上考慮，就有可能體面地撤離，而不是在槍口下撤離，就有可能保住已經爭得的民主成果而不是全部失掉。這樣，構成當代中國歷史最黑暗一頁的“六四”慘案就不會發生。

這次慘案的全部內情當然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真象不可能長久隱瞞下去。不過，如果不去猜測具體的人和他們的東窗密謀，而是從光天化日之下的政治形勢來分析，事情是很清楚的。連續三次謠報軍情，空空捏造所謂“有計劃的陰謀”，所謂“發生動亂”和“發生反革命暴亂”，正是一步一步為戒嚴和軍事鎮壓創造借口。顯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戰爭解決問題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對手一網打盡。應該說，這才是真正的“有計劃的陰謀”。《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寫這幾個字，正是在演“賊喊捉賊”的把戲。如果廣場上的絕食早日適可而止，拔腿走人，陰謀家們將極度失望，因為學生們沒有落入圈套。而學運領袖的失策，正好使對方的陰謀得以完全實現。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注一)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代表李鐵映（政治局委員）問明復（書記處書記）與學生談判陷入僵局。他們要求光明日報記者戴晴邀請一些學者作家出面，勸學生撤離廣場。其中有于浩成、嚴京其、李洪林、劉再復、李澤厚、包遵信、蘇曉康、溫元凱和李陀等共十二人。他們和學生代表對話，代表們接受了他們的“緊急呼吁”，但要求這十二位學者作家利用他們的影響直接到廣場去說服學生。

當晚這十二人到廣場上宣讀“緊急呼喚”，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但正要達成共識的時候，一位學生領袖忽然奪過擴音器，慷慨激昂地拒絕撤離，並且領導學生們宣讀“絕食誓詞”。最後連呼三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就這樣，使撤離廣場的談判完全淹沒在震耳欲聾的激烈口號當中而陷于失敗。這次絕食的良性結局機會，就這樣錯過了。據瞭解辨認，中斷這次對話的學生領袖，是柴玲和封從德。

五月十七日夜間，李洪林、于浩成和嚴京其三人又一次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絕食指揮部，勸他們“見好就收”，在十七日全市百萬人大游行勝利結束之後，于次日結束絕食，撤回學校，轉入正常的學習，並和政府繼續對話，以促進民主。當時指揮部只有兩名成員，不能作出決定，但答應找其他成員一起討論三人建議。事後證明，這次建議也被拒絕。五月十七日的機會錯過之後，當局在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學生們連體面地撤離都不願意，當然更不會在軍事壓力之下撤離了。

五 對“自由化分子”的總清算

“自由化分子”全軍覆沒

“六四”的槍聲打響了第四次“反自由化”運動的信號。這場“反自由化”和以前不同。鄧小平總是嫌以前的“反自由化”太軟，這一次就非常硬，是用坦克開路的。

直到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一日解除戒嚴為止，半年多的時間裏，首都實際上處于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占領之下。大屠殺後的占領初期，士兵在街上巡邏都是幾十人一隊，排成方陣行進。所有的士兵都是平持自動步槍，槍口一律向外，隨時準備向前後左右四面射擊。為了能監視後面，並能向後方射擊，方陣最後一排士兵是面向後邊，退着走，這種景象成為當時北京市的一種奇觀。素有“人民

子弟兵”之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四九年是被人民群眾載歌載舞簞食夾道迎進北京的。過了四十年，竟發展到必須動用坦克才能攻入北京，發展到用機關槍對自己的父老兄弟瘋狂掃射。凡是珍惜這支軍隊榮譽的人，都會對這種事情感到痛心。過去常說的“軍民魚水情”，是說這支軍隊在群眾中間就像魚在水中一樣自在。現在，當他們排成方陣惶恐地走在街上把槍口指向四周的群眾時，這不是和魚掉進開水鍋裏一樣不自在嗎？

構成人民共和國最黑暗一頁的，不光是首都遭到血洗和軍車占領，還有接踵而來的大搜捕和大清查。

學生領袖王丹等一大批人遭到通緝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歷年不斷被指控為“自由化”的知識分子也成了搜捕的對象。以陳希同六月三十日向人大常委所作的報告中點到名字的“自由化分子”來說，方勵之李淑娟夫婦，躲進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沒有出逃，也不想出逃的曹思源、于浩成、李洪林、戴晴和溫元凱，都在六七月間先後被捕。包遵信是在逃亡中間被捕的。其餘的嚴家其、戈揚、蘇紹智、金觀濤、劉再復、李澤厚、蘇曉康和陳軍等人，先後都到了國外。列入陳希同名單中唯一沒有被捕的，只有張顯揚一人。當然，沒有列入陳希同名單的被捕知識分子還有許多，像王軍濤、陳子明和劉曉波就是其中著名的人物。王軍濤在鬥爭策略上並不完全贊同學生的行動，但他在法庭上勇敢地為學生運動作了辯護，挺身而出承擔了責任，並且因此受到法庭的重判，被處以長達十三年的徒刑。

一網打盡——消除政治隱患

除了大逮捕以外，中共中央還在六月十四日決定在“所有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深入開展清查工作”。^⑤這是繼五十年代“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以及六十年代的“清理階級隊伍”之後的第四次“肅反運動”，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停止“以階級鬥爭爲

綱”之後，專門以肅清“階級敵人”為任務的一場新的政治運動。

除了“清查運動”之外，還有一個“清理工作”，這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一些人在“動亂”中“立場不穩”等“錯誤”的思想批判運動（當然少不了組織處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又決定在“部分單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堅決消除黨內敵對分子、反黨分子、消除政治隱患”。^⑦

中流砥柱——邵燕祥

除了逮捕法辦之外，凡是參加清理、清查和黨員重新登記的人，必須聲明擁護“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即擁護“六四”屠殺，才能過關。對當局屠殺手無寸鐵的居民的暴行，你想保持沉默都不行，必須舉手贊成。這是對人類良知一次空前的摧殘。它所加給人們思想上的傷害，遠遠超過歷次思想運動。據現在所知道的情況，只有一個人，在黨員重新登記的時候拒絕擁護“六四”屠殺，那就是詩人邵燕祥。他拿出毛澤東建國後關於群衆“鬧事”問題的批示：“絕對不許向群衆開槍”，作為自己的依據。這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共黨組織目瞪口呆，對他無可奈何。

誰是黨的忠誠衛士

“六四”後的黨內整肅是從趙紫陽開始的。六月二十三日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撤消他的總書記和黨內一切職務。曾經參與倒胡的趙紫陽，此時醒悟為時已晚。不過他在整個學潮中的理性和溫和的態度，特別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最後發言，使他給自己的政治生涯畫上了一個可以面對歷史而無愧的句號。他沒有像胡耀邦在失敗時的失態。在成為對手俎上之肉的時候，他拒絕作違心的檢討，而是保持了一個政治家的尊嚴，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並在被迫離開中央的時候，放棄了自己原來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觀點，指出政治和經濟改革必須同步。當然，在當時那個全會上講

這番話，只能是對牛彈琴。

隨着趙紫陽的下臺，“鄧胡趙”體制就徹底破碎了。鄧小平挑選了江澤民組成新的中共領導核心。接下去是從中央到地方對領導幹部的整肅和清洗。凡是被認為在“制止動亂”中不夠堅決的幹部，都被撤換下來。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和閻明復，都被撤掉職務。在第三次“反自由化”中被撤消中宣部長職務的朱厚澤，原被安排在全國總工會，這一次又因為全總支援過學生運動而再度被撤了下來。文化部長王蒙則因為拒絕去慰問戒嚴部隊而受到壓力，他幹脆挂冠而去，辭職不幹了。

“六四”以前，許多學者專家擔心當局會對學生實行暴力鎮壓，紛紛發表聲明要求政府愛護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錦，副院長丁偉志和李慎之等在戒嚴後發表聲明，一方面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一方面呼呼和平解決，意在規勸當局不可使用武力。這本是學者們防止發生悲劇的善良願望，完全是為了維護穩定，也是對中共的真誠愛護，絲毫沒有“煽動動亂”之嫌。然而他們竟因此而遭到嚴厲指控和處分。

奇異的金牌銀牌和銅牌

不過當時社會上的價值觀念發生了一種奇異的變化。官方和民間的標準截然相反。因“六四”事件而受到處分，已經被民間看作榮譽；開除黨籍是“金牌”，留黨察看是銀牌，嚴重警告是銅牌。這就表明當局在道義上已經徹底失敗了。

第四次“反自由化”鬥爭的主要特征是軍事手段，司法手段，行政手段和組織手段並用。首先是槍殺，接着是搜捕、監禁、審判，然後是撤職、開除和各種檔次的行政處分以及黨內處分。這是一次最徹底的清洗。一九七九年以來被指控為“和黨分道揚鑣”的“自由化分子”，除了逃亡國外的，差不多已被一網打盡了。

在輿論陣地方面，深受讀者歡迎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主編

欽本立)和北京的《新觀察》(主編戈揚)都被查封了。王元化主編的《新啓蒙》不算期刊，也就不勞當局查封，因為它的生存條件已被封殺，自然不能繼續出版了。《人民日報》等等新聞出版單位，當然不可能一一查封，況且中共新的領導核心也需要自己的“喉舌”。所以通過“清理清查”運動，這些單位中所有“犯錯誤”的，以及雖無“錯誤”但新領導信不過的人，通通被撤下來，換上了可靠的人去掌握。

“大批判”的末日

至于這一次“反自由化”運動中的“大批判”，那就太差勁了。

首先是人才的貧困。當局簡直拿不出一個多少有點知名度的人在“大批判”的舞臺上亮亮像，藉以壯大聲勢。所有在新聞媒體上出面聲討“自由化”的人，全都是些不入流的無名之輩。以致新聞報道只好用“大家”作為主語來編造幾句“大批判”的語言。報刊上的“大批判”文章，也大體都是筆名，這說明寫文章的人不敢露面，或不願出這種風頭。

其次是思想的貧困。這些“大批判”文章的內容，屬於思想理論的很少，絕大多數都是編造事實，揭露“自由化分子”怎樣“策劃”和“煽動動亂”。而他們所編造的事實，有的是平空捏造，有的是顛倒黑白。比如，五月十四日十二學者作家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撤離廣場。次日已有新聞如實報道，人人皆知。但是“六四”後到了陳希同的報告裏，竟成了這十二個人“給動亂火上澆油”。^⑩再如，有一篇《上海動亂真象》的“大批判”文章說：陳軍和李洪林等人“密謀把所謂要求釋放政治犯的簽名運動引向上海。”^⑪其實這兩個人根本就不認識，也從未見過面。還有一篇《他們宣揚了甚麼》的文章，批判了“于浩成、李洪林的‘民主演說’”。^⑫事實是這兩個人雖然會寫文章，卻不善于言詞，甚麼時候發表過“民主演說”呢？可見當局處心積慮要把學生運動誣蔑成少數“自由化分

子”“有計劃的陰謀”，已經到了動用造謠手段的地步了。

這一場“大批判”運動的致命弱點，是沒有思想，沒有理論。文章雖多，但理論性的極少，偶而觸及理論問題，也只是斷章取義摘引一半句話，加上幾個政治判決詞匯，就算完了。對比起來，當年四人幫的“大批判”雖然也是強調專理，畢竟還有不少假大空的廢話可供賣弄。如今“六四”後這新一代，卻連假大空的廢話都搬弄不了幾句，這種可憐相，比起他們“大批判”的前輩，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不過這一波“反自由化”的鬥爭，在理論上也有一個新貢獻，那就是把改革分成兩種：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這也難為中共新領導煞費苦心。因為被清洗的“自由化分子”都是人所共知的改革派，為了給清洗找理由，便只好說他們所主張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了。不過這種提法在鄧小平的理論裏卻不會有過。相反，鄧小平一向主張“貓論”，即“不管黑貓白貓，捉得住老鼠就是好貓”。他反對去爭論甚麼“姓社”“姓資”。所以對“資本主義改革”的批判不久也就悄悄收起來了。

另外在這場“大批判”中緊鑼密鼓批得最多的還有“和平演變論”和“全盤西化論”。好像中國的事件都是外國人在策劃和導演，而中國的“自由化分子”都是外國在中國的代理人。不過這一套公式實在太陳舊，不要說聽眾早已生厭，連“大批判”者自己也都覺得乏味了。

六 尾聲——思想運動的終結

第四次思想運動的終結

第四次“反自由化鬥爭”意味着當代中國延續四十年的思想運動的終結。

這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內部或社會上就再也没有思想鬥爭了。

鬥爭肯定有，甚至可以說時時刻刻都在進行。

所謂“終結”，是指以延安整風為模式的，由中共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為實現某種政治目的而開展的群衆性思想鬥爭運動的終結。這種運動以“大批判”開始，以組織處理告終，接着就進入一個相對平靜的間歇期。間歇期實際上是給下一次思想運動作準備，然後就進入下一個運動周期。如此循環往復，但都不是簡單的重複，每一個周期都是在更高水平上的重複，不但內容花樣翻新，而且那鬥爭的深度和廣度也都超過前一個周期。

這四十年的鬥爭又可劃分為兩個時期，即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是毛澤東時期。這個時期的思想鬥爭運動在延安模式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文化大革命是它的極致。即使毛澤東在世，這種鬥爭形式也已走到終點，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樣了。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初批判左傾思潮和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本來使中國思想界獲得一縷生機，有望結束毛澤東時代那種沒完沒了的思想運動。但是這次思想解放很快就在中共傳統力量的重壓之下，中途夭折，接着就開始了新時期即鄧小平時期的思想鬥爭運動。

日暮途窮——思想日益空虛，鬥爭日趨加強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在鄧小平直接發動和領導下，先後有四次“反自由化”鬥爭的高潮。這四次思想運動也是一次比一次規模大，一次比一次鬥的更凶。不過鄧小平時期和毛澤東時期比起來，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運動的思想成色日益減少，而組織手段日益增加。到了第四次高潮，組織手段已經不夠用，只好採取大規模逮捕和判刑的手段來對付思想異己了。而用司法手段來對付的這些思想異己，大部分都是被稱為“同志”的共產黨員。

這種現象說明了甚麼呢？

思想鬥爭運動的思想成色減少，表明當局思想上的空虛和理論上的貧乏。

組織手段特別是司法手段的廣泛采用，表明領導的權威和思想上的感召力已日益喪失，不得不靠組織上行政上和司法上的強制來維持統治地位。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並不表示“堅持黨的領導”的中共的强大，而是說明它的虛弱。至于動用軍隊來對付自己治下的人民，那就更加清楚地昭告全世界，這個政權已經沒有群眾擁護，只能靠刺刀來維持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還能發動第五次“反自由化”高潮嗎？

不可能了。

思想政治工作的沒落

這要從“思想工作”說起。

中共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自己獨有的優勢。“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是轉變人的思想，“轉變”就是“改造”。從戰略上或長期目標來說，它的任務是改造世界觀，即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從戰術上的目標來說，是解決當前的思想問題。比如：軍隊在作戰之前，要作思想動員，使大家明瞭此次戰鬥的意義；某個黨員有甚麼錯誤或思想問題，支部書記找他個別談話加以勸導，或開會進行批評幫助，都屬於“思想政治工作”。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中共在物資極度困乏、環境極其艱險的條件下，能使自己的組織和軍隊團結一致，克敵致勝，確實有賴于這種思想政治工作。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把思想政治工作用于改換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領導而創造的一種大規模的群衆性的思想政治工作。

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學習運動和思想鬥爭運動，就是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的“延安模式”在和平時期的應用。

思想工作的唯一方法是說服：使對方自願接受，口服心服。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思想工作的目的：使人自覺自願用“正確思想”支配自己的行動，而不需要任何強制或懲罰。

從這個角度來看，只有建國初期的學習運動，部分地達到了這個目的。那時確實有不少人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對他們初步了解的新思想，表示了由衷的佩服，並且也真的在努力改變自己，力求跟上新形勢。

但是事情也就僅僅到此為止。

從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訓傳》開始，強制或高壓就成為思想運動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特征了。

兩種鬥爭運動的顛反效應

“強制”總是從“自願”終結的地方開始的。當強制的手段出現的時候，思想工作就宣告失敗了。高壓之下的“思想工作”就像重刑之下的審訊一樣，何求不得？但是已經掌權的共產黨和身處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毛澤東，在權力的腐蝕下卻全然不順這些，而是用不斷增加壓力的辦法以取得日益擴大的戰果。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字獄不斷擴大，冤案不斷增多的原因。

然而人民的忍耐總是有限度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就是人民群眾不滿的總爆發。這次爆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批鄧”激起了人民的憤怒。

鄧小平時代的思想運動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壓力也是不斷增強，然而在運動的規模上卻遠遠比不上毛澤東時代。這是因為鄧的領袖魅力和動員力量比不上毛澤東，另外他對思想運動的偏愛也不像毛澤東那樣狂熱。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群眾對思想

運動早已厭倦，儘管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興致很高，卻也無可如何。

而且，群衆還不光是厭倦。在鄧小平時代出現了一種完全逆反的“批判效應”：被批判者總是得到群衆廣泛的同情和愛戴。他的聲望必定隨着批判的深入而升高。而那些批判者卻遭到普遍的唾棄，成為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後來有人用八個字概括了這種效應，叫作“批誰誰香”，“誰批誰臭”。這說明思想鬥爭的威懾作用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走向反面。當局對“自由化分子”的批判，已經成為提高這些人聲譽的法碼，這實在是發動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社會條件的變化使思想運動失去物質手段

使思想運動走到盡頭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原因，這就是無所不包的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瓦解。社會的經濟基礎已經走上多元化的軌道。這種經濟制度使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經濟基礎，人們可以自謀生計，不必再仰賴集體或國家的恩賜了，這是使個人得以擺脫思想強制的物質條件。

因此，在鄧小平時代，誰想再發動一次毛澤東式的思想運動，已經不可能了。中共的左派指摘胡耀邦和趙紫陽阻撓一九八三的“清除精神污染”和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反自由化”是江澤民就任總書記後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還不是照樣冷冷清清？

正因為整個社會歷史條件都變了，所以鄧小平時代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沒有多少“思想工作”的成分，而只剩下不斷升級的強制手段。這種情況表明當局已經黔驥技窮，不但“說服”業已無人愛聽，而且強制的效果也日益減退，不得不一再提高“力度”。當各種招式都已用盡，而人們仍然既不擁護，也不害怕的時候，便只有乞靈于軍隊了。

既然第四次“反自由化運動”已經把十八般武藝全都用盡，下
• 408 •

一步還能祭出甚麼法寶呢？

沒有了。再也不可能拿出新的招數了。因此，構成共和國四十年思想史的那種大規模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走到盡頭，不會再度出現了。

不過，這並不是說中國思想界從此風平浪靜了，那是不可能的。

“自由化分子”在第四次“反自由化”運動中全軍覆沒之後，“反自由化”運動自然就該落幕，因為已經沒有鬥爭對象了。

思想鬥爭的餘波——左派批判鄧小平

但是批判“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改革”的鑼鼓卻是餘興未盡，繼續在臺上敲打。這是批判誰呢？

原來是批判鄧小平。鄧小平按照自己的“貓論”，在經濟改革上根本不管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甚麼都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他支持市場經濟。他的理論是：“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⑩

“貓論”本來就是左派的批判對象，然而它正是鄧小平領導改革的理論基礎。在第四次“反自由化”已經沒有鬥爭對象之後，左派對所謂“資本主義改革”繼續進攻，並且一定要把“姓社姓資”問個水落石出，矛頭所向就很清楚了。

而且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中國經濟在“反自由化”和“治理整頓”之下，連續三年疲軟不堪。這種形勢使鄧小平不得不在退休之後再度出來，發表一個扭轉局勢的“南巡講話”。

“南巡講話”是從“治理整頓”下挽救改革使它重新起步的宣言。鄧小平嚴厲批評了想走回頭路的中共領導人：“誰不改革誰下臺。”他還對左派糾纏“姓社姓資”感到不快，不過他不是理直氣壯地去批駁，而是用消極防禦的辦法，呼吁“不要爭論”。

“南巡講話”最有意義的還是鄧小平對左和右的態度。他照例

要反右，不過這一次他很清醒地指出左傾的危險是主要的：“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②

這樣，一九九二年以後，左派的喧囂暫時平息下去。可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又重新出現了，這就是所謂“地下萬言書”。

到一九九七年為止，已經出現了四個“地下萬言書”，都是攻擊改革，攻擊鄧小平，批判中共現任領導的路線的。

這些萬言書引起海內外關心中國事態者的關注。應當怎樣看待左派挑起的這種鬥爭呢？

左派的觀點無非是重複早已陳腐不堪的傳統教條。當然他們打的旗號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這正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授人以柄的結果。

左派通行無阻說明了甚麼？

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當局對左派和他們“萬言書”的態度。

按照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和對思想的箝制程度，不要說直接批評現任領導，就是被懷疑為影射都要受到追究。可是這些“萬言書”卻通行無阻，從未聽說受到甚麼追究。而且，也不只是這些“地下萬言書”，北京出版的幾份以“馬克思主義”自居的刊物，時常發表和“萬言書”一個調子的文章，照樣也沒有人去追究。

這種現象只能說明左派的立場並沒有超過當局所能容許的限度。也有一種分析認為，左派的叫囂正是當局所需要的。有了這種更左的叫囂，才能襯托出當局還不太左。“兩害相權取其輕”，苦于左傾路線統治的中國人，無不談虎色變，既然民主政治不可想望，那麼，與其左派上臺，還不如現在的班子不要下臺。這是一箭雙雕：既安撫了左派，又美化了當局的形象，使它可以獲得溫和派甚至“改革派”的稱號。當然，左派之所以能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為他們和當局在反對“自由化”的立場上是一致的，只是批評當局左

第十三章 四反“自由化”

得不拘而已。

一向以“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自誇的中共當局，應該知道鄧的反左指示。但是他們對於左派如此明目張膽反對改革和攻擊鄧小平的言論居然能夠容許，可見他們原是一個營壘中人。他們之間的“鬥爭”，不過是茶杯裏的波浪而已。以後這種爭吵當然還斷不了，甚至也許很熱鬧，但也至多是臉盆裏的風浪，這和歷次“反自由化”的思想鬥爭運動相比，根本不是一回事。

以延安整風為模式的，在中國大陸上空翻騰了四十年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成為過去。以後當然還可能有批判“自由化”的節目上演，但是不會有甚麼觀眾了。歷史在向前走。條件變了，那種運動不會再出現了。

崇 崇 崇

第十四章 引文出處

- ①《王忍之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1987年3月7日)
- 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384—385頁
- ③《鄧小平帝國》第211—213頁
- ④《國史通鑑》第4卷，第293頁
- ⑤《人民日報》1988年8月6日
- ⑥《時代與選擇》(新啓蒙叢刊之一)第92頁
- ⑦同上，第12頁
- ⑧同上，第37—38頁
- ⑨同上，第60—61頁
-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頁
- ⑪《危機與改革》(新啓蒙叢刊之二)第8頁
- ⑫同上，第18—19頁
- ⑬《人民日報》1989年7月7日
- ⑭同上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⑮《半月談》1989年第11期;《北京近期局勢紀事》

⑯《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第432頁

⑰同上,第436頁

⑱《人民日報》1989年7月7日

⑲同上,1989年9月24日

⑳《求是》1990年第7期

㉑《交鋒》第183頁

㉒同上,第194頁

第十三章附圖



“公道自在人心”，這是中國老話。“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是中共的新話。胡耀邦被迫下台，百姓心中極為不平。胡耀邦猝然逝世，使人民心中積怨突然爆發，天安門廣場立即變成悼念他的人群海洋。



胡耀邦逝世，引發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學潮，持續五十天。這是五月四日北京高等學校學生上街遊行



中央美術學院學生用三天三夜時間集體雕塑的民主女神像，五月二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樹起。她已成為這場民主運動的象徵。這座塑像正好和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畫像對峙。不知毛作何感想。“六四”凌晨，解放軍攻入廣場，首先推倒了她。後來她被在香港和美國等地複製。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人民解放軍和平進入北平，
民眾夾道歡迎，軍民是魚水
關係。上圖為軍隊入城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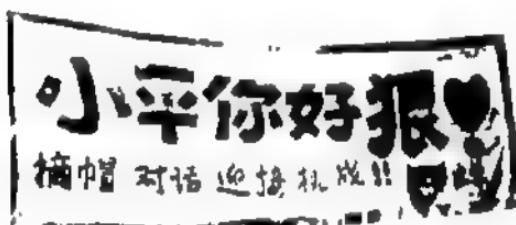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人民解放軍強行攻入北京，
對和平居民展開血腥屠殺，
民眾死傷枕藉。軍民之間變成
刀俎和魚肉的關係。右圖
為群眾抬着滿身鮮血的受傷
者奔跑呼救。





上圖為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時，大學生打出的標語。

下圖為一九八九年五月學潮時，大學生打出的另一條標語





第四次“反自由化”，除了坦克之外，就拿不出別的武器了。這是“六四”屠殺之後，當局能夠拿得出手的“批判材料”。除了歪曲事實和王婆罵街式的幾句批判以外，再也唱不出甚麼新調子了。

這種水平，連四人幫都不如。四人幫雖然強詞奪理，畢竟還有詞可說，能說出一大堆歪理。如今的“大批判”，連歪理都沒有了。這也正好說明，橫行中國大陸四十年的思想鬥爭運動，已經走到末日了。

第十四章 結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四十年的思想史，都是在鬥爭中度過的。除了毛澤東退出歷史舞臺之後有過一次短暫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外，其餘的鬥爭可以說都是思想禁錮運動。這些運動的鬥爭對象是知識分子，受害的是整個民族。

一 思想運動的根源

當代中國思想運動的發動者是毛澤東。不過這不是他個人頭腦的發明，而是有它的思想來源和社會基礎，特別是有它的政治需要。只要這種思想來源和社會基礎存在着，只要有這種政治需要，即使不是毛澤東來領導，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

鄧小平剛剛復出的時候，未必意識到將會由他再來發動這種不得人心的思想運動。因為他雖然是毛澤東時代的整人者，卻也是受害者。本着人類良知，他會從心裏厭惡這種整人的運動。但是只要這個黨領導着中國，只要它繼續堅持傳統的理論基礎，只要國家的政治格局還沒有轉向真正的民主，這種思想鬥爭運動就是不可避免的。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是思想運動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過：“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這話千真萬確。

恩格斯曾用磁鐵作例子說明對立的永恒和無所不在：每一塊磁鐵都有南北極。把一塊磁鐵分成兩塊，兩塊又各有自己的南北極。列寧把辯證法歸結為“對立統一”，並且確定：對立統一是相對

的，對立鬥爭是絕對的。斯大林概括出一個公式：發展就是對立面的鬥爭。毛澤東完全繼承和發展了這種鬥爭哲學，不但運用于社會，而且運用到黨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都主張並且實行黨內鬥爭。但是把黨內鬥爭提到哲學高度的，是毛澤東。他認為“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這就是說，共產黨不但是為了鬥爭而存在，而且要為了存在而鬥爭。因此，在黨外鬥，在黨內鬥，和敵人鬥，和朋友鬥，最後還要和自己人鬥，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如果一旦不鬥，共產黨就要滅亡了。

事實正是這樣。自從馬克思主義問世，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地和各種思潮、人物和派別鬥爭的歷史。這種鬥爭曾使列寧感到苦惱，他嘆息道：“這就是我的命運！”據他夫人克魯普斯卡亞記載，每次鬥爭之後，列寧都精疲力盡，必須休息一段時間才能恢復。但毛澤東不是這樣，鬥爭對他來說是一種享受。他年輕時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裏的“奮鬥”當是“鬥爭”的同義語。當然，被鬥者不會感到“其樂無窮”。這種樂趣只能屬於鬥人者。建國以後，毛澤東一直在鬥別人，當然是“其樂無窮”。而且鬥的那樣頻繁，那樣厲害，大概也和這種樂趣有關係。

除了指導思想上的根源以外，中國這種大規模的思想運動還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深厚的社會基礎。

中國特色——東方專制主義傳統

世界各國共產黨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在他們執政的國家裏也都有思想鬥爭，但卻遠遠不及中國。這和中國的特殊國情是分不開的。

和希臘文明所代表的西方傳統不同，中國有悠久的東方專制

主義傳統。所謂《春秋》“大一統”，已經支配中國兩千多年。這裡的“大”，是動詞，即尊重之意。“大一統”不光指政治統一，而且包括思想統一。從禮樂教化到焚書坑儒，都是統一思想的手段。西方中世紀也有迫害思想異己的暴政。藍禁伽利略，火燒布魯諾，都是著名的例子。可是和中國古代的文字獄比起來，那就差多了。從當代中國新文字獄的規模之大，鬥爭之殘酷，以及陷入于罪和致人于死的刀筆功夫，都可以明顯地看到古代文字獄的惡毒傳統。這真是“中國特色”。

另一個中國國情是它的社會階級結構，以及因此產生的矛盾衝突。

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矛盾

中國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毛澤東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式農民戰爭。中共的領導骨幹主要是農民和城市無產者出身的人們所組成。其中當然有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在長期鬥爭中也都“工農化”了，至少也是農民利益的政治代表，否則他們就不會被推到領導崗位。這樣，共產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實質上是工農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過中共黨員和軍隊中產業工人很少。所謂“工農”其實就是農民。

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中共轉到農村進行土地革命的時候，工農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還不突出。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大量知識分子奔向共產黨，這個問題就突出了。毛澤東確實講過團結知識分子的必要，但他更強調的是改造。他用辛辣的口氣嘲笑知識分子，並且宣稱沾有牛糞的農民比知識分子乾淨，也比他們高尚。他要求知識分子放下架子，和工農結合，甘當小學生。當時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確實這樣做了。只有王實味等幾個人多少表現了某種不諧調，使遭到迎頭痛擊，此後便再也没有不聽話的了。胡風在四十年代倒是保持了自己的觀點，但那時他在重慶、延安管

不着他。這筆帳後來在一九五五年清算。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取得全國政權，革命戰爭結束了，和平建設開始了。但是黨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仍然和戰爭時期一樣，這樣矛盾就尖銳了。中國農民是淳樸而勤勞的，被“逼上梁山”以後作戰是很勇敢的。革命隊伍中還有一些游民或城市無產者，他們無牽無挂，打起仗來也非常勇敢。因此農民和這些無產者便是革命隊伍的主力，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們也有各種缺點，毛澤東曾注意到這些缺點，主張加強教育。但是在頻繁而殘酷的戰爭中，事實上很難做到。

還應該看到，由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和差別，工農和知識分子之間確實存在着歷史造成的矛盾。知識分子容易輕視工農。工農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比較複雜，尊敬、羨慕、妒忌、憎恨，各種情緒都可能有。作為一種階級關係，對立情緒是很重的。這種矛盾，當工農幹部掌權的時候就充分暴露出來了。建國以後歷次思想運動實際上都是批鬥知識分子的運動。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副校長痛心地說：“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一運動起來，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

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識分子叫作“臭老九”，就是這種對立的極端表現。所謂“臭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八種階級敵人之後：“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臭。”（叛，叛徒。特，特務。走，走資派。）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走資派”以外，遭到最殘酷的鬥爭的正是知識分子。其所以如此，除了鬥爭哲學的作用以外，以工農為主體的中共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應該說是它的階級根源。

其實中共的領導核心差不多都是知識分子，而且一部分人還受過西方教育，應該遠遠超出束縛農民的小生產者的狹隘眼界。但是為什麼在他們領導下的這個黨，竟如此敵視知識分子呢？

毛澤東的復仇情結

有人試圖從毛澤東的特殊經歷和某種復仇情結去解釋這種現象。

毛澤東本人只有高等師範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中學程度，早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充當一名小職員。在這所全國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裏，應該說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事實上毛澤東是很用功的，雖然學歷不高，但他的國學根基和文史修養都是出類拔萃的。然而那些往來于圖書館的一流學者、教授、專家，或出入李大釗辦公室的座上客，大概誰也不會留意他的才華，當然更不會對這位未來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預先表現出更多的尊敬，而且很可能無意間觸痛了他的自尊心。不單教授們對他缺少禮遇，恐怕那些自恃才氣的大學生們也未必把這個小職員放在眼裏。這種境遇大概在年輕的毛澤東心裏種下了仇恨的種子，總有一天會生根發芽，總有一天要一吐這口惡氣。正是這種情結，使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懷有某種復仇心理。不然的話，就很難解釋為甚麼一個國家的領袖竟能這樣肆意壓制和摧殘知識分子，而不珍惜和尊重國家的棟梁之材。同時也很難解釋為甚麼身為知識分子的他，會對自己的同類極盡欺凌、嘲笑、揶揄、污辱之能事？

這種心理分析，未必符合實際，不過也可能有某些道理。大概正因為有這種情結，中共黨內工農對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敵視，才能在毛澤東身上得到高度集中的表現，並且通過他的決策，把這種敵視變成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和摧殘，使知識分子一直生活在壓抑和恐懼當中。

反右派運動時，柯慶施對徐鑄成說的幾句話，把中共高層中敵視和鄙夷知識分子的心態表現得很透徹。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驕，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②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又被看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雖然還沒有得到多少實惠，但心情開始好轉。這時黨內有人就大叫道：“知識分子又翹尾巴了！”胡耀邦針對這種叫喊說了幾句公道話：“知識分子的腰還沒有直起來，哪裏談得到翹尾巴？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都是工農整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總是吃虧。”一個領導人如此坦誠地為知識分子鳴不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統一思想

除了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以外，這種大規模的思想鬥爭還有它的社會根源。

原來社會主義理想之所以吸引廣大群眾，包括許多知識分子，是因為它論證了：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私有制必然導致剝削，剝削又引起壓迫，有壓迫就有反抗，從此社會陷入紛爭，種種問題因之出現。一旦建立起公有制，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就停止了。代替它的將是一個共同富裕、沒有剝削和壓迫、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的平等的社會。但是現實的社會主義模式卻是：隨着公有制的建立，全社會就變成一架大機器，它按照中央的統一計劃運轉，每個人都成為它的零件或螺絲釘。這是列寧的主張，也是蘇聯提供的樣板——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做的。這個社會不但沒有甚麼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且建立了一種歷史上最嚴酷的極權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處在這架機器的頂端，壟斷了一切權力。

集中統一的經濟，集中統一的政治，自然要求統一的思想。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這架大機器按照統一的意志順利運行。這也正是中國為甚麼總是不停地進行批判鬥爭以便保持“思想一致”的原因。這是一種體制上的根源，不是哪個領導人能夠隨便改變的。當然毛澤東個人的品格和作風，可以使中國的思想運動帶上濃厚

的特色。但是體制比他個人的特點更有力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他提倡的，“三不主義”也是他許諾的。然而終毛澤東之世，這些許諾從來不曾兌現。毛澤東去世之後，鄧小平同樣提倡，同樣許諾，但是也同樣概不兌現。這確實不能簡單地歸之于他們個人的翻雲覆雨，應該說，主要是社會制度在起決定作用。

二 思想運動的後果

對精神文明最嚴重的傷害

四十年的思想運動史，在中國這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來說，只是短暫的一瞬。不過這“一瞬”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卻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曾經通過一個關於精神文明的決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然都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問題是連年的思想鬥爭已經把中國的精神文明破壞得體無完膚了。精神文明離不開人的精神面貌。而這些年來的思想運動恰恰摧毀了中國人的品格和操守。這個問題不解決，能談得上甚麼精神文明的建設！

思想運動對精神文明的破壞是全面的，文化、藝術、科學、教育、道德、宗教，沒有哪個領域能夠幸免于難。這裏只就它對中國民族人品方面的傷害略作回顧。

摧毀人的個性

首先，思想運動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最大傷害就是摧毀了中國人的個性。本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就嚴重束縛了人的個性，“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使每個人都處在人身依附的位置上。而現代文明的主體就是獨立自主的個人。沒有這種個人，就沒有商品生產，也就沒有市場經濟；沒有這種個人，就沒有自由公民，也就沒有民主政治；沒有這種個人，就沒有自由思想，也就沒有文化教

育和科學藝術的繁榮。因此，打破人身依附，實現人的解放，乃是一個民族進入現代社會的前提。當歐洲進入現代社會的時候，中國還處在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之下，這是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五四運動第一次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出了個性解放即人的解放的呼聲，從此開始了中國人追求人格獨立的過程。個性解放和五四運動所追求的科學與民主本來是相輔相成的東西。要使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就應該發展而不是束縛個性。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哲學裏，個人或個性與集體或黨性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因此在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裏，從來沒有個人或個性的地位。等到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之後，毛澤東首先把“民主個人主義”拿過來當作靶子，並且把具有這種思想的知識分子當作西方代理人來批判。幾十年來，與個人有關的一切，都被打成落後、可耻、甚至反動的東西。個人主義被說成“萬惡之源”，成為一切思想工作和歷次思想運動必須打擊和消滅的對象了。

秦始皇以來，中國人民雖然一直處在專制主義的重壓之下，但是中華民族歷來重視人格和氣節的傳統並沒有消亡。這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歷經戰亂和外族蹂躪而不亡的一個原因。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就是這種人格的最高表現。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曾是中國士人的驕傲。然而當代中國的思想運動恰恰要摧毀這種人格。在思想改造當中，知識分子必須貶低和批判自己，必須放棄自己的信念，甚至用形象的話說，必須“脫褲子，割尾巴”，也就是必須以屈辱來換取生存。至于違心地承認自己並不存在的“錯誤”或被迫參加對別人的批判，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所有這些批判和鬥爭的參加者，實際上都是在扭曲自己的人格。特別是奉命圍攻別人的人，他的心靈所受的創傷，實際上比被圍攻者更深。經過二十多年的反復鬥爭，中國民族的氣節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摧殘。這一點，只要看一看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就夠了。明明彭德懷是為了愛護共產黨而提出正確的意見，明明有許

多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毛澤東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時，竟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恰恰相反，大家是群起而攻之！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它的領導核心都墮落到如此地步，怎么能指望他們給別人樹立甚麼可敬的榜樣呢？

在這種高壓下面，“無個性”成了最高的道德典範。當一枚螺絲釘，當黨的“馴服工具”，被規定為青年人的奮鬥目標和共產黨員的黨性楷模。

禁錮思想，消滅天才

以消滅個性為任務的思想鬥爭，扼殺了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也窒息了人們的創造性。因為有個性的頭腦和有特色的精神活動都被當作異端，剩下的便只能是沒有思想的腦袋了。毛澤東雖然曾經鼓勵過獨立思考和講真話，鼓勵過“舍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鼓勵過“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但這只是他個人的獨白。實際上他不容許別人有獨立的思想，並且通過一連串的運動予以消滅，在社會上是這樣，在黨內尤其是這樣。

旅美學者胡平關於極權統治對一個民族思想上的摧殘所造成的後果，有一段很精辟的論述。他寫道：“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就是在當權者們聰明、能幹，對全社會實行了慈父對幼兒般的無微不至的控制和統治時，它也會造成整個民族在意志力和創造精神方面的退化。一個極權社會，搞得好了，可以造就少數幾個偉大的，或者更準確些說——顯得偉大的（因為別人都被迫跪下或砍倒）的個人，但是它一定會造成一個渺小的民族。”^①

按照中國人的天資和悠久的文化傳統，聰明才智決不亞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按理說一九四九年以來應當在精神領域有更多的創造性成果。但是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這方面的成果太稀罕了。在政治思想上能夠成為先行者的孫中山、康有為和梁啓超等，

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產生的人物。能夠稱得上思想家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則是五四的風雲人物。連毛澤東思想的創立者毛澤東本人，也是五四運動使他走上歷史舞臺，並在曲折複雜的革命鬥爭中突破教條主義而成為中國革命領袖的。這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情。

如果從文學藝術領域來看中國民族的精神活動，思想僵化的後果就更明顯了。魯迅已經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人們當然不應該要求一九四九年以後再產生一個魯迅。但是生活在兩個時代的人又如何呢？曾經給世界文化貢獻出《子夜》、《家》和《雷雨》的茅盾、巴金和曹禺，解放後幾十年竟不曾寫出一部同等水平的著作。是甚麼原因使這些大作家江郎才盡了呢？一九九四年吳祖光到醫院去探望他六十年的老友曹禺，回來後寫了一篇短文《六十年交情》，其中有一段發人深思的話。當他在病榻前拉着曹禺的手談話時，有一句對白把問題一下子說透了。吳祖光是這樣寫的：曹禺“忽然滿面愁容地說起在一生寫作上的失落，我脫口而出地說了一句憋了多年從來沒有說出口的話：‘你太聽話了！’”

吳祖光接着寫道：“曹禺的反應出我意料！幾乎是在喊着：‘你說的太好了！你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甚麼，我馬上去辦，有時候還得揣摩着領導的意圖……可是，寫作怎么能聽領導的？……’他的激動過去了，聲音漸漸低下去了。顯然，他明白過來了。但是歲月不居，餘年衰朽，鉛錫年華已經過去了。”^⑩問題就在這裏。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曹禺，經過思想改造，已經不再是劇作家曹禺，而是變成只會“聽話”的曹禺，變成一個“馴服工具”了。曹禺的悲劇正是當代中國許許多多有才華的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因而也就是中國文化思想界的悲劇。

有没有在思想重壓之下挺住了腰板，保持住自己個性的知識分子呢？有，只可惜太少了，而且不見容于當世。吳祖光就是一

個，但他被逐出中國共產黨。顧准也是一個，但他被打擊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只剩下孑然一身，並在一九七四年凜然棄世。他去世二十年後，當他留下來的斷簡殘篇被貴州人民出版社印為《顧准文集》出版之後，人們才痛心地發現，原來中國還有這樣一位走在所有理論家前面的思想家。他早在幾十年前就敏銳地看到中國制度的弊端並在探尋出路。顧准只是被發現了的天才。大批大批被壓成“螺絲釘”的人們當中，甚麼人才沒有呢？這是整個中國民族的悲劇。

培育敗類，製造訟師和打手

消滅人的個性，只是思想運動的一項戰果。另一項成果，是造就了一批專以整人為職業的密探、訟師和打手。他們的良知已經泯滅，然而嗅覺極端靈敏。凡為人類所唾棄的惡劣品行，在他們身上無不具備。諂媚、欺詐、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翻雲覆雨，見風轉舵，落井下石，都是他們得心應手的“革命”哲學。每次思想運動，都需要這種打手，而且每次運動也總是能培養出一批又一批這樣的打手。雖然這些打手為廣大的善良人們所不齒，但是他們總能成為每次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骨幹，並且總是官運亨通，飛黃騰達。平心而論，這種人其實也是共產黨的敗類。黨內這種成分的增加，只能加速黨的腐敗。它使對黨懷有感情的人傷心，使群眾對黨疏遠和失望。而這正是共產黨的致命傷。這也正是“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的事情。然而這種人是極權體制和“鬥爭哲學”的伴生物。只要中共堅持極權體制和“鬥爭哲學”，這種伴生物就不會絕迹。

全面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

思想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最大的惡果，是普遍破壞了正常的人際關係。

中國古代的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人身依附關係，自然應該打破。在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特別是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後這些封建關係已經走向衰落。但是中華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中也形成許多良好的人際關係。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愛相敬，朋友互相忠信，尊師愛生，濟困扶危，特別是孔子“仁者愛人”這個道德準則，應該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另外隨著西方文化的東漸，人和人的平等關係和相互尊重，也和民主思想一起輸入中國，成為青年特別是知識分子向往的境界。可惜的是，這些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之下，幾乎遭到徹底的破壞。在“鬥爭哲學”的指導下，對立鬥爭成了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和特征。不光在社會上，就是在家庭裏也是這樣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女，當然必須和父母劃清界限，就是革命幹部家庭，誰如果在社會上或黨內遭到批鬥，那麼他回到家裏便也會被自己的親人當作敵人。

在這種關係下面，人和人之間談不上互相信任。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則成為“有覺悟”的象徵。因此人們必須學會互相提防，“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成為有用的格言。一九五六年舒蕪發表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使人們互相更加戒備。文化大革命中，張志新因為一位好友揭發了她的知心話而付出生命，給人的教訓就更深了。

人們只能在“鬥爭別人”和“被人鬥爭”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這樣的人際關係當中，人們只能在“鬥爭別人”和“被別人鬥爭”之間選擇自己的位置。為了免于被人鬥爭，只好去鬥爭別人。本來社會生活中的鬥爭關係只在某些人和某些事情中存在。但是把它普遍化和絕對化以後，整個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就遭到徹底破壞了。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所經受的一場最大的人倫災難。

在這種普遍化的鬥爭當中，沒有被人鬥過或沒有鬥過別人的

人，幾乎是没有的。有的是一面鬥爭別人，一面被人鬥爭。有的是今天鬥爭別人，明天又被別人鬥爭。就像賭場上沒有贏家一樣，在鬥爭場上鬥來鬥去的結果，幾乎沒有人不受鬥爭之害。（注一）當然，被迫鬥爭別人的人，和前面說的職業打手完全是兩回事。打手們已經失去人性，鬥爭別人是他的一大享受和進身之階。而被迫鬥爭別人的普通群衆，因為天良未泯，所以內心感到痛苦，時時受着良心的譴責。

顧頡剛是中國史學界的著名專家。他的學問得自胡適真傳。他在過去出版的《古史辨》（這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史學界的地位）自序中，懷着極其感激的心情反復陳述“適之先生”（胡適字適之）對他治學的教誨，並坦誠地把自己的成名歸功于“適之先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初的學習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他就公開和胡適劃清界限了。這種態度其實是在運動壓力下的自保，並不是出自真心。這一點，可以從他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證。這封信談到他的弟子童書業等對他的批判時寫道：“此是渠等應付思想改造時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輩與《古史辨》之關係太深，故不得不作過情之打擊。苟我之學術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來二君又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諒者也。”^⑩原來童書業等二人，學習顧頡剛批判他的老師胡適的榜樣，也撰文批判自己的老師顧頡剛。但一面批判，一面又請他為自己主編的刊物寫稿。可見批判是為了應付思想運動。顧頡剛對這種矛盾心情深有體會，因此並不責備自己的學生，而是將心比心，原諒了他們。

但是原諒歸原諒，它沖不掉人格分裂的痛苦。胡適之子後來所以自殺，恐怕和他被迫批判胡適並宣布劃清界限所造成的内心傷痛是分不開的。

（注一）一九五七年吳祖光被劃成右派，是他的發言被人

畫龍點睛的結果。他被請去在文聯整風座談會上發言，其中提到：“那種辦事粗暴、又不懂文藝的人，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這句話本來很普通，也很正確，不可能挑出甚麼毛病。但是這個發言在《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發表時，標題卻成了《黨“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一字之差，變成吳祖光“反對黨的領導”了。其實這個“黨”字是田漢給加上去的。^⑤不知田漢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是這一個字竟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而且使這人美滿的家庭從此陷入苦難。而傷害了吳祖光的田漢本人呢？後來也受到傷害，而且是致命的傷害。這位三十年代在中國戲劇和電影史上寫下過光輝篇章的詩人和劇作家，《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只因為後來寫出過反抗暴政和反映民間疾苦的《關漢卿》和《謝瑤環》，就身陷自己的黨所設的文字獄，臨終前想見一眼白髮親娘都辦不到！

三 沒有主旋律時代的前夜

馬克思主義是整個社會唯一的主旋律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開始進入一個一元化的社會。經濟上一元；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政治上一元；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上一元；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簡稱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一個龐雜的混合物。其中有馬克思的，也有列寧和斯大林的，更多的是毛澤東的，後來又加上鄧小平的）指導一切。整個社會，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四十年之所以思想運動連綿不斷，用一句話說，就是要把全國的思想都統一于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統一于領袖的思想）之下。為此就要改造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也就是消滅一切異己思想。思想都存在於人的腦袋裏，所以必須對人加以改造。知識分子腦袋裏各種各樣的思想最多，因此便成了思想

運動的主要對象。

其實思想是消滅不了的。強制性的改造更是南轔北轍。不過用壓服的辦法可以把異己思想壓住，使它不能發表。所以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國思想界便只有一個主旋律：馬克思主義。這主旋律一直持續了四十年。

四十年之後，事情有了變化。

王新濱見人道主義的新希望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自由化”全軍覆沒，“馬克思主義”大獲全勝，再加上中共“第三代”對意識形態實行了空前嚴厲的鉗制，使得任何“自由化”的聲音都透不出來，舞臺上已經沒有一點雜音，主旋律應該說進入最好的時代了。

然而此時馬克思主義恰恰陷入最嚴重的危機，因為人們不相信它了。

宗教的存在依賴於人們對它的信仰。因為它的許諾在天堂，無需在人世加以驗證，而且人世也無法驗證。但馬克思主義不同，雖然中共一直把它當作一種信仰，但它的許諾在人世：要給人世一個最美好的社會。可是在二十世紀，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這種主義的指引下都走進了絕路。最後是“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陷于瓦解。中國倒是沒有垮臺，但那只是仰仗於改革。中國共產黨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以便證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正確。其實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清楚，改革乃是大膽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結果。“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乃是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的基石。然而中國正是在農村拋棄公有制，在全國拋棄計劃經濟，才從困境裏走出來的。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中的失敗，使馬克思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國共產黨雖然繼續把它作為高於一切的指導思想強制人們信奉，但是毫無作用。思想只

有通過人們自願接受才能發生作用。強制填鴨是可以的，強制灌輸一種思想是絕對辦不到的。當然也有作用，那就是引起反感。現在很多青年對這種官方理論棄之如弊屣，就是把它當作信仰強制灌輸的直接結果。

尤其是“六四”一役，當局一舉消滅了“自由化”，也一舉摧毀了自己的形象。平時演奏主旋律時所彈出的動聽音符，已被炮火聲完全吞沒。可以說，是“六四”的槍聲給這種信仰以致命的一擊，使它在人們心中本來已所剩不多的影響，徹底烟消雲散了。

於是中國來到了一個沒有主旋律的前夜。其所以叫作“前夜”，是因為主旋律的曲調並沒有終止，仍在通過大功率的喇叭繼續播放，只是已經沒有人聽了。不但沒有人聽，連樂隊都懶得演奏了。人們聽到的只是一遍又一遍重複播放的老錄音帶。

這是一種進步。

主旋律的沒落，預示思想自由的時代即將來臨

思想只在人的頭腦裏產生。它當然要反映外部的世界，但也要表現自身。思想不單單是認識，同時也包含感情、意志、審美觀念和道德判斷，以及主觀世界其他的方方面面。思想的本質是自由，思想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最為豐富多采。因此，社會的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作為主旋律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處於壓倒一切的地位，思想界的多元化就成為可能了。承認這種多元，承認思想自由，對自由思想的表達給以法律上的保護，即言論自由，是現代化社會的必要條件。

其所以必要，那着眼點還不單單是人權或公民權利，而且因為它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尤其是當今這個信息時代。

毛澤東很重視人，他說過“人是最寶貴的”。但他是把人當作他大搞群眾運動的工具來使用的。“人海戰術”當然需要人，而且多多益善。

鄧小平提倡“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比毛澤東前進了一大步。不過他尊重的是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才，因為他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可惜他不知道，或不願承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科學和技術，只能產生於富有創造性的腦袋。而創造性只能存在於自由思想之中。這自由思想不單指人的個體，而且指整個社會的思想生活。社會的思想生活又離不開它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只有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才能孕育出富有創造性的人才。這個“人才”不是“人海戰術”中的“材料”之“材”，而是有自己獨立人格和杰出才華之“才”。這種人不單指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而且指思想家，政治家，理論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出版家，記者，以及各方面的社會活動家，等等等。

胡耀邦生前曾經希望中國知識界能夠為中國的繁榮攀上三個高峰：思想理論高峰，文學藝術高峰，科學技術高峰。如果政治體制不變，即使在他那樣開明的領導下，中國人也只能接近而不可能達到那三座高峰。因為沒有民主，這一切都談不到。

現在，思想領域一個沒有主旋律的時代即多元化的時代快要到來了，它是走向思想自由的前夜。由於政治民主還很遙遠，思想控制又毫不放鬆，這個前夜可能很長。但是歷史的腳步總是往前走的。前夜再長，也總有看見曙光的時候。回顧四十年的思想運動史，再看看已經沒有人聽的主旋律的現狀，就知道那個時代已經不會太遠了。

※ ※ ※

第十四章 引文出處

- ①《毛澤東選集》第 294 頁
- ②《共和國歷程》上卷，第 586 頁
- ③《大陸知識分子論政治·社會·經濟》第 44 頁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④臺灣《聯合報》1994年10月20日

⑤《顧賴兩年譜》第352頁

⑥《共和國洗冤錄》第84頁



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茅盾（沈雁冰），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中包括《鈍》三部曲、《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腐蝕》等名著。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只寫了幾則《夜讀偶記》，再就是在思想運動來臨時，跟着別人作檢討。昔日那位文思泉湧、才華橫溢的大作家，已被運動的浪潮吞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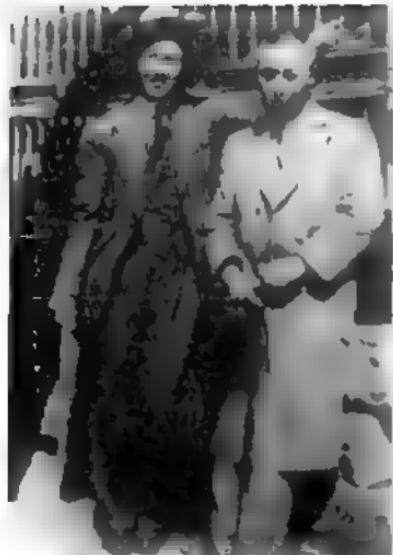
圖為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書市上和讀者見面



這是青年時期的曹禺

曹禺在二十四歲時寫出《雷雨》，成為中國話劇史上劃時代的不朽劇作。同一時期創作的劇本《日出》及《原野》等，也都是經典之作。

這位戲劇大師進入盛年（四十歲）以後，本來應該有更好的精品問世，但是經過“思想改造”，竟然寫不出一部傳世之作了。他自己晚年對此深為悔恨，臨終前在病榻上沉痛地喊道：“我太聽話了！”



以上三人左起依次為冼星海，田漢，聶耳。

聶耳和冼星海為現代中國最傑出的音樂家。他們的代表作《義勇軍進行曲》(田漢詞，聶耳曲)和《黃河大合唱》(張光年詞，冼星海曲)，以及許多其他作品，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不朽的文化遺產。他們逝世已經半個多世紀，至今中國無人能出其右。在他們的人生道路上，田漢有過重大影響。詩人、劇作家田漢是三十年代上海影劇界巨匠，他的創作活動，對促進中華民族解放意識的覺醒，起了重要作用。可惜這位忠誠的共產黨人晚年身陷黨的冤獄，臨終前想見老母一面竟不可得。



寫出不朽名作《家》的巴金，解放後再也沒有同等水平的著作問世了。他僥倖度過文化大革命，虎口餘生，痛定思痛，倡議設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以警示後人。但此建議竟遭扼殺。



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說：最近十年，最大的失誤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

其實中共從上到下，思想工作都是很積極的，反自由化尤其努力，然而收效甚微，應該說是思想政治工作不盡了。

有鑑於此，“六四”後對大學生實行一年軍訓，以便端正思想，增強對“自由化”思潮的免疫力。

圖為一九八九年入學的北京大學學生結束一年軍訓生活時所攝。為首的女生不知為何如此傷心。是軍營生活使她滿腹委曲，還是思想端正之後已經捨不得離開軍營？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的價值標準發生巨大變化。享有特權的當政者要求老百姓“艱苦樸素”的說教，已經不靈。對所謂“超前消費”的指責，更沒有人愛聽。現在美化生活，追求新潮，已經成為青年人的時尚。他們崇拜的已經不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而是名星名模。上圖為在國際上獲獎的名模彭莉，下圖為北京一個美容廳。



八十年代初，影星劉曉慶在上海《文匯》月刊上發表自述《我的路》，敘述她個人奮鬥成長的歷程，引起讀者強烈共鳴，也引起官方批判。但劉曉慶不為批判所動，繼續走“我的路”，並且以藝人身份下海經商，打開了一片天下。這是一九九三年她在杭州創辦“劉曉慶飲食有限公司”的成立慶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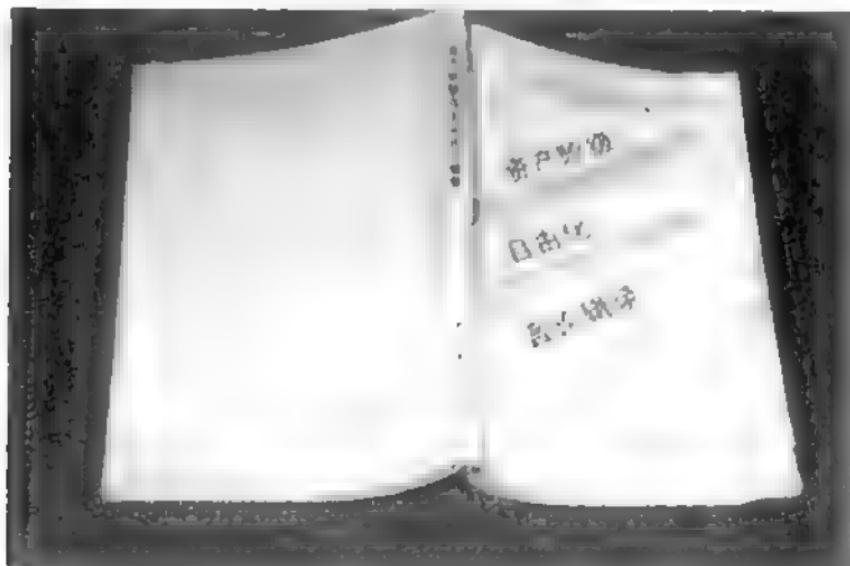
劉曉慶的“路”深刻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根本變化：個人不再依賴“組織”，這表明傳統集權社會體制的瓦解。過去人們之所以必須被迫服從思想運動的擺佈，是因為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都只能仰賴集體，因此必須服從“集體”的意志，即“聽黨的話”。當人們能獨立地走“我的路”時，“集體”的強制力就消失了。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儘管中共繼續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尊為高於一切的指導思想，並規定為學校必修課，它卻再也無法重振往日雄風了。事實上中共自己也在實踐上把這種主義的許多原理都拋棄了。至於社會上，特別是青年人，對它已經毫無興趣。書店裏最中心的檔位（擺放馬列毛著作），也是最冷清的所在，除非有關於毛的熱聞趣事有些吸引力，一般都乏人問津。

相反，各種科學知識、古今中外文藝作品和歷史以及生活用書、文化娛樂書籍，倒是琳琅滿目。外國的社會科學和政治書籍也多了起來。這預示着一個思想多元化的時期快要來了。



“六四”以後，“自由化分子”的著作全面被禁，所有出版社不准出版，所有書店不得銷售。但有一個例外，就是經過中共專門編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輯錄》可以出版、公開發售。內容是經過斷章取義，目的是供“大批判”當“反面材料”用。其實這本摘錄倒是起了幫助“自由化”觀點廣為擴散的作用，故很快就不再印了。

參 考 書 目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199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80)》新華社編 新華出版社(1982)

《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1986)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6)

《毛澤東選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

《國史通鑑》有林主編 紅旗出版社(1994)

《當代中國重大事件實錄》趙序平主編 華齡出版社(1993)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紅旗出版社(1994)

《關於達懶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

《廬山會議實錄》李銳著 春秋出版社(1989)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

《中國“左”禍》文革著 朝華出版社(1993)

《“左派”理論家浮沉錄》齊力編 團結出版社(1993)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風雲錄》劉曉主編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共和國洗冤錄》曹英等編 團結出版社(1993)

《董涼的訴說》張小琳編 團結出版社(1993)

《風起雨落幾鴻儒》丁力編 團結出版社(1993)

《董涼的回眸》巴 茶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

《梁漱溟評傳》馬勇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三松堂自序》馮友蘭著 三聯書店(1984)

《最後的年月》丁惟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我的哲學罪案》楊繼珍著 人民出版社(1981)

《走出現代迷信》陶鎔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猛烈的時刻》于光遠 胡續偉 上編，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共和國歷程》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

《中國共產黨大典》龐正楷主編 紅旗出版社(1996)

《七君子傳》周天慶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無地自由——胡適傳》唐衛威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邱石編 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鄧小平帝國》阮銘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

《胡耀邦下臺的背景》王若水著 (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胡續偉著 (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

《我的入獄》戴晴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1990)

《馮煥剛年譜》顧潮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吳祖光開文選》吳祖光著 (香港)明報出版社(1989)

《交鋒》馬立誠 凌志軍著 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十年風雨》蘇紹智著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人民出版社(1987)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情態錄》朱育和等 主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大陸知識分子論政治·社會·經濟》李少民主編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

《共產黨違法案紀實》郭羅基著 (香港)民主大學出版社(1997)

《胡適言論集》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編印(1955)

《田漢傳》董健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6)

《延安日記》(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 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

《老肖像新打量》姜威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名 目 索 引

1. 按首字拼音字母順序排列

2. 同一字母之下，按首字筆劃排列

3. 同一首字之下，按字數和筆劃排列

A

按勞分配 123
按照思想劃階級 105—106

B

《白皮書》(美國國務院) 34—35
白專道路 126
《北京之春》 238
百分之六的民主淘汰了鄧力群 379—380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87
拔白旗，插紅旗 127
波蘭匈牙利事件 89—90
撥亂反正 377, 382

C

吹牛大賽 117
查禁民間刊物 293, 295—296

陳雲制止出版立法
從民主派到走資派

D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 154
大民主 91
大批判的末日 405—406
大連座談會 158
大煉鋼鐵 117
大躍進 115—116
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
 145—146
地下萬言書 412—413
東方專制主義 416
毒草小說 157
毒草電影 156—157
鬥爭哲學 415—416, 426
第三個里程碑 189—190
鄧力群巧奪中宣部 317—318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鄧小平怕作赫魯曉夫	297~298	工農與知識分子的矛盾	
鄧拓之死	191		417~418,420
鄧胡趙體制		公共食堂	139~142
	300,350,359~364,403	《公安六條》	208
敵我矛盾	37,90~91	共產主義	
黨天下	96		119~122,174,325~329
E		共產國際	1,3,5,6~7
《二十五條》	168~170	《光明日報》	190,233
《二月提綱》	183	改革和反改革的鬥爭格局	
F			265~266
反革命	9,10,76,77,78,80	供給制	120~121,124
反胡聯盟	356~357	鬼戲	154~155
反胡宮廷政變	359~362	個人主義	67
反美親蘇教育	34~35	個人迷信	251
反修防修的背後	175~177	個性之摧毀	421~423
反對現代修正主義		《高教六十條》	148,149
	166,168,171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86,166
非毛化	296~297	敢于“撫哭叛徒”的邵燕祥	
法家呂后	216		366~368
馮友蘭“修辭立其偽”	216~217	過渡時期	52~53,169
廢止終身制	251	過渡時期總路線	52~53
G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工作方法六十條》	126		8~9,300~301
工宣隊	197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300~301
工農兵佔領學校	197~198	顧問委員會	383

名目索引

H

合二而一 160
《河殤》 388—389
和平演變論 169, 406
《紅旗》 131, 202, 220, 234, 235
紅學 58
《紅樓夢》 58, 61
紅衛兵 192—193, 196—198
胡風《意見書》 72—73
胡風反革命集團 76, 80
胡喬木哭庭 310—311
胡喬木吟詩贈周揚 343—344
胡喬木勸說吳祖光退黨
胡適思想 63—64, 66—69, 71
胡鍾偉頂撞鄧小平 306
胡耀邦的遺言 348—349
胡耀邦和鄧小平的裂痕
胡瑞麗宮 180—182
華國鋒失去機會 228—231
禍國殃民的兩個觀點 36
揭起蕭牆——獨裁制的隱患
《九評》 169—170

J

“九一三”事件 207—208, 210
江青《文藝座談紀要》 183—184
軍事俱樂部 137—138
進化論 67
教育革命 196, 197, 199—200
階級鬥爭 30, 36, 88, 100,
105—160, 137, 150—151, 170
階級鬥爭為綱 150—152, 245
《解放日報》(延安) 16, 17
《解放軍報》 182, 190
解放初期的知識分子 31—33
經驗主義 221—222
精神文明的破壞 421—427
講假話的圍攻講真話的
舉毛旗, 走非毛化道路 301
簡報學 307
《鏡報》 334—335

K

《科學十四條》 148
可怕的懲罰 141—142

L

“六四”慘案 396—397, 399
呂熒為胡風辯冤 77—78
老人幫 356—357
老人政治 210, 223, 351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老實人的下場	138-139	毛澤東思想	
《李慧娘》	154-155	8-9, 187-190, 250-251	
林彪的升起	177	毛的平均主義	124-125
林彪“五一八”講話	186-188	毛的偉人情結	45
兩個宗派	6	毛的復仇情結	419
“兩個凡是”	230	毛的理論遺囑	219-221
兩報一刊	189, 230	毛對文藝的批示	155, 156-157
兩類矛盾	90-91	《毛選》印數創記錄	202
兩個司令部	235	毛和斯大林的關係	166-167
兩支理論隊伍	235-236	毛和梁漱溟的鬥爭	54-58
兩種“魚水關係”	401	毛親手制造文字獄	78-79
《理論動態》	233, 235, 322	民主個人主義	35
理論界的分裂	263-264	民間和官方的對臺戲	389-390
理論工作務虛會	248-255	沒有主旋律的時代	428
理論工作座談會	314-318	馬寅初誓以生命捍衛真理	
糧食衛星	117-118		132-133
《劉志丹》冤案	152-153	貓論	411
輪流執政(坐莊)	96	鳴放	95-98
《歷史研究》	236		
歷史唯物主義	36	N	
廬山會議(一九五九)	135-137	南巡講話	411
廬山會議(一九七一)	206-207	黃榮臻：“刀下留人”	372
M		P	
毛式民主	91, 253	平反委員會	95-96
毛林關係		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	
毛劉關係	177, 184, 205-208, 211		217-218
毛劉關係	153, 176-178	批《苦戀》	301-304

名目索引

批判效應	405-410	《人民日報》
批林批孔	214,221	38,39,40,59,74,78,
批林整風	210-211	115,118,141-142,191,
批陳整風	206	192,212,236,269,276,
批判《海瑞罷官》	181-182	336,342-343
批毛和保毛的鬥爭	298-299	《人民教育》 44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224-226	人的價值 385-386
破壞人倫	425-426	人道主義 329-330
培育敗類	425	人民內部矛盾 37,90-91
評毛	242-243,250-251	人生觀大討論 386
評《水滸》	222-223	任仲夷項南中箭落馬 350-351
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137	儒法鬥爭 214,216

Q

七千人大會	147
奇異的金牌	401
《青年論壇》	347-348
青年導師碰壁	386-388
啓蒙社	243
《清宮秘史》	60,62-63
清除精神污染	337-342
搶救運動	11-15

R

人性論	335
人民公社	119-120,141

十人小組(知識分子問題)	84
十二學者作家	398,400,405
十次路線鬥爭	211
三種人	325
三不主義	148-149,421
三面紅旗	115,116,142
《三家村札記》	184
“三反”“五反”運動	33-34
三中全會路線	244-247
三十年代結怨,五十年代清算	71-74
“四大”	91
四清	175
四人幫	222,227,229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四五”運動	226 - 227	斯大林	1, 8 - 9, 86
《四五論壇》	238, 239, 240, 242	舒蕪倒戈	74 - 75
“四個凡是”	260	新共產風	325 - 329
四個“念念不忘”	262	新舊“紅學”	58 - 59
四項基本原則		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283 - 284
	258 - 259, 267 - 268	審幹	9 - 10
生活集體化	119 - 120	《實踐論》	45
《生活》半月刊事件	293 - 295	實用主義	66 - 67
生產目的討論	277 - 281	雙反運動	126
《世界經濟導報》	404	蘇共“二十大”衝擊波	86
收和放	92, 257 - 258, 292 - 293	T	
社會主義	31, 52, 83, 88,	土地革命	2
	253, 245, 349, 429	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	
社會主義陣營	86, 166		226 - 227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75	天下第五到天下第	187 - 189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	115	田漢之死	247 - 248
社會主義時期基本路綫	151	《探索》	238, 239
思想改造運動	45 - 48	W	
思想政治工作	408	五不怕	423
思想自由的時代	430 - 431	五七道路	196
思想運動的終結	406 - 410	五子登科	148
思想戰線座談會	307 - 311	《五一六通知》	185
孫治方的三對待	165	五反(一九五二)	33
孫治方的利潤觀	162 - 163	五反(一九六二)	175
孫治方張聞天反黨聯盟		文字獄	179
	164 - 165	《文藝報》	43, 59, 60, 62, 72
蛇口風波	386 - 388		
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	345, 349		

名目索引

《文藝八條》	148, 149	先生產,後生活	278 – 279
文化大革命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220 – 221
	174 – 186, 211, 249, 252	修正主義	99, 168, 221, 222
文字獄制造廠	370	香花和毒草	37, 110
文化遺產的浩劫	195	消滅民間組織	293, 295 – 296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	183	虛與實	219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74 – 175	現代迷信	187 – 188, 238, 251
文藝界整風(一九六四)		習仲勛反黨集團	152 – 153
	155 – 156	《新啓蒙》	390, 392
王明左傾路線	2 – 4	新華社	35, 233
王明和毛澤東的權力鬥爭	5 – 6	《新觀察》	404
王寶珠和《野百合花》	15 – 19	新人口論	36, 131 – 132
王若水和胡喬木的較量		新專案組	341 – 342
	333 – 335	新民主主義	31, 53
外行領導內行	99	新的反動階級	104 – 106
吳祖光為白樺辯護		新時期思想鬥爭的特點	
	304 – 305, 309 – 310		266 – 267
《武訓傳》	37 – 40	興無減資	127, 282
《武訓歷史調查記》	40 – 41	《學習》	30
唯生產力論	225	學習委員會	2, 48
唯一的反左鬥爭	228	學習的變質	48 – 49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219	憲法保護不了人民代表	77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謝瑞環》	157 – 158
	189, 252		
魏京生向鄧小平開戰	256		
		X	
西單民主牆	237, 238, 256		
		一邊倒	36 – 37, 87
		一條腿走路	301, 354
		一天等于二十年	115 – 116
			• 439 •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一九八六年學潮		中共“八大”	88 - 89
	355 - 356, 358 - 359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	150 - 153
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	393 - 401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205, 249
一黨專政改造就特權階層		中共“九大”	205
	264 - 265	中共“十大”	212 - 213
· · · · · 一九五六——僅有的自由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244 - 247
年份	84, 87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	345
又紅又專	126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	351 - 352
又一個講真話的人	139 - 141	中共“中央一級生活會”	
引蛇出洞	98 - 99		360 - 362
以強制為後盾的思想改造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 央文革)	186
	25 - 26	中共的共運理論和策略	
右派	99 - 108		169 - 171
延安文藝座談會	19 - 20	中共和蘇共矛盾的由來和發展	
要不要“反自由化”的爭論			166 - 170
	351 - 352	中宣部	57, 64, 77, 317 - 320
陰謀和陽謀	100 - 102	《中國青年》	236, 238
異化	330, 335	中流砥柱——邵燕祥	402 - 403
《野百合花》	15 - 19	左和右	212, 228, 229
樣版戲	202 - 204	自由化分子全軍覆沒	401 - 402
《圍丁之歌》	204	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	346 - 347
歷不變的腰——傅雷、章乃器、 新鳳霞	108 - 112	忠字舞	203
《燕山夜話》	184	忠誠老實運動	49
延安整風中的知識分子	15 - 20	周揚和胡喬木的鬥爭	
			331 - 333, 343 - 344
Z		知識青年下鄉	197 - 198
中共“七大”	8	知識分子摘帽	84 - 85, 149

名目索引

知識分子戴帽	93, 104 – 105, 128 – 129, 193 – 195	專案組	247 – 248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84 – 85	最後決定權	7
知識分子與中共的矛盾	15	專法批備	214 – 215
知識分子發出獨立聲音		資本主義改革	406, 411
	388 – 389, 393	資本主義復辟	170
政治學習	30 – 31, 48	資產階級法權	122 – 123
政治設計院	95	趙紫陽的結局	403
政治思想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		趙紫陽的戰略錯誤	362 – 364
	102	遵義會議	4
造神運動	187 – 188	整風模式	26 – 27
真理戰勝權力	236 – 237	整風運動(延安)	1, 8, 23 – 26
真理標準大討論	231 – 237	整風運動(一九五七)	93 – 94

人名索引

1. 按姓氏拼音首位字母順序排列。
2. 同一字母之下，按姓氏筆劃排列。
3. 同一姓氏之下，按名字字數和筆劃排列。

A			
艾思奇	30,65	陳毅	133
B		陳子明	402
巴人(王任叔)	335	陳伯達	186,206-207
巴金	201,346,424	陳希同	394
冰心	393	陳荒煤	303
白樺	301,304,308	陳獨秀	424
包遵信	400,402	曹志	236
博古(秦邦憲)	3,4,7	曹禺	424
鮑彤	236,369	曹思源	402
薄一波	53,349,352	儲安平	96,103
C			D
柴玲	400	丁一石	307,313
陳軍	402	丁偉志	236,404
陳雲	292,322,324,350	杜威	45
	351,373	董謙	140-141
		董輔仍	236
		鄧拓	65,184,191
		鄧力群	235,286-287.

人名索引

鄧小平 213, 219, 224, 231,
243—244, 286,

287—289, 297—298

端木蕻良 193

戴 瞭 400, 402

F

方勵之 355, 365, 393, 402

範文瀾 65

範榮康 236

封從德 400

馮友蘭 65, 216—217, 218

馮雪峰 60

馮蘭瑞 235, 253

傅 雷 109, 194

費孝通 32, 97, 365

G

戈 揚 402, 404

郭沫若 40—41, 60, 61—62

64, 68, 77, 195

郭耀基 236, 273—277, 316, 320—321

關 錄 186, 325

關志豪 236

顧 準 165, 425

顧頤剛 427

H

何 匡 236

何其芳 65, 72

洪 禹 318—319

侯外廬 65

胡 平 295, 423

胡 風 71—80

胡 遼 63—69, 70, 71, 424

胡 銚 65, 404

胡思杜 69—70, 71

胡啓立 403

胡喬木 17, 20, 235, 244,

269, 271, 272, 276,

280, 284—287, 289—291,

331—335, 343—344

胡德平 348

胡績偉 212, 233, 306, 338, 339, 389

胡耀邦 232—233, 248, 249,

261—262, 272, 276,

277—278, 348—349

黃 綱 303, 305, 308

黃心平 96

黃振旅 79

黃紹竑 96

黃集眠 65, 97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

華國鋒		李大釗	419
	228~229, 230~231, 280	李士釗	40, 41~42
賀 龍	17, 21	李玉田	236
賀敬之	303	李何林	308
賀綠汀	201	李希凡	59, 61
赫魯曉夫	86, 167, 170, 171	李洪林	238, 251, 269~271, 276, 400, 402
J		李慎之	404
江 青	40, 59, 186, 193, 195	李維漢	16, 281~284
金日成	176	李澤厚	400, 402
金觀濤	402	林子力	235
賈 霽	43	林自新	373
蔣介石	70~71	林潤青	235
蔣南翔	12	林默涵	72, 75, 303
翦伯贊	68, 179~180, 184	陸 石	303
K		陸定一	352
康 生	2, 10, 11, 18, 133, 152, 155, 163, 169, 183, 186, 195	梁漱溟	54~58, 217~218
L		雷海宗	97
老 舍(舒舍予)	65, 193, 194	廖沫沙	184
呂 美	77~78, 80	黎 湖	236
李 陀	400	駱賓基	193
李 達	104	魯 迅	424
李 鵬	394	劉 青	238
李 哲	44	劉大年	58
		劉大杰	63
		劉少奇	
		劉再復	400, 402
		6, 7, 122, 153, 176~178, 223	

人名索引

劉志堅	186	潘梓年	65
劉賓雁			
	346, 356 – 366, 367 – 368		
藍 翱	59, 61	千家駒	97
羅常培	33	秦 川	236, 339
羅隆基	95, 103	戚本禹	179, 186, 325
M		欽本立	404
茅 盾(沈雁冰)	60 – 61, 424	錢俊瑞	47 – 48
毛遠新	223	錢偉長	365
毛澤東	1 – 2, 4, 5 – 6, 7, 8, 35 – 37, 45, 55 – 57, 78, 86, 134, 153, 178 – 179, 210 – 214, 221 – 222, 223 – 224, 226 – 227, 415 – 416		
馬沛文	236, 316	阮 銘	235, 244, 262, 321 – 324, 391
馬連良	181, 192	任仲夷	350 – 351
馬叙倫	44	任弼時	7
馬寅初	46, 129 – 133	芮杏文	403
N			
聶鉗弩	65, 104	邵荃麟	65, 158
聶榮臻	372 – 373	邵燕祥	366 – 368, 402 – 403
P		孫 瑜	38, 40, 41 – 42
彭 真	13 – 15, 183, 352	孫冶方	162 – 165, 236
彭克宏	372, 394	孫定國	161
彭德懷	135 – 139, 159	孫長江	233, 235, 321 – 324, 372 – 373, 374
		舒 蕪	74 – 75
		斯大林	86, 166, 170

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 - 1989)

蘇紹智		371 - 372, 389, 391 - 392
236, 253, 338, 372, 392, 402		
蘇曉康	388, 400, 402	王若望 357, 364 - 365, 370
		王洪文 212 - 213, 224
T		王軍溝 238, 402
田 漢		王貴秀 236
157, 247 - 248, 427 - 428		王惠德 312
唐 因	306	王寶珠 15 - 18, 20 - 22
唐達成	306	汪子嵩 236
陶 鑄	186	汪東興 233, 234, 238
陶大鏞	103	吳 江 235, 321, 322, 323, 324
陶行知	42 - 45	吳 啓 180 - 181, 184, 191 - 192
童大林	236	吳大琨 63
童書業	427	吳明瑜 236
		吳祖光 111 - 112, 304 - 305, 371, 373 - 374, 424
W		吳景超 97
王 力(北京大學教授)	68	吳敬璉 236
王 力(中央文革成員)		武 訓 37 - 40
	186, 325	溫元凱 400, 402
王 丹	394, 401	萬 里 352
王 明(陳紹禹)	2 - 3, 5, 7, 8	魏京生
王 蒙	403 - 404	238, 239, 256, 261, 275, 358
王 震	17, 321, 323, 324	
王元化	330, 390, 391	X
王任重	186, 306, 314 - 315	
王忍之	368, 377	邢貴思 236
王若水		夏 衍 303
	212, 236, 251, 333 - 335,	荀慧生 193

人名索引

徐文立	238	朱厚澤	347, 368, 403
徐璋本	97	朱穆之	306
徐鑄成	98, 103, 108	周揚	64, 201, 306,
項南	351	331 – 333, 339 – 340, 343 – 344	
新鳳霞	108, 111 – 112, 304	周信芳	192
熊復	235	周恩來	4, 6, 38, 56, 84 – 85,
蕭軍	20, 193		110, 212 – 213, 215, 221, 225
Y		章乃器	96, 109 – 111
于光遠	236, 338, 392	章伯鈞	95, 102
于浩成	236, 389, 400, 402, 405	張天翼	65
尹達	65, 186	張百生	79
余煥春	236	張光年	303, 306
姚文元		張志新	254 – 255, 275
181 – 182, 186, 212, 220, 222		張香山	236
俞平伯	58, 62	張春橋	122 – 123, 181, 212, 220
葉文福	307, 312	張聞天(洛甫)	
葉聖陶	108		3, 4, 7, 137, 164 – 165
葉劍英	229, 244	張顯揚	236, 372, 374, 402
楊耳	43	曾濤	236, 306
楊西光	233, 236	曾昭掄	97
楊獻珍	133 – 134, 159 – 161	趙尋	303
楊榮國	216	趙紫陽	
閻明復	403		362 – 364, 377 – 378, 403
嚴家其	236, 251, 369, 400, 402	鄭振鐸	108
		龔沛璋	236
Z			
朱德	4, 14 – 15, 38		